

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吴心伯

2013年，中美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上达成基本共识，接下来双方要做的就是具体推进这一进程，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首倡者，中国应该通过以下举措积极引领和推动这一进程。

首先，中美在亚太互动要提倡创新思维与行动。中美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都要谋求成为新型大国，包括要持有开明的心态（不以零和的眼光看待其他国家的发展），接纳进步的思维（在处理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时要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采取积极的举措（通过建设性的行动向对方发出积极信号、开启与对方的良性互动）。

其次，提出我之亚太愿景。鉴于美方担心中国会随着力量的壮大不断拓展在亚太的利益和影响力，甚至寻求排挤美国和挑战美国，我应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亚太政策的目标就是推动建立亚太合作共同体，其特点是：谋求发展共同利益，讲究利益均衡（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正当利益），共同制定和遵守公正合理的行为规范，合作建立开放、包容的地区机制。

第三，尝试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强调国际政治中规则的重要性，企图在美国力量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继续掌握规则的制定权，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亚太是美国推动制定新的经济与安全规则的重要区域，其要旨是规制力量不断壮大的中国的行为。我可以抓住美国这一心理，提出愿意与美方一道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通过这些新的规则达到制约美国亚太行为的目的。例如可以考虑以下规则：相互通报各自在对方周边地区的外交活动；不挑拨离间，不在他国面前诋毁、含沙射影攻击对方；一方在西太平洋举行重大军事演习预先通报对方或邀请对方派员观察；在自己的盟国和伙伴向对方采取挑衅行动时，要积极劝阻，而不是推波助澜；双方谋求扩大合作，共同为本地区提供公共物品。

第四，设立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试验项目。结合问题的重要性和双方的共同关注，可以考虑把两军关系、朝鲜半岛问题、海上安全问题作为优先考虑领域。

尽管两国军事能力建设上越来越锁定对方，但都无意发展一种敌对性的军事关系。如何在中美两军之间加强交往、增进互信、扩大合作，减少军事关系竞争性，降低两国安全领域相互猜疑的负面影响，是发展两军关系的重要使命。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中美可共同推动朝鲜内外政策的转型，即对内政策朝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转型，对外政策朝着扩大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相关国家改善关系的方向转型。中美应充分利用亚太事务磋商、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渠道讨论朝鲜半岛问题。

中美在海上安全问题上既有共同利益（如航行安全、海上救助），又有重要分歧（如钓鱼岛、南海争端），两国可以在航行安全和海上救助方面推动两国军民部门的合作，并向亚太地区展示中美共同为本地区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在海权争端问题上，要向美方充分阐述中方权益主张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同时强调中方希望推动和平解决争端的基本立场。对日本、菲律宾、越南的一些主动挑衅，我应及时向美方指出，并要求美方对他们发挥影响力，敦促其克制；对美国在安全上加强与日、菲、越合作的动向，我应不断敲打，强调指出美国采取这些动作不利于争端和平解决和地区安全的维护。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國際廣生

双月刊 总第 27 期

2014 年 第 1 期 1 月 15 日出版

□ 卷首语

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吴心伯

□ 特稿

1 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杨洁勉

□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新型大国关系的维度分析

14 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
——兼议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金应忠

26 “比异”齐飞？
——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苏长和

39 迈向世纪性的权势转移
——中美关系的新型政策路径 [芬]丹·斯泰因博克

55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 蔡亮

68 理论·策略·机制
——对建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三重思考 张芳

85 从全球民调看“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的相对性 翟石磊

□ 国际政治

103 美国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与生成逻辑 何晓跃

121 试析埃及科普特人战后政治地位的演变原因 潘蔚娟

□ 学术动态

136 “未来十年的中拉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放放 张明德

141 “新全球合作机制的动力？”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范翊君 祝鸣

146 英文摘要

封三 本刊 2014 年第 3、4、5 期征稿启事，本刊征订启事

站在新起点的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杨洁勉

【内容提要】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接班一年来，在外交战略方面以延续和继承为主；同时，结合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国际形势面临重大挑战及国内外政府集中换届等内外形势发展，新领导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特点鲜明和内涵丰富的调整，如细化战略定位，更新战略思维，坚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主动、运筹战略布局和发展战略理论等。展望未来 10 年，中国外交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和提高执行能力，对中国外交的指导将更加进取、务实和有效，并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继续发展。中国外交战略需要更加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视野和思路，做到基于实践探索的战略建设，进一步调整战略目标、建构战略合作网络，深化战略理论研究。中国外交战略更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互动，使中国外交战略同中国的大战略更加紧密地结合，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国内支持基础。最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学界要有充分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努力建构和发展中国的战略学，并以此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关键词】 中国外交 战略思维 战略布局 战略理论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4)01-0001-13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新起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下简称“新领导”）在外交战略方面以延续和继承为主，如独立自主的战略思想，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定位，营造现代化建设和平环境的战略目标，以及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途径等。但与此同时，新领导根据内外形势的发展，在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特点鲜明和内涵丰富的调整：细化战略定位，更新战略思维，坚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主动、运筹战略布局和发展战略理论等。展望未来10年，中国外交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和提高执行能力，对中国外交的指导将更加进取、务实和有效，并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继续发展。

一、外交战略调整的内外动因

（一）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要求新领导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随着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全方位提升。在经济方面，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23万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26万亿美元，世界排名也从第6位跃居第2位，中国发展道路成为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选择。中国已是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应对挑战中与相关国际组织深度合作。在文教体卫方面，中国和世界更加紧密相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标志着中国在全面发展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大国意识普遍提高，国际社会不仅认可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二）国际形势的重大挑战要求新领导及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一是西方从借重中国走出金融和经济危机转为从体制和机制上约束中国。当前，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欧洲也渡过了欧元和欧债的“病危期”，西方开始淡化二十国集团的主要经济平台作用，低看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并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对中国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压力。

二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催化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困难。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把中国拖入“当事国”的境地，制约了中国在地区政治安全问题上的主导性和主动性。而且，在“经济上要中国”和“安全上防中国”的双重悖论下，中国原有以经济合作牵引中国—东盟关系的作用趋弱。此外，中日两大邻国发生更加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中国和朝鲜、缅甸等国关系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三是西亚北非政局持续动荡。三年来，埃及政局动荡不已，利比亚战争后遗症严重，叙利亚内战前景不明，地区国家宗教内部以及宗教和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尖锐，等等。西亚北非形势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中国能源安全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四是多国政府外交因内顾为主而增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抬头，新媒体和社会组织影响不断提升。多国政府外交政策呈内顾倾向，减少了对外妥协可能，有时还利用外部矛盾转移国内视线，从而增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三）国内外政府换届新政季节要求新领导综合和动态地调整中国外交战略

在当前世界维持基本和平的环境下，主要国家政府任期两届 10 年左右成为政治常态；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大潮的环境下，各国内外战略和政策调整不断提速。2012—2013 年期间，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朝鲜和中国等因政府换届而纷纷提出新的执政纲领，形成了外交战略和政策调整的集聚效应。此外，在国内国际问题相互转化的条件下，中国外交必须及时对国内各种诉求作出反应，如加快经济转型和深化体制改革，协调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关系，平衡国内示强要求和国际惧强心理，加强舆论监督和引导，达到内外统筹兼顾的目的。中国作为当代最主要的新兴大国，需要向世界昭示发展道路和国际作用；面对时代潮流和历史责任，新领导怀着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自然要进行战略和政策创新，在内政外交上“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

二、战略定位和任务

中国学者蔡拓教授认为，国际定位“通常是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①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指出，国际定位在观念结构中就是一个身份建构的问题。身份一方面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国际关系进程的一部分。^② 根据作者的研究，一国在全球的战略定位就是它对本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事务中实现其战略目标能力的总体评估。

准确定位有利于明确国家的属性和就战略目标与途径达成国内共识。党的八大对中国的定位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及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争取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好合作关系。”党的十三大系统提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四大后，中国就把自己的定位从“第三世界国家”逐步演变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利于凝聚党内和国内关于国家基本状况和基本任务的共识，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则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

当前，国内外在中国战略定位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中国近年来对自身进行了“多重复合的战略定位”：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仍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还不是全球性大国。近年来，中国学界大多数把中国定位为新兴大国。新领导接班以来，官方文件避免使用“新兴大国”而更多使用“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大国”。例如，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3 月 23 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李克强总理 2013 年 5 月 21 日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上的演讲用的都是“新兴经济体”。^③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对外强调“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

^① 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21-122页。

^② 参见[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111页。

^③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13年3月24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xjpzxfw_643729/zxxx_643731/t1024371.shtml；《李克强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13年3月24日，<http://www.>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① 事实也正是如此，同以往中国大国外交的重点是和各大国的双边、多边关系相比，现在是以全球大国的身份和视野规划外交，无论在外交战略和实践中都显出大国外交的理念、意识、气度、章法和处置。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在定位问题上还需要处理好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的关系。中国目前把世界各国主要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在国际社会，还有多种国家划分方法。美欧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民主国家、威权国家和独裁国家或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中东国家把世界各国划分为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尽管世界上对国家有多种划分，但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中国已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乃至超级大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大国，利益遍及全球每个角落。”^②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新著《李光耀观天下》中指出：中国是个崛起的大国。“一种看法是，中国会静悄悄地变得强大，扩大影响力，不会欺负人。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会显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第一种做法，但同时也会显示力量。”^③ 中国学者牛新春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应当追求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国际定位，以节省战略资源，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冲击力。”^④ 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分析了中国当前在全球外交、全球治理、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的表现后指出，中国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仅仅成功地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全球大国。^⑤

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lkqzlfw_644505/zxxx_644507/t1042441.shtml。

^①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13年6月27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53901.shtml。

^② Henry A.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 489.

^③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Pte Ltd., 2013, p. 31.

^④ 牛新春：《中国外交需要战略转型》，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期，第1-8页。

^⑤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三、战略思维和定力

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体（个人或集团）对事关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谋划（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一国的外交战略思维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系统以及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国家与自然的复合系统和复杂过程，外交战略思维既有假设，也对国家外交结果有明确的预期。^① 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要求加强战略思维，但新领导在中国外交上再次重申加强战略思维具有以下特殊意义：

（一）加强战略思维和主动规划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新领导兼顾“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 10 年外交方向和近期外交任务等长中短期需要，全面、系统和长远规划中国外交。新领导接班不久，就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进行第三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研究中国外交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加强战略思维”。^② 新领导对中国外交的界定远远超出传统的内涵，不仅重视传统的“高政治”外交，也重视非传统的“低政治”外交，对政府外交、政党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加强了集中统筹，运用综合外交手段实现外交目标。同时，各部门和各地方的外交外事也开始注意综合与统筹，在融入国家总体外交中实现共赢。

新领导认为，在综合国力日益增长条件下，要变“反应式”外交为“主动筹划型”外交，从战略高度规划和统筹中国外交。2013 年是中国外交新政的开局之年，新领导对全年出访进行了战略性规划。3 月，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突出俄对华的战略依托地位，并以此调动了美国提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的积极互动又带动了中国和邻国的关系，形成建设性的连锁反应。此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印缅孟和中巴横贯南北东西的南亚通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战略设想等。此外，新领导还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理念，以“人类命运共同

^① 参见洪昆辉：《战略思维与系统科学的方法》，2008 年月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战略思维的理论与实践专题讲座”的提纲，<http://www.xsbnzs.cn/webs/zhshj/content.aspx?id=3908>；朱奇：《战略思维方法》，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年版。

^② 新华社北京 2013 年 1 月 29 日电。

体”和“地区命运共同体”方向引领当代国际关系，以“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原则发展中外关系，以“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规范中美关系，以“真、实、亲、诚”四字箴言提升中非关系，以“亲、诚、惠、容”四字理念指导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

（二）强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

新领导就任以来，“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已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外交思维的两大看点。所谓“战略定力”，指认准长期战略目标，克服短期行为的诱惑和冲动，同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看待发展过程中的顺利与挫折。^①自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中国周边形势的挑战部分明显增加，中美在亚太互动中的竞争性上升，中日关系因安倍内阁的一意孤行而持续恶化，中国和菲律宾围绕黄岩岛的海洋权益矛盾深化。在此背景下，新领导强调战略定力，全面和科学分析形势，提出要坚持基本战略目标，从容应对挑战。通过一年来的各种努力，中国不仅基本稳定了周边形势，还推进了和俄罗斯、中亚国家、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周边国家的关系。

“底线思维”在一般意义上就是风险思维，但在中国外交上还兼指妥协的下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春指出：做决策、办事情，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②一年来，中国外交上的底线思维包含三重涵义。一是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不能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应增加忧患意识，做到有备无患。二是向矛盾对方明确划线，防止对方误读误判。中国在钓鱼岛和黄岩岛划出底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还有效地阻遏了某些国家可能的挑衅。三是防范和管理危机。中国不仅在周边面临世界上最复杂的邻国关系，还在其他地区面临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问题，底线思维是有效的危机管理指导思想。

定力和底线两者的结合，既明确了中国既定的战略目标和途径，也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对外关系的上限与下限，增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清晰度和透明

^① 周方银：《大国崛起需要“战略定力”》，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14日。

^② 转引自慎海雄：《领导干部要善于底线思维》，载《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4月7日。

度。一年来，新领导就是在复杂纷繁和扑朔迷离的内外环境下，按照既定的部署和方向，抓住主要目标不放，趋利避害，逐步推进中国外交。

四、战略布局和途径

（一）确定战略布局的优先次序

新领导全面梳理复杂纷繁的外交问题，调整了战略布局，并基本确定了战略优先次序。新领导在延续前任国别领域并重新布局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大国关系的理念和经略周边的思想，先后推进了“新型大国关系”和召开了共和国历史上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国更加突出营造周边和平发展环境和促进与世界既成大国、传统大国、发展中大国和地区大国（即“中等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双边层面，中国重点加强同俄罗斯和美国等大国以及主要邻国的关系。在地区层面，中国主要从加强经济和安全机制与缓和权益冲突两方面改善周边环境。在全球层面，中国继续推进国际体系改革，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在领域外交方面，中国更加重视非传统外交的建章立制问题。当前，从气候变化到能源安全、从防疫抗灾到水资源等领域问题日益突出，但与之相匹配的国际机制建设却严重滞后。为此，新领导把制度和规范建设视为领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多边外交中，提倡以同舟共济、互重互鉴、合作共赢等新理念指导各国的行为规范，特别重视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审视现有机制，分别予以维持（如国际法领域的国际法院制度）、发展（如安全领域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如金融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创新（如从各国国情出发推进气候治理的均衡发展以及合作应对相关风险）等。为了弥补当前全球治理的不足和滞后，中国还通过地区或群体途径促进全球范围的合作，加强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提升清迈金融协定，筹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中国—东盟的金融合作机制，重视外空、网络和极地等新公域秩序等。

（二）邻国优先和首脑驱动的周边外交战略

中国周边的邻国有二三十个，存在历史遗留和现实增生两大类问题。新

领导提升了周边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改变过去平均安排高访的习惯做法，将周边列为首脑外交的重点。从2013年3月起，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出访都是从邻国开始，两人还先后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9月）、APEC峰会（10月）和东亚峰会（10月）等重要地区合作论坛。2013年，中国通过高层互访和多边场合的双边会晤基本实现了和周边国家领导人直接互动的全覆盖。此外，中国还发展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了与印度、巴基斯坦、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阿富汗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启动了中—东盟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遏止了中国和一些邻国在海洋领土和权益争端的恶化趋势，促进了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两者建设性的互动与转化等。

（三）理念、重点和务实三举并重的大国战略

大国是中国外交的“关键”。中国把俄罗斯列为最重要的战略依托，两国具有战略互信并相互支持，大力推进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①

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也是困难的双边关系。在当前的国内外背景下，中美两国政府都努力解决双边的实际问题和争取当前实惠，从而获得国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更多支持，但作为两个主要全球大国的领导人，他们都具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发展规划。中国新领导以“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带动两国关系超越传统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同不搞对抗，争取相互尊重，促进合作共赢。在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互利、两军关系、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强了建设性互动。如果说中美两军交往在现阶段还是象征意义居多，那么双方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为突破口，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为抓手，正在实质性地推动双方的经贸关系。

虽然当前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是中美关系，但中国的“大国”范围更为

^①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13年3月23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xjzxfw_643729/zxxx_643731/t1024371.shtml。

广泛，因为“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理念。”^①中国正在推动与欧盟和欧洲大国以及金砖国家的关系，发展与地区大国（即“中等国家”）的关系。中国还在不搞“两国集团”的前提下，照顾广大中小国家的利益与关切，使中国外交的大国关系成为撬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杠杆。

（四）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的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

中国历来自视为发展中国家，但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重经济轻政治、重近利轻大义和重取轻予的倾向，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交流和共识也呈下降趋势。有鉴于此，新领导多次强调要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有时甚至要义先于利。在新的利义观指导下，中国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略性投入，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具体外交政策上，中国加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协商和协调，争取在政治共识基础上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加强在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惠民工程等方面的合作，并准备推出一批标志性合作项目。

五、战略的深化和发展

（一）中国外交战略需要继续延伸和充实

中国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大国，中国外交战略也处于不断延伸、扩充的历史性发展阶段。中国外交战略本身的制定、发展、完善和落实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外交全球战略涵盖全球、领域、区域、国家、社会等各个方面，中国在制定相关战略方面任务艰巨但经验有限。而且，外交战略又是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需在后者框架下筹划运行，形成整体有机互动。此外，中国外交战略又同世界各国外交战略具有互动和联动关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的继续提升，中国外交战略同国际社会的交集面还将进一步扩大。

^① 杨洁篪：《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载《求是》2013年第16期，第9页。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高政治”传统外交领域制定出完整的战略并付诸实施。但是，中国还要更加关注非传统外交议题的战略谋划和设计。非传统外交议题大多是当代急迫的全球性议题，但规范、规则、法律等建设严重滞后。中国作为全球大国，负有在全球性议题上“拿主意”和“定义题”的责任，中国因而需要在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防疫抗灾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上及早做出战略性决策，争取进入全球性议题的国际决策核心层，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发挥更富建设性的战略性引领作用。

（二）中国外交战略需要深度实践探索

外交战略和外交实践密切相关，外交战略在实践中发展并接受检验。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必须逐步超越狭隘的短期利益思维，不断探索长远和全面的战略利益，并努力达到新的综合平衡。为此，中国必须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气魄和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在中国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进行深度探索。诚然，中国在调整历年来坚持的外交战略原则方面需要谨慎行事，但可以多做些战略性探索，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提高认识，在条件成熟时提出和实施新的战略原则。

在现阶段的探索中，中国是否可以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对友好国家治国理政的参谋咨询作用；在坚持“不在外驻军”原则的前提下更加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以及双边军事安全合作；在坚持“不当头”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同主要大国、金砖国家以及一些重要的战略伙伴邻国共商大计和主动谋划；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增加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安全磋商和军事合作的内涵。

（三）中国外交战略需要理论创新

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中已经并将遇到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战略目标上，中国应否建立更具世界意义和更加系统化的理论的问题。中国自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理论以来，先后于2005年和2011年两度发表和平发展道路的白皮书，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不仅需要确立本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目标，而且还要超越西方的泛和平主义，建构国际社会共同的和平理论体系，提出人类和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途径，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在战略合作方面，中国应否建构战略伙伴的体系化理论问题。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并把战略合作伙伴系列为最高级别的战略合作。中国自1993年与巴西建立第一个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已与四分之一强的建交国（近50个）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作用尚不完全明确，在战争与和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推进国际体系改革方面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中国要从战争与和平的高度研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理论问题，尤为重要的是要界定战略伙伴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内涵，研究其作用，探索其网络化的可能性，还要从避免全球和地区集团性对抗的角度研究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军事安全合作中的作用。

在战略理论上，中国应否逐步调整一些理念和观点。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正在部分地改变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已经主动让渡了部分主权。此外，西方对国家主权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念和采取新的措施，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问题概莫能外。不干涉内政、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和海外驻军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有关主权的实践和理论也有发展。2008年，中国海军开始在亚丁湾进行反海盗护航，2011年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利比亚大撤离。中国学者王逸舟提出中国应推行“创造性干预”外交，认为“‘创造性介入’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种取向。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逐步从一种利益主要集中于所在地区的区域性大国转变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越来越多地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国际事务中，中国必须要对国际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超越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低调不介入’的态度。”^①另一位中国学者沈丁立也建议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不妨建设性干预。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应该塑造朝鲜半岛的稳定，加强与朝鲜的沟通。让它感到安全的同时，要施加足够的影响力。^②在国内外形势迅速多变的环境下，中国国内围绕有关问题的讨论和辩论正日趋活跃和热烈。

^① 王逸舟：《中国应“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载《国际先驱报》2011年12月20日。

^② 《朝鲜半岛“外交战”已全面展开 专家建议中国干预》，载《东方早报》2011年12月30日。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指出：“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①我们在思考、探索、制定和落实中国外交战略时，其实更应如此。展望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内外环境，我们更要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互动。首先，中国外交战略要同中国的大战略更加紧密结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外交将继续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主要任务。但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和国际地位持续提高，国家外交战略要体现更大的能动性，要更加主动地促进国家发展，做到内政外交的建设性互动。其次，中国外交战略需要巩固和深化国内支持基础。考虑到今后国家将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趋势，我们在制定和落实外交战略的全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倾听、采纳和反馈于各类行为体，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国际化 and 外交意识的教育，重视舆论的理性引导和有效宣传，特别是不要过度提升群众对中国外交能力和成效的期待。再次，中国外交战略制订和发展需要在更加动态的思维框架下进行。中国在制订和落实外交战略时需要避免线性思维，要以全球大国的视野，动态地前瞻外部反应，设想多种多套预案。中国在推出重大外交战略和政策时，要加强前期宣传和事先沟通，准备配套政策措施和宣传材料，因为事先准备的代价远小于事后补救。最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学界要有充分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我们要在外交黄金时期以更丰富的实践和更充分的理论自信与自觉，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努力建构和发展中国的战略学，并以此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收稿日期：2013-12-28]

[责任编辑：张 春]

^①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

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 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

——兼议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金应忠

【内容提要】传统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相互争夺世界霸权。不仅其政治关系是分裂的，经济关系也是对抗的，没有统一的协调性制度安排。由此形成的历史惯性，使二战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构成的两极格局依然具有上述特征。虽然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始终处于“冷战状态”。随着共生性全球体系的形成，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代意义，使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存在的依据在减少，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的动力在减弱，当代大国关系面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性需求和机遇。中国适时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既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希望给当代世界摆脱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提供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不仅具有理论与实践依据，而且科学把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趋向。

【关键词】传统大国关系 共生性全球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金应忠，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014-12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受到力量对比变化的影响，大国关系进入了新一轮调整。目前大国关系呈现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对话与合作伙伴关系有所增强；其次，国家利益仍是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主动力；再次，传统大国普遍陷入结构性困境；最后，新兴国家正成为大国关系的新主体。能否避免传统大国关系中的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局面，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之举。

一、当代大国关系没有大规模结盟分裂对抗的本钱

新型大国关系是相对于传统大国关系而言的。尽管历史上一直有大国与小国之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就有在某个地区内几个相对的“大国”争霸的记录，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国关系是在出现由几个大国有实力瓜分世界市场的背景下才开启的，并形成了传统大国关系概念。

传统大国关系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二是相互争夺世界霸权。传统大国关系不仅政治关系是分裂的，而且经济关系也对抗，没有统一的相关协调性制度安排。由此形成的历史惯性，尤其是主导意识的历史惯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形成的两极格局依然具有这两个基本特征；虽然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相互间一直处于结盟分裂对抗的“冷战”状态。就当时的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而言，之所以会陷入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在理论上未能科学认识当代世界的统一性是一个关键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当代世界统一性获得了越来越清醒、科学的认识，不仅坚持改革开放而且在国际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既不愿做超级大国，参与地区霸权、世界霸权的争夺，又不希望看到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因而作为对大国关系发展的正面诉求而寻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希望给当代世界摆脱尚存的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提供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立足于避免大国关系大规模结盟分裂对抗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既符合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也是当代大国

关系发展面临的历史性需求和机遇。自从和平发展时代到来后，尽管传统国际体系依然发挥着相当强的影响力，显示了某些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但是避免大国关系形成大规模结盟分裂对抗同样也获得了史无前例、日益增长的掣肘力。^①这个掣肘力就是：由于相互依赖性的发展已经造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性全球体系，使当代世界更显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这个掣肘力也为传统国际体系转型、摆脱历史惯性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任何国家的自我实现都依赖全球各地的他者自我实现的可能需求与可能提供的成果；尽管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但是都不得不承认他者存在的价值，不得不承认他者稳定发展的意义，不得不接受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救助，也不得不相互作出必要的妥协，不得不寻求适合各方需要的社会建构与制度安排，不断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便在寻求矛盾对立统一中谋求各自的自我实现。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既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也是面对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共生关系的合理选择。因此当代大国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相互尊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高发展的稳定性、可持续性，具有现实需求，不仅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也符合所有大国的发展利益，显示了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要求，显示了当代世界统一性的历史规定。

当今世界，所有大国都处于共生性全球体系之中^②，尽管各自对全球共生关系的依赖程度有差别，所处的地位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但是谁都只有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才能生存、发展，谁都只有在做大共生性全球体系这块蛋糕的过程中获得更大权力和更多利益。各自优化和优化选择全球性共生关系是任何大国的最佳选择。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就是遵循了这种最佳选择。如果说这种选择使曾经四分五裂的欧洲走上了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使曾经各自发展的大西洋两岸国家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那么未来的更大发展依然得依靠对业已形成的共生关系能否进一步作出优化和优化选择。两极格局的

^① 金应忠：《论两个体系的发生和发展与全球问题》，载《国际展望》2010年第1期。

^② 金应忠：《国际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解体为更大规模的全球性共生关系的优化和优化选择提供了更为广宽的空间和机遇。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也提出了这方面努力的必要性。

尽管美国依然有沿袭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的欲望，但是一直面临难以继的挑战。美国确实有一帮盟国、盟友，搞一些局部性“群狼战术”固然还有点本钱，但是成功率也有限，说明本事并不大，更不用说没有本事让其所有盟国、盟友都相信面对共生性全球体系搞全面性的全球对抗是必要而又值得的。何况，如果其他大国没有意愿与其做对手，这台戏也唱不起来。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唱这台戏既没有必要性又不值得，有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汲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面临禁运、封锁、制裁等一系列严峻挑战，但是最终都证明挑战发起者美国及其跟随者循着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既困难重重，又都落得失败的命运，而中国反而变得更强大，表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符合国情又适合世情。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足够大的回旋空间而能不参与大国对抗，也有足够大的创新智慧来优化和优化选择与他者的共生关系，为自己的发展开拓空间，根本没有理由要“东施效颦”，拴在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的尾巴上。

二、结盟分裂对抗并非处理大国关系唯一和不可避免的选项

正如任何事物均有两重性一样，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大国处理相互关系也有两重性。这种内生性动力的双重性源自于国家具有独立性、主体性与合群性、共生性的基本属性的双重性。如果说独立性、主体性属性赋予大国内生的竞争冲动，显示张扬的个体性，甚至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势，那么合群性、共生性属性的外在必然性是要与他者共生，形成共生关系；两者都是维护生存、发展、寻求自我实现所必需的。当然，大国自我基本属性的双重性如何转化为具体的处理相互关系的动力双重性则是随所处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人说两国之间，“当商品进不去时，士兵就要跨过去”，讲的就是变化的一种动因，表明不存在选择的绝对性而只有相对性，都是相对于时间、地点、条件变化而言的。

“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开启的国际社会共生关系，尽管出现了传统大国

关系概念，但是传统大国关系的争斗不仅无法阻挡国际社会共生关系的发展趋向，而且共生性全球体系的逐渐孕育、生长、发展，也赋予大国关系逐渐具有体系结构性，使大国关系成为共生性全球体系结构性运动的组成部分。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无论是国内社会发生重大变化还是相互间关系出现显著变动，都逐渐出现了互动连锁性效应，即使各种危机也逐渐具有互动、联动性，经由共生性全球体系结构的传导机制而具有了外溢性、蔓延性。^①这就告诉我们，共生性全球体系从其开始孕育、生长的那时起，就是作为共生关系的结构体系发展起来的，不仅大国之间的竞争冲突与结构性矛盾同在，而且大国之间的合作也需要由结构性矛盾转化而成。这当然均因条件变化而变化，然而最基础性的条件是大国之间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都存在于共生性全球体系之中，都必须适应共生性全球体系的体系结构运动变化需要。这就是说只能以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来应对，以便优化和优化选择社会建构与制度设计，既避免因结构性矛盾而使相关各方迎头相撞，又能为结构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合作创造条件、开拓空间。

不错，国际社会不存在统一的政府来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但是任何大国自身基本属性的对立统一性的规定性要驱使其寻求这种可能性，必然要对他者为此“鸣其声矣，求其友矣”，因而出现了交往沟通、对话协商的需要。正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构建与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趋势，出现了几乎所有国家都自觉地参与到这一趋势中来的盛况，显示了当代国家对认识相互关系的新的觉醒。尽管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存在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情况，但是既然这一趋势已经开启，那么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纠正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符合各国的发展利益，而各国也只能以寻求自我双重基本属性对立统一来寻求自我实现，不得不接受国际社会的某种拘束。

当代的美国同样是独立性、主体性属性与合群性、共生性属性双重基本属性的对立统一体，这种属性的规定性使其处理大国关系的动力同样具有双

^① 金应忠：《为何要研究“国际社会共生性”——兼议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展望》2011年第5期。

重性：尽管依然具有引发与其他大国结盟分裂对抗的内生性竞争冲动，在美国主导下使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依然具有历史惯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政治军事联盟并不因“冷战”结束而解体，甚至还在继续拉帮结伙拼凑新的联盟，以面对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于是中国等新兴崛起大国成了美国高度警惕的对象。尽管中国反复表明不威胁美国，但美国依然很难完全听得进去。美国甚至对其盟国、盟友同样具有相当高的警惕，不仅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监视，而且需要不断塑造共同的敌人，以便将他们如蚱蜢一样拴在一起，这或许与美国对当代世界统一性的认识相关联，似乎只有按美国的意志将世界统一起来，世界才有前途。但是美国处理大国关系还有另一面，即美国必须也只能在共生性全球体系中才能寻求自我合群性、共生性的自我实现，因而即使具有强烈的利己动机也必须为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合作共生创造条件，显示了共生性全球体系结构性力量的不可抗拒性。这就是说，尽管美国依然维系着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但是仅依靠这种历史惯性已不能达到完全的自我实现，不能不更多地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现实的匹配性。对美国的这种关注，我们不仅要看到其利己的动机和面临的困难，更要研究其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吻合性，需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客观理性。

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的历史惯性是基于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但是共生性全球体系生长、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总要找到解决的办法，创造某种新的条件，使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变成可调和性，这同样符合矛盾对立统一规律。2000 多年前中国先贤荀况已经发现“人能群”。就是说人有智慧和能力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使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变得可调和，实现矛盾的对立统一，这同样为 19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发展历史所证明。进入 19 世纪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全球拓展，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所显示的结构性矛盾持续凸显出来。面对各种危机、冲突、战争的不断爆发，对抗逐渐由局部性、区域性演变为全局性、世界性，进入 20 世纪后又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三十年代大危机”。当年的当事国家都对此几乎是一筹莫展。当年许多人都认为世界矛盾具有结构性，危机、冲突、战争都具有结构性，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不可调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不仅走出了曾经被许多

人认为不可逾越的一系列困境，而且终于走进了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尽管人们对此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根本而言表明人有智慧有能力“能群”，有智慧有能力科学认识世界范围的结构性矛盾，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优化和优化选择社会建构和制度设计，因而能不断地从矛盾冲突对抗的困境、泥淖中走出来。

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尽管确实存在众多一时无法调和利益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当今国际社会促进这些结构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合作的动力生成因素越来越多，包括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分工越来越细的跨国经营的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巨额游资都要寻觅生财之道；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必须由各大国共同参与治理；需要相互救助的情况经常发生，即使超级大国也不例外；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平等均衡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科学技术的创新，知识的创新等等，都需要人们展示“建构性思维”，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诸如此类的动力生成因素组合成促进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合作共生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

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没有意愿做超级大国，参与地区霸权、世界霸权的争夺，又不希望看到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而是希望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因而作为对当代大国关系发展的正面诉求，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依据，而且科学地把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向。尽管至今尚不可能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地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但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大国关系的传统意义的完整性出现了消退、减弱的趋向。如果说欧洲曾经是传统大国关系的发源地，那么这种趋向今天也首先发生在欧洲，显现了“相反相成”的效应。所谓传统大国关系，在历史上最初仅涉及欧洲的大国关系。欧洲曾经是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的实践区。美国崛起后，传统大国关系才扩展到大西洋两岸，但是中心依然在欧洲。

传统大国关系的结盟分裂对抗最终形成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在欧洲。说欧洲具有大国争霸的悠久历史传统或许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 27 年的争霸战争，至今依然吸引着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尽管与美国一起参与两极对抗，至今依然是美国盟国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还不时地与美国采取同心合力的行动，但是在内部关系上却结束了结盟分裂对抗，走上了一体化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尽管异常艰辛，却也显示了当代人优化和优化选择共生关系、优化和优化选择社会建构与制度设计的巨大智慧和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内部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历史性转折，尽管人们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是可以随条件变化而停顿的，人们只能永远臣服于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是站不住脚的。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在其发源地欧洲出现停顿的现象告诉人们：第一，尽管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已经延续了几乎 5 个世纪，但并不存在不受任何条件制约而具有无限延续性的可能。第二，当代共生性全球体系的发展必然会迫使人们在寻求合作中寻求自我生存、安全与发展，人们也有智慧、能力与胆识直面结构性矛盾并创造条件将其转化为结构性合作，实现合作共生，因而迎来了国际制度创新蓬勃发展的时代。

按照传统大国关系理论，当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时，中小国家为了维护自我生存与安全都将不得不选边站，从而造成世界整体性的结盟分裂对抗。如果说这种局面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实已并非完全如此，同样显示了传统大国关系的传统意义的完整性出现了消退、减弱的趋向。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仅两极对抗年代有中小国家选边站的情况，而且这种现象至今还存在，但是更多国家并没有选边站，尤其是一批新兴经济体几乎都没有这样做，因而曾经出现过声势浩大的“不结盟”运动，因而美国在今天要纠集一批国家对某个国家策动一场“狼群攻击”也并非易事。尽管一些国家至今在概念上是美国的盟国，但并非时时、事事都按美国意志冲锋陷阵、英勇献身。这些事实同样告诉人们：第一，如果说至今确实依然存在某些中小国家选边站的情况，但是在共生性全球体系高度发展的时代有足够大的回旋空间为自我发展获得条件，选边站不仅不是唯一的选

择，而且也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有的国家明知对自己不利，但即使要想从选边站的“围城”中走出来也并非易事。第二，面对共生性全球体系的高度发展，各国与他国的关系都面临如何优化和优化选择的考验，以便首先满足国内民众改善生活、增进福祉的需要，因此对是否有必要“选边站”通常则变成一事一议，独立自主作出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大国关系的历史惯性还在延续，传统国际体系尚有存在的空间，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还要经历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因此和平发展时代是传统国际体系与共生性全球体系并存的时代。在此时代到来后，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大国关系的传统意义的完整性正在消融，这不仅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了空间，而且也国际体系转型、摆脱历史惯性提供了条件。当然新型大国关系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要变为现实性，仍需要我们贡献出智慧和能力。

四、走出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需要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共生性全球体系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赋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代意义。传统大国关系的传统意义存在的历史条件正在逐渐消失，相应的一系列传统观念也在失去存在的依据。因此，有必要研究可以取代的观念是什么，以便使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新的观念层面上。

例如，当代大国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分配世界财富还是如何增值世界财富？是否需要用世界财富增值论取代传统的世界财富分配论？

如果说随“大航海时代”到来而开启国际社会后，几乎所有大国乃至崛起中的大国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分配世界财富以及如何为此抢占有利地位，因而发生了抢占世界市场的争夺，那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大国关系的模式则逐渐发生了变化。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上逐渐变成一国财富的增值不仅并不是剥夺他国财富，并不意味着他国财富的减少，而且事实上给他国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增值的机会。不仅大国有财富增值的机会，而且即使中小国家也有财富增值的机会。传统的新兴大国崛起必定会抢占世界市场正

在变成全世界创造市场，必然会瓜分世界财富正在变成全世界贡献财富，必然会导致传统大国的衰落正在变成传统大国继续兴盛创造条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财富固然获得了巨额增长，然而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却也因此获得了巨额财富，不仅在向中国的巨额出口中获利，而且在向中国投资中获利，波音、空客等众多大公司大企业都是获利的大户，也因此为相关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境外许多昔日的中小企业也因此变成了大公司大企业。因此确切地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仅为世界创造了市场而且为世界贡献了财富。所以在当代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用世界财富增值论取代传统的世界财富分配论是有依据的。对各大国而言，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缩小他国财富增值的空间，而是如何管控与他国的矛盾与分歧、借助他国财富增值的机遇实现自我财富更大增值。

再如，当代大国关系变动是权力转移还是权力相关扶持？是否需要用权力相互扶持论取代传统的权力转移论与权力博弈论？

传统大国关系变动的过程是权力博弈、权力转移的过程，甚至还求助于战争。这种权力博弈、权力转移论关联着传统的世界财富分配论。按传统的世界财富分配理论，权力是财富的源泉，财富是按权力来分配的，权力的转移意味着财富的转移。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依然有人认为权力是国家间政治的核心，应该为权力而斗争，美国也至今依然要坚持领导世界，但事实上大国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显然不是权力转移，而是各自的权力需要通过相互合作来实现，通过相互支持来维护。战后这种大国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表现在许多方面：第一、尽管一些国家依然企图使政治权力成为财富的来源，但是这种机会正在变少而不是增多。对任何国家来说要获取更多财富，根本上依赖本国产品的比较成本优势，谁具有最大的比较成本优势谁就具有最大的竞争实力。就此而言，国家实力、国家的财富最终来源于比较成本优势。如果说这种比较成本优势也同样带来权力，那么这种权力是依靠他国的承认、依靠与他国的合作才能实现的。这种规则的变化客观上不仅大大削弱了为寻求财富而疯狂争夺政治权力的冲动，而且增强了寻求与他国合作实现自我权力的内生动力，显示了权力实现的相互性。当代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均具有共生性，各自的权力、利益之间都具有共生性，

因而使各自的权力、利益得到自我实现才有可能，其内在的逻辑是权力实现的相互性而不是权力转移性。

第二，尽管一些国家依然企图使政治权力成为谋求、控制资源的工具，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样在削弱这种必要性。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扩大了获取原生性资源的可能，而且提高了合理利用资源、充分发掘原生性资源利用潜能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出现了集成创新、开发创造新资源的可能。如果说这也能带来权力，那么这种权力不仅是创造权力增量实现的，而不是从权力的存量中转移获得的，而且可能获得的巨大权力增量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只要想一想美国创造了互联网，不用一枪一炮创造了多么巨大的权力^①，构成了世界霸权新的支柱，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权力不是叫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也是这个道理。但是这种权力自我实现的前提条件同样是要获得他者的承认和需要，与他者有自愿合作的可能。人类社会的共生关系是以资源为纽带的。^②如果说曾经的纽带是原生性资源，在带来共生关系的同时曾经也带来对抗与争斗，而今天正在进入由创新资源为纽带的共生关系时代，需要的不仅是智慧和创新能力，而且是相关各方的合作共赢。美国如果不放弃利用互联网作为攻击他国或监视他国的工具，必然会迫使他国不得不另辟蹊径，削弱美国在该领域的权力和财富也不可避免。显然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在根本上对美国是有益的。

第三，随着共生性全球体系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赋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代意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救助，国家权力的相互扶助成了常见的国际现象，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构成了截然相反的矛盾景象。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际事务场域，既不存在一国可以独占的权力，也不存在仅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就能维护的权力。国家之间的相互权力救助同样显示了相关各方的真实需求。不仅仅基于道义，而是基于共同的或相似的利益，本质上是对对方某种权力的肯定，根本原因是相关各方的利益、权力的汇合点越来越多，不仅有日益增多的利益汇合点，而且有日益增多的权力汇合点。维护他者的某种权力就是为了维护自我的某种权力，具有相辅相成性。在国际

^① 杨剑：《数字边疆的权力与财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版。

^② 胡守钧：《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活动的许多场合，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权的行使，都可以找到利益、权力汇合点的各种案例。发现和拓展大国关系的利益、权力汇合点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当代大国关系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其中一个重要切入点是要彼此客观理性看待双方战略意图中利益、权力的汇合点，尊重和支持对方的利益、权力合理关切，避免只要对方客观理性，而自己看待对方却不那么客观理性。如果过度强调对方战略意图与自己的分歧点，过分强调权力使用方式的分歧点，甚至以偏概全，不顾及双方战略意图的利益、权力汇合点，势必会将对方视为对手，这是非客观理性的必然结果。善于发现和拓展大国关系中各自战略意图的利益、权力汇合点，是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的重要前提。否则欲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就会相当困难。

[收稿日期：2013-08-20]

[责任编辑：陈鸿斌]

“比异”齐飞？*

——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苏长和

【内容提要】 尽管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中美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界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讨论多从“求同”视角出发，力图通过发掘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因素和交集所在，推动合作潜力和空间的扩大。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途径。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性却不可低估，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突出差异并非否定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正视和摆正差异前提下如何深化合作。因此，中美之间既要求同，也要比“异”。求同是为了寻找共同合作的基础，比“异”是为了使各自更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对方。实际上，在比“异”的基础上求“同”，也正是 40 多年前《中美上海公报》得以签署的智慧所在。恰当的“比异”，正好可以看出两国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奠定基础。

【关键词】 新型大国关系 比异与求同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4)01-0026-13

* 本文得到笔者主持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中美在国际制度改制建制中的政策和行为比较研究”以及陈玉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研究”（项目编号：11JZD047）资助，特此致谢。

中国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探路者和先行者。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 60 多年外交实践中，中国一直在国际关系中探索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前苏联）和美国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俄（苏）关系历经坎坷和磨合，现在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典范，是维护国际和平的关键力量。就中美关系而言，准确地说，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探索已历经了 30 多年而未止。

2012 年底以来，中美两国首脑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视，使得这个概念迅速升温为中美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讨论多从“求同”视角出发，力图通过发掘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因素和交集所在，推动合作潜力和空间的扩大。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途径。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性却不可低估，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突出差异并非否定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正视和摆正差异前提下如何深化合作。因此，中美之间既要求同，也要比“异”。求同是为了寻找共同合作的基础，比“异”是为了使各自更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对方。实际上，在比“异”的基础上求“同”，也正是 40 多年前《中美上海公报》得以签署的智慧所在。恰当的“比异”，正好可以看出两国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奠定基础。本文在“比异”的基础上认识和思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希望能够为时下学界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提供一个补充。

一、历史与规律

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背后必有规律。人们对某种现象背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受到时代和立场的局限的。大国关系交替背后有很多规律和可能性。有关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跳不出对抗的规律，多多少少被学界和一些国家夸大了；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被一边倒地聚焦于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新兴大国“不守规则”、新兴大国“威胁论”上，这种学术舆论环境是不公平也不合常理的，具有误导性。在欧洲内部，大国关系曾经

长期表现为以冲突方式来处理实力对比的变化问题；在西方崛起的历史上，长期以战争方式取得对其他世界的优势和支配地位，其崛起史很大意义上就是一部战争和扩张史；在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中，美国自身同样是通过战争方式确立、并惯常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方式来护持自己的霸权地位的。

按照这种建立在地区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规律研判中国未必有效。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经验要复杂得多。西方需要学习中国历史，才能够为其与中国打交道找到新的坐标；反过来，中国也需要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偏狭，向西方将自己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历史讲清楚，帮助别人理解中国与世界的特殊关系。这对崛起中的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都是极为必要的。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渴望以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想要平等，但别人不给你平等。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粉碎了一大批中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对列强的幻想。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很大意义上是由20世纪前20年的重大事件决定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100年后回顾这场战争，对我们向前看也许不乏意义。今天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后来的历史至少产生三大影响：其一，俄国十月革命，反抗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其二，德国在屈辱中东山再起，反抗的是凡尔赛体系，以致走向极端；其三，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革命建国的道路，反抗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

在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中，中国的作用和意义至少有四个方面被低估了；不了解这四个方面，外人将很难理解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前景。第一，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被低估了；第二，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运动的示范和启蒙效应未受到重视；第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脱离美苏对抗的两极阵营对推动冷战结束的意义被低估了；第四，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以和平方式致力于国际体系改革的意义也很少被重视。

中国与国际体系故事的主线，是从一个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到通过自强不息成为参与并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一直是在与各国合作但是又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在为国际体系改进作贡献。中国显然在以与过

去大国不同的方式塑造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全新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如果盲目学习美国崛起的道路，追求与美国道路之“同”，中美之外的国家会怀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因为“更像”美国，也必然会和美国同位竞争而发生冲突。从比“异”意义上，新型大国关系还应该重视对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的研究。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一种新型大国呢？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制度的节制属性。中国的和平外交并不只是外交修辞，实际上更多地植根于中国的制度。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会谈中，面对对方有关中国是否会侵略扩张搞殖民主义的疑虑，从制度层面上进行了解惑：“我们曾受过殖民主义的祸害，我们也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我们怎能走殖民主义的老路去侵略别人呢？这是不许可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所不许可的。……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规定在宪法里的基本政策。……一个在从事和平建设、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国内各民族平等、人民享受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殖民主义和侵略思想的，因为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朋友们也许会想，这只是现在，你们现在还不强，强大以后你们的制度是否保险？中国人民懂得，不仅要有目前的制度，而且这制度还要不断改进，这样就不可能发生那种危险。”^① 本文不对中国制度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但是中国制度背后的伟大精神应该值得关注。中国制度体系背后的伟大精神是“公”，确保了“公道”理念最大程度地贯穿于治国理政、制度设计、内外政策实践中。“私道”支配的制度，政治因被财团绑架，极易成为财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外交无论在逻辑还是实践上都更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

第二，中国制度的节制与和平属性可以从中国现代化道路实践中得到启示。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是在以内部制度创新而不是对外扩张转嫁危机的方式消化压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过去大国武力扩张的道路。人类近代以来的大国成长历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在其现代化历程中以自我创新的方式完成和平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在确保军事力量用于国家领土、主权、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178页。

安全的防御以外，没有参加国际军备竞赛，从而保证财政资源更多地投向民生。历史上许多新兴大国几乎都参与到军备竞赛中，守成大国几乎都迷信黷武主义思想，使得暴力文化成为大国关系的一种氛围和风气，或者一种大国国际政治文化。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中道思维而不是结盟思维与大国开展外交，这有助于打破历史上大国关系结盟制衡最终走向结盟对抗冲突的规律。中国官方的外交话语中经常会出现“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这句话。国际关系学界对这句话的学理解读还不够。历史上大国关系走向对抗无不先从追求结盟开始。“结伴不结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认为结盟是旧时代国际政治的一大缺陷，中国也不支持或反对任何国家领土被他国所用，作为威胁第三国安全的基地。大国关系一旦形成结盟态势，彼此拉帮结派，世界一定会分裂，中小国家将被夹在结盟对抗的大国之间，左右为难。这也正是历史上大国关系和大小国家关系的悲剧。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坚持可贵的“中道”理念，维护国际团结特别是大国团结，从而成为突破西方历史上大国冲突规律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中国历史文化中“报”的含义是丰富的，外人对此若不理解，也很难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走势。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中合作的理念主要基于“一报还一报”，少有“以德报怨”的内涵。西方战争史中有无数的“一报还一报”的例子；其社会科学中对合作的研究，主要基于“一报还一报”的逻辑，认为无此则合作难以演进，有此则合作可以延续。中国历史文化中也有“一报还一报”的内容，但绝少“恩将仇报”的事例，同时还有被大大忽视的“以德报怨”的内容。“以德报怨”是一种宽恕，它比宽容的内涵要更广泛。有人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始终在国民中进行的“百年国耻”教育不无担忧，其以“一报还一报”的逻辑来理解来推导中国，认为中国强大了会因此而复仇。^① 这种理解是单向度和肤浅的。中国确实曾经是国际体系的受害者，但中国的理解是，唯有此经历，才知道不能再像他国过去那样加害于人。中国对强大的理解如中国武学的真谛一样，是“不被欺负”，而不是以力胁

^① 例如，近年来有种观点就认为，中国应该放弃百年国耻教育，过多的“屈辱观”教育会成为中国崛起的思想负担，也会使国际社会（准确地说是侵略过中国的一些西方国家）对强大的中国形成担忧情绪。

迫人，去“欺负别人”，中国在道义上接受不了大国强国随意欺负小国的“失德”行径。当然，“以德报怨”绝不意味着牺牲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利益。从此意义上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果顺着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一报还一报”逻辑讲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别人一定认为你强大了会欺负他国，这也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构建必须超越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局限的迫切意义所在。

大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比较和比“异”，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中国作为旧国际体系的受害者，以正面心态和行动参与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二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使其更接近一个新型大国去思考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其中，共生而不是对抗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支配逻辑，这也是中国而努力为新型大国树立的一根标杆。因此，如果从两国集团或者“中国更像美国一样行事”的思路去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之间既可能出现同质竞争带来的冲突，其他国家对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也会心存疑虑和不安。当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单方面取决于中国是新型大国，也取决于美国是否有向新型大国转化的潜能，如此才能共同打破大国冲突的历史规律，一起走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这需要美国做出艰难的改革，美国确实需要改革，以体现出其作为大国的责任所在。后文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政治部分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二、秩序与道路

对比美国与国际体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两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道路有很大差异；其实，彼此对秩序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是美国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应该回避彼此对世界秩序理解的不同，委屈求同，似乎也不是两国的性格。美国声称维护的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中国要构建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中国文明始终存在一种倔强固执的基因和尊严，就是从来不甘寄托在别人的文明羽翼下。美国作为世界大国，自然也不会放弃其苦心建构起来的所谓自由民主世界秩序。不管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还是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观，这两

种秩序观还与两个大国国内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都有根深蒂固的国内基础。

中国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比较来说，美国已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以军事联盟、金融、经贸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或霸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但并不局限于此。中国的崛起在改变世界过去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结构，世界经济中心两百多年来首次出现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东移的趋势，世界经济的地理格局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两个中心两个体系的特征，也即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所形成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寄生型经济体系，以及中国作为关键的新型新兴大国，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共生型经济体系，中国已成为世界上 128 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后一种体系既深深参与到前一种体系中，但又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两种体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口参与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利于巩固后一种体系，同时会削弱前一种体系。这是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一大深刻变化。中国同时与两个体系有分寸地打交道，并从中受益，避免两个体系的对立和冲突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处理好与两个体系的关系并稳固经营和壮大后一种体系，是中国在新时期的战略机遇和条件所在。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美国秩序的全面胜利。相反，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推行的世界秩序表现不佳，在走下坡路。美国一直声称其构建及维护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美国崛起以来的几乎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法律、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历史等，都是在论证这一秩序，这一知识体系因为名实不符，现在遇到危机。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多少带有一点神学色彩，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看世界，将世界分为好的与坏的、自由民主与非自由民主的两部分。想要别人做到的，自己必先要做到。欲占领国际道德制高点，自己必先要成为道德楷模，否则就应该独善其身，将自己的事情做好，成为君子之国，礼仪之邦，然后再兼济天下。21 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一系列事件，例如关塔那摩虐囚、量化宽松、华尔街庞氏骗局、网络监听、无人机滥用、阿富汗战争、“阿拉伯之春”、

利比亚干涉、叙利亚干涉等一系列事件，让美国的秩序观和信誉大受损失，让人感受到美国说的和做的原来差距那么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曾经竭力要求别国做到的那些所谓自由民主标准，正成为别国用以嘲讽美国国内政治的标准。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要更为务实、更为现实。务实和现实并非唯利是图，也非重利轻义，而是实事求是。中国人对世界、对多样文明一直存有敬畏之心。美国认为自己的技术文明优越，中国认为自己的文明悠久。认为自己文明优越的国家容易在对外关系中产生优劣卑贱的观念，认为自己文明悠久的国家容易欣赏别人、尊重别人。文明观的差异，使得中国人从来不把别人想象得和自己一样，也从来不理想化地要把别人变得和自己一样，否则就会犯错误。中国崛起以后，世界上很关注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从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看，中国希望建设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观并没有抽象偏狭的口号，核心内容大致是各国及其人民之间要做到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互助、文化互鉴。要做到这一点，公道、共生、包容、有序、协商、共赢等价值就变得很重要。

中美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和实践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在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观念中，一个“为公”的天下或者“为公”的国际关系秩序，自然得有“为公”之道。美国的干涉旗号会打上“私道”色彩的“人道”，但是中国人看问题却会认为，没有“公道”，怎么能实现“人道”呢？当今国际关系是有“公道”的衡量之器的，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基本原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国际关系基本秩序之“公道”。叙利亚之所以在个别外来势力影响下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恰恰是这些外来势力不能秉公行事的結果。叙利亚问题不单是个内政问题，它之所以为大国所关切，是因为一些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频繁试探和突破主权国际秩序的底线问题，其危险性不仅影响到中东地区政治，更重要的是一旦主权国际秩序被打破，干涉的大门一旦被打开，遭殃的将不只是叙利亚，而可能是更多的小国。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内容之一是大国不该随意欺负小国。叙利亚问题让人想起一战前的摩洛哥危机，二战前捷克的苏台德问题，以及冷战结束不久的科索沃问题。

一种世界秩序是否一定以一国价值和制度标准来规范、统一他国，是存问存疑的。在一个多样文明和价值的世界中，学会与他国他人共处共生，而不是以自己的价值指导别人，教训别人，是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中美两国在世界秩序的方向和内容上存在着不同。但是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相同也不必然意味着就会合作。在彼此孤立的世界中，志同道合才有道合，道同才可为谋。不过，在一个多样多道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大国要学会与不同道者合作，在比“异”中相互改进，可能更为必要。

中国改革实践中的和谐思维或许能为中美世界秩序观念之差提供一条和谐的出路。笔者曾用“中国式增量改进”来概括中国的和谐思维。^① 比较而言，中美世界秩序观念尽管存在不同，但并非是你死我活的不同，因而不宜以冷战思维待之。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美国不需要担忧中国的秩序观会对美国秩序观构成替代。因为本质上，中美两国的世界秩序观都存在能力缺陷，美国有实力，但是缺道义资源，中国有道义资源，但是还缺少足够的实力。比“异”并非是为了寻求对立，用对立的观点看到中美两国的世界秩序观念是不够的。双方在增量改进上形成共识，比单纯的求同可能更有利于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三、国内政治

中美两国都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两国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会受

^① 参见苏长和：《中国道路视野下的国际体系建设》，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12期，第48-49页；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中国式增量改进大概可以概括为七点：第一，“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增量原则，也即在不触动国际体系中守成集团既得利益前提下，各方共同合作，努力开辟新的利益增长点。第二，在自身根本利益和总体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大国对弱国通过援助和放松市场准入等方式的让利原则；第三，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小方的利益为前提谋求自己利益的扩大；第四，在对方不具备条件时，尽量帮助对方创造条件，制造同台合作共赢的机会，此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创利原则；第五，国际体系的任何改革，不应以优势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指导原则，但却必须尽力保证弱势国家最大得益或损失最小化为底线；国际体系改革的任何步骤，要充分让弱势国家分享收益。此为公平、比例和均衡原则。第六，在遵守大部分国家接受的通用规则中修改并完善规则，而不能像过去有些崛起中大国或者守成大国试图在破坏规则中制定规则。第七，尊重多样性，照顾彼此关切，对各方选择的制度和道路不相互否定。

制于来自国内的挑战。在过去的 40 多年中，国内问题始终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应对的问题。两国都要适应彼此的国内政治，而不应该试图改变对方的国内政治。

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政治支持。美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自然认为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会成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这套理论会进一步认为，只有彼此都实行美国标准的国内民主政治，才会真正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民主和平论学说中，唯有国内制度的同质，才能奠定稳固且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这种学说使得外交和战略学家产生一种期待甚至幻想，也即如果中国变得和美国一样，那么两国才能真正构建好新型大国关系。这个问题从中国角度来看则是不一样的。中国在思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并不认为国内制度的差异会成为健康稳定长期发展的双边关系的决定性阻碍力量，更没有天真地在美国制度会变得与中国一样的设想下去思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国际政治的原理来说，各国国内政治的差异是绝对的，但这并不妨碍国家之间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试图消除国内政治差异，追求在同质的国内政治下形成一个共同体或者良好的双边关系，是理想主义的。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浪漫化的理想主义往往比其他任何理论所指导的实践都更容易犯更大错误。一旦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将他国内政的改造作为实现良好关系的前提，其外交上一定容易犯错误。美国外交在过去犯过无数类似的错误，中国在其强大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因此，中美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不应该被夸大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障碍。这并不否定国内政治变化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两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确实会对外交的取向产生很大的影响。

很少有人会把美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作为认识美国的一个假设条件。但这似乎正在成为一个问题。设想一下，美国面临着国内改革的一些长远挑战，是否会使其进入一个漫长的战略收缩期？经济重心南移提出的南北矛盾问题，人口增加和族群结构变化带来的拉美化和亚洲化，政治制度的极化，意识形态教条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使美国变得更内向而不是更外向。第一，美国政治极化提出的政治改革议题。美国最近的国内政治表明，政治极化现象让世界对美国能否像其所声称的那样领导世界表示出怀疑。第二，美国是

世界上典型的“拼成”的国家而不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国家。根据2010年美国的人口统计,全美少数族裔人口总数达1.12亿,占人口总数的36%。全美3143个县中,有348个县白人已成少数族裔。按照过去几个十年美国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达到5—6亿。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美国南部的“拉丁美洲化”和西部的“亚洲化”趋势在加强。美国人口以及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趋势对其国家治理体系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第三,美国呈现经济南移以及人口南移趋势,南方以得克萨斯为代表的州得益于石化等工业,其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小,表现出色。南北经济的对比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带来美国南北关系的微妙变化,有学者甚至将其上升到美国未来的南北矛盾问题层面,思考其对美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

上述趋势会加深世界对美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内政愈益成为束缚美国在世界上行动的重要因素,2013年奥巴马因为政府关门事件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东亚峰会,就是一个例子。与不确定的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相比,中国的国家发展要更为确定。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国家发展的蓝图和阶段性目标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各国对照中国的发展蓝图,按照自己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很容易找到对华关系的合作点。中国的确定性还在于,中国制度提供了内外承诺上的稳定性和预期性。世界各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成本,与那些分权制国家国内政治经常出现的内外政策上的反复无常相比,显然更低。

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同样离不开国内社会民意支持。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在政府层面不乏磕磕碰碰。但是在社会交往层面,商业和民间往来一直保持增量发展的态势。经济利益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社会民意联系成为两国关系的黏合剂。在美苏两极政治中,美国和苏联的经贸往来很少,双方的社会人文交流也很沉闷。从这个角度讲,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来简单地比拟中美关系是不准确的。如果说美苏关系是“你中无我,我中无你”的关系的话,那么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实实在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往许多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间关系所不具备的。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积极和乐观的一面。

两国关系的联系纽带已经使任何极端想法都不具备可能性,但是联系纽

带又没有强大到消弭两国民间时而存在的“中美必有冲突”的论调。美国军事重返亚太加剧了此论调，其在亚太地区频繁的军演尤其是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不公正表态，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较大的舆论反应，使美国在中国失去了不少软实力。

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民意支持并非只是两国老百姓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获得多少好处这个问题，关键是双方在民众有关两国关系的教育上要有好的改进举措。在社会信息化时代，媒体在塑造两国老百姓的彼此认知上起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两国建交以后，中国率先放弃了冷战色彩的对美报道形式，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再像建交前那样，对美国政治、外交、制度、发展道路、生活方式进行公开的批评，对美国的批评主要局限在当美国直接损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安全、政治制度、核心价值等议题时所做的回应性批评，如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对中国人权的歪曲报道、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等。除此之外，中国官方媒体基本上以善意的态度报道美国。在民间教育层面，中国将英语作为国民第一外语，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软实力和文化遗产资源，这是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文化和语言红利。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将英语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英语在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人本来应有的依靠多元外来信息客观平衡看世界的眼光。中国人看世界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英语的依赖，从而影响到独立判断的能力。中国国内目前关于英语在高考中地位的讨论，也反映了这一对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担忧。

比较起来，美国至少还没有从冷战国际关系教育观中走出来。冷战思维在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近乎一种常态，与中国有关的艺术、电影、文学作品、社会科学研究、新闻报道等所有潜在影响到国民对中国认知的教育形式，仍然带有很强的主观和先入为主的色彩。美国主流媒体更是惯于居高临下地以批评的口吻报道中国。美国主流媒体还没有从冷战的教条思维中解放出来，其正在成为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思想负担，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舆论阻碍因素所在。

结 论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动态和相互的过程。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思维观念上的突破。当彼此只停留在权力交接的思维上看待新型大国关系时，守成国家因为担忧自己的地位被新型大国所取代，会自然采取遏制战略回应新兴大国的崛起；当任何一方以指望“对方变得和自己一样”的思维看待新型大国关系时，相互干涉而不是相互尊重就会主导双边关系；当以两国集团思维看新型大国关系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会使两国被世界所孤立；而当以结盟思维看新型大国关系时，中美之间很可能因为各自寻求结盟阵营而使世界再次对立起来。

本文认为中美之间积累了较为牢固的合作基础，双方的合作逐步产生了惯性效应。本文从比“异”的角度，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差异因素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比“异”并非为了强调和论证双方合作的不可能性，比“异”恰恰是让双方认识到唯有在相互尊重根本性的差异基础上，才可望构建一种“比异”齐飞、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收稿日期：2013-12-22]

[责任编辑：张 春]

迈向世纪性的权势转移

——中美关系的新型政策路径

[芬]丹·斯泰因博克

【内容提要】中美两国在经历一场具有世纪性意义的经济权势转移的同时，各自都通过在亚洲建立各种联盟和加入贸易集团而实施着自身的再平衡战略。但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轨迹和战略目标使得中美这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方式截然不同：美国加强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而中国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并在东南亚和南亚实施再平衡战略。需要指出的是，对新型“欧亚挑战者”的担忧已经过时。尽管中美都试图在亚洲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和投资集团，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和美国都既有其国内动力，也有其国际动力。中美两国的政策方法表面上看是相互排斥的，美国政策大致是归纳式的，而中国的政策则总体是演绎式的，但两者在某些领域的确存在交集。为了务实地发展两国关系，中美必须学会在某些领域携手合作，虽然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是竞争对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需要创新、务实、有力的政策路径。

【关键词】中美关系 权势转移 新型大国关系 政策路径

【作者简介】丹·斯泰因博克（Dan Steinbock），美国印中美研究所（ICA）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心访问学者，新加坡欧盟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39-16

2013 年 11 月，中国国防部在中国东海上空一片广阔区域内划设了防空识别区，要求经过这一区域的非商用航空器提前通报中方。中日两国存在争议的无人居住的一些岛屿（中国称之为“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即位于这一区域。美国方面视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决定为“改变这一地区现状的破坏稳定的举措”。日本政府认为这一举动“完全无法接受”。中国国防部希望美方“尊重中国的国家安全”。而在美国的两架武装 B—52 轰炸机飞越这群岛屿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结果如何呢？中方划设了这一防空识别区，却未对美国军机采取任何处置措施。然而，中方此举已在事实上宣示了其对这片一直被日本视作禁区的海域的所有权。^①

随着经济增长的强大势头由跨大西洋轴心转向亚洲地区，美国和中国都在该地区寻求各自外交政策的再平衡。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轨迹和战略目标使得中美这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方式截然不同：美国加强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而中国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并在东南亚和南亚实施再平衡战略。此外，权势转移还体现在以下方面：两国都尽力在亚洲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和投资集团；美国担忧出现“欧亚挑战者”；中国新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政策制定中各种不断变化的维度；等等。

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

2010 年，奥巴马政府宣布，南中国海地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对该海域岛屿归属存在争议——的海洋航行自由权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② 2011 年 11 月，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议会的演讲描绘了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愿景。美国并非要从中东和阿富汗撤军，加强多极化的共识和全球治理，而是要将其力量集中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便“在这一地区保持我们强大的军事存在”^③。事实上，再平衡战略是一个十

^① 中方的举动使美国不得将其原先刻意保持模棱两可的地区政策明朗化。虽然美日韩三国并未理睬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政策，但其划设已使得三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浮出水面。

^② 在美国的国防部内部，这一政策与空海一体战概念是共同推进的，后者源起于历史上的空陆一体战概念；而空陆一体战概念又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直至 90 年代末美国陆军在欧洲的战争理念的基础。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Parliament House, Canberra,

年进程的最新发展阶段。^①

此后，美国开始了首批战略部署，包括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空军基地派遣了 250 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并将逐渐增至 2500 名；其后又发布了旨在加强美菲军事关系的《美菲联盟马尼拉宣言》（*Manila Declaration on U.S.-Philippine Alliance*）；向印度尼西亚销售 24 架 F—16 战斗机并积极与缅甸修好。此后，美国在亚洲的增兵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2012 年 6 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莱昂·帕内塔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到 2020 年美国部署在亚洲的战舰将增加一倍，占美军海外驻军的 60%。^②

尽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受经贸与投资利益的驱使，但其重点却在军事方面。不过，美国的战略部署所依赖的是经济上越来越脆弱的日本，或是实力大不如前的澳大利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各类军事同盟意在牵制中国。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的税收一直不堪负担政府的支出，政府已积累了 14.6 万亿美元的债务。国内银行和保险业购买了主权债务的 95%，然而沉重的债务仍然高达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2.3 倍。2012 年 12 月，以安倍晋三为首相的自民党重掌政权。随即，该党推出以财政刺激、央行的扩张性货币宽松政策、结构调整为三大支柱的经济新政，以期增强日本经济的竞争力。此外，安倍政府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谈判进程，力图使受庇护的日本工业实现自由化。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承诺将“竭尽所能”实现 2% 的通胀目标；随后，央行承诺实施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力图到 2014 年底货币基数翻番，达到 2.9 万亿美元。^③除了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刺激计划外，安倍内

Australia, November 17, 2011.

^① 2001 年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报告《亚洲 2025》称中国为怀有“对外军事冒险主义”意图的美国的竞争对手。3 年后，华盛顿提议在中亚和中东地区设立新的军事基地链条。2008 年美印签署一份核能合作协议。与此同时，美国与新加坡、泰国以及越南等在地理上环绕中国的国家巩固了外交与军事关系，这些国家处于中国运输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贸易通道的关键位置。See R. G. Kaiser, “2025 Vision: A China Bent on Asian Dominance Group Bids to Forecast Strategic Challenges,” *Washington Post*, March 17, 2000.

^② 其时，美国军方领导人与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关于空海一体战的概念已经出现了分歧。See S. LaGrone, “Pentagon’s ‘Air-Sea Battle’ Plan Explained, Finally,” *Wired Magazine*, August 6, 2012.

^③ 这一雄伟目标堪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两年内购买 8 万亿美元主权债务的计划相比。

阁的改革者们企望一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能提振经济增长，扩大总需求。这些举措可能导致 2013 年年底赤字率上升至 11.5%，公共债务飙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45%。^①

正是这一庞大的债务赌局，成了笼罩中日关系和日美扩大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的阴影。首相安倍晋三意欲修改二战结束后制定的和平宪法，而且已经使本国的国防预算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值。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澳大利亚经济保持了连续 17 年的增长。除一个季度的负增长外，2009 年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1.4%。^② 2013 年，其增长率仍将达到 3.3%，失业率仅为 5.2%。然而，增长所依靠的仅仅是采矿业的投资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其经济易受贸易波动的影响。在 2013 年 9 月举行的大选中，托尼·阿博特领导的中右翼自由—国家党联盟取得胜利。上任数月来，阿博特承诺对内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税收，对外则宣布“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应保持雅加达重心，而非日内瓦重心。”^③ 经济增长的岁月已成为往事，澳大利亚发现自己正陷入政治分裂，处在一个经济和战略的十字路口。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一直致力于增强与美国的关系和与亚太国家建立关系。前者主要出于安全目的，后者则出自经济需求。在贸易领域，澳大利亚采取了两边下注的政策，同时参与美国和中国领导的贸易集团。在安全领域，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的立场主要受《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U.S. Security Treaty, ANZUS）的影响。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安全考虑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均是域外的。“9·11”事件后，澳大利亚已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十多年的反叛乱行动（counterinsurgency）。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展开，其必将加强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合作。

^① 这项计划的设想是，一个老龄化的日本社会依然偏好较低风险和高流动性的资产。但如果日本国内民众预计日元继续贬值并决定将资产转移至国外，那么资本外流将导致一场大雪崩。另一项风险与时机有关。当前的目标是在 2013 年落实财政刺激计划，后续的财政巩固政策于 2014 年跟进。

^② 由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崩溃。陆克文领导的工党政府出台了一项 500 亿美元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应对全球经济放缓带来的冲击。同时澳洲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也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点。此外，中国 2009 年出台的刺激计划也维持了澳大利亚国内的商品需求。

^③ 根据瑞士瑞信银行的《2013 年全球财富报告》，澳大利亚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亦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八大贫富差距最严重国家。

鉴于其双重属性——西方的身份认同和亚洲的地理处境——澳大利亚很可能继续其两边下注的政策，即借助美国确保政治稳定，依靠中国取得经济利益。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 2.0 版本

中国正在重新定义其大战略，这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第一次。80 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使得中国通过投资和出口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2013 年 11 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所制定的大战略，将使中国朝着后工业化社会、消费拉动型增长和不断深化的区域一体化迈进。

“383 计划”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这个三位一体的改革覆盖市场、政府和企业。每一部分的目标都是要减少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8 个改革领域包括金融、税收、国有资产、社会福利、土地、外商投资、创新和治理能力。3 个关联性改革组合旨在放开市场准入、启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允许农村集体土地转让。阻碍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将通过放松三线城市的户口限制而逐步取消。

经济改革将由一个中央领导小组牵头，很可能以李克强总理为首，在今后的 5—10 年逐步完成。中国将另设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包括情报、军队、外交等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① 与美国一样，中国也在亚太地区重新平衡其对外政策。^② 但是中国选择的路径却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偏好的是贸易与防务，中国的路径更强调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的再平衡战略旨在实现从海洋争端到海洋丝绸之路

^① 这一计划最早起源于 1997 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参照美国的国安会，中国的这一新机构将保证重要安全信息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共享。但与美国国安会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安委职能兼顾国内与国外，而且被认为是对斯诺登事件所曝光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监听活动的回应。

^② 中国历任外交部长均是“美国通”或“俄国通”。但现在，重点已经转向亚洲和亚太地区。中国的外交新政随着一系列新的人事安排（包括资深外交官杨洁篪、王毅、崔天凯等人的任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的转变。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演讲中呼吁东南亚国家携手构建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他强调了中国与东盟 10 国之间的合作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机遇。习近平主席还向印度尼西亚的议员们保证，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在 2020 年将达到 1 万亿美元。同时，他再次提及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

随后，李克强总理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要开创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钻石十年”，并提议中国与东盟国家缔结睦邻、友好、合作的条约，称这是加强安全交流与合作的需要。李总理同样提及了要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在 2020 年达到 1 万亿美元，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实现东盟地区互联互通提供融资平台。他还呼吁中国与东盟国家加强合作，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合作，以及文化、技术、环保等各方面的交流。

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早在 10 年前就已建立，但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的这些倡议将使这一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

在南亚地区，中国的再平衡战略重点放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孟中印缅（BCIM）经济走廊的建设上。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再平衡战略，主要目的在于满足中国内陆地区的能源需求，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加强中巴合作打击边境地区“三股”势力。中巴合作是为了在这一地区形成对美国和北约的反制力量。穆斯林联盟在 2013 年 5 月举行的巴基斯坦大选中获胜，纳瓦兹·谢里夫希望重振国家经济，改善本国安全形势，遏制国内圣战分子势力，结束美军在巴境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其最重要的任务当属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中巴的经济合作在两国签署自贸协定和中国增强对巴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后加速发展。2012 年，两国双边贸易额突破 120 亿美元。

如今，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武器卖家和贸易伙伴。两国正在巴境内的民用核能领域展开合作。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建设了位于胡沙布的一座核反应设施。2012 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原油占其总进口量的一半。中国也是巴基斯坦瓜达尔深水港的最大金主，该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入海口。美国和印度重视此处的战略意义，认为这是中国向印度洋地区投射实力的关键。

就经济而言，孟加拉国属于新兴经济大国。但就其 1.6 亿人口来说，它又

是一个穷国。同时，孟加拉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动荡，易受气候变化和西方债务危机的影响。由于国内罢工和政治暴力事件，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已经连续两年下滑，2013年跌至6%。^①

1971年，孟加拉国仍与印度及其盟友苏联保持紧密关系。20世纪70年代的一场兵变使其疏远了印苏盟友。其后，中孟建立外交关系，并持续至今。2012年，中孟贸易额超过80亿美元。^②两国合作最突出的成绩是国防采购项目。

中孟两国均视区域合作为安全与繁荣的中心议题，这一点反映在孟加拉、中国、印度和缅甸四国长期致力于经济走廊的合作。这一经济走廊是连接南亚、东南亚、东亚这三个正逐步形成的区域集团的节点。同时，这也反映出中美两国正在联通中国与中东和非洲的海洋能源补给线上相互遭遇并展开博弈，随着中国海洋实力的逐步崛起。美国批评者将经济走廊视作“珍珠链”，迟早会帮助中国实现区域主导权。沿着这条经济走廊的各国，孟加拉国和缅甸，当然还有中国甚至或许包括印度，都将这一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视为今后区域稳定与繁荣的保证。

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需要的是通过安全、经贸与投资、共同繁荣来打造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经济合作。亚洲不需要21世纪的新冷战。与中国不同，美国不再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贡献者。尽管它一直试图在这一地区抗衡中国，恢复其主导作用，但其影响力恐怕仅限于军事方面。

三、迈向世纪性的权势转移

19世纪70年代早期，属于这一时代新兴国家的美国赶超了英国。而今天往后的大约10年左右，当前最大的新兴国家中国有可能赶上美国。这是一场

^① 2011年，执政的人民联盟（AL）废除了长达20年的“看守政府”体系，由中立领导人在大选前执掌政府，以确保公平选举。人民联盟本应于2012年10月交权但并没有实现，反对派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 (BNP)）升级了全国性的罢工并抵制选举。

^② 直到2012年，美国都是孟加拉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7%），而中国是该国最大的进口来源（20%）。但事情发生了变化。2012年6月，由于后者的劳工权利和工人安全问题，奥巴马总统宣布暂停美国对孟加拉的贸易特惠措施。

具有世纪性意义的经济权势转移，需要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各自国内和两国关系中妥善处理。实力迁移所带来的挑战已反映在经贸投资领域内区域集团领导权的争夺战中。

首先，中美正激烈争夺在亚洲地区的贸易领导权。

在长达 20 年的时断时续的谈判后，美国和欧盟都希望最终敲定双方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谈判。奥巴马总统在 2013 年 2 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将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同一天，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便启动了欧盟的内部谈判。

据称这一协定将使全球贸易的 1/3 实现自由化，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但其真正后果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背后的假设。理论上，关税的降低将是协定所能带来的最唾手可得的经济果实，而更大的优惠则来自监管手续的简化。^① 尽管美欧之间的贸易协定被描绘成一次探索公平竞争的开放性尝试，但也可以被视作是衰落的发达经济体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和新兴的亚洲的防范措施。

美国同时努力完成始于 2005 年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2010 年至今，这一协定的谈判国已经扩大到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美国、越南和韩国。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容·柯克（Ron Kirk）所言，TPP 将成为“一个标准高、基础广的区域协定。”^② 不过，TPP 将中国排除在外。

TPP 不仅推动了跨大西洋的 TTIP 谈判，也促进了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的合作，尤其是东盟国家与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谈判的目的是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一覆盖东亚、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主要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将于 2015 年底结束，预计将惠及 30 亿人口，所涉国家的 GDP 总额将达 17 万亿美元，

^① 保守估计，关税将完全消除（目前不到 4%），非关税壁垒将减少 25%—50%。根据这一预期，美国 GDP 每年将增加 0.5%（约合 770 亿美元），或更保守的情况下再降低一半。而欧盟的 GDP 每年将增加 360 亿美元。美欧的收益差异源于美国有 20% 的贸易量来自欧洲，而欧盟只有 8% 的来自美国。Compare Potential Effects from an EU-US Free Trade Agree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weden, November 1, 2012.

^② 这样，TPP 事实上包括了亚洲四小龙（香港除外）、东亚新兴经济体、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以及三个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占全球贸易额的40%。不过，RCEP将美国排除在外。

这三项贸易协定——跨大西洋的TTIP、跨太平洋的TPP、亚太地区的RCEP——均是为了抢占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主要份额，从亚洲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得益，强调不同区域伙伴之间的合作。然而到目前为止，它们或由美国主导，或由中国主导，没有一项是由两国同时参与。

过去，贸易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战略考量。如今，战略考量已经让位于经济考量。这一转变也反映了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由美国到中国的权势迁移，正是这一转型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增长。这一局面需要得到控制，尤其是在当下，因为起源于冷战的关于经济与安全政策的陈旧观念依然主导着当今的全球辩论。

在开展地区贸易领导权竞争的同时，美国相当关注“欧亚挑战者”的出现。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其后冷战时期的经典著作《大棋局》中这样说，“欧亚是个大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这一场争夺是地缘战略——对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管理——的争夺。”20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欧亚大陆大国关系的主要仲裁者。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最后一步。^①布热津斯基不但设想美国在未来会维持第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实力，而且还在美国的霸权基础已经开始被削弱的历史性时刻定义了美国的单极权势。

就在布热津斯基发表其著作论述欧亚权力的前一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成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亚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名曰“上海五国”。2001年吸纳乌兹别克斯坦后，该组织更名为上海合作组织（SCO），其成员国的领土面积占欧亚大陆总面积的60%。^②当年7月——“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两个月，上合组织最大的两个成员国俄罗斯和中国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海合作组织的重点一直是加深军事互信，裁撤边境驻军，加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及跨国犯罪和贩毒的国际合作。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反映在

^① Z.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p. xiii-xiv.

^② 包括阿富汗、印度、伊朗、蒙古、巴基斯坦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取得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观察员国的地位。美国也曾提出观察员国地位的申请，但于2006年被拒。

上合组织成员国不断深化的经济合作关系中。

与弗朗西斯·福山和新保守主义预言家不同，布热津斯基并不相信“历史终结论”。相反，他认为苏联崩溃制造了世界权势场上的一个临时性的连续地带，美国可以塑造和引导这一地带，但却无法主导和控制。他将“制定一项全面和完整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视作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关键挑战，“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善良的和有眼光的：依照长期的潮流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建立一个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是绝对必要的。”^①

在美国，大多数分析人士倾向于把上合组织看做一个新兴的、正在崛起的欧亚挑战者的雏形，而非一个能稳定地区局势的区域内国家的联合。这一组织排除了美国作为一个外部的安全霸主进入该地区的可能。如此一来，很多人相信，由中俄领导的该组织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联盟。在布热津斯基看来，二战的爆发便是因为出现了一批以希特勒和斯大林为首的轴心国家，损害了美国的利益。^②然而，这一逻辑是错误的。在 1997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并不是斯大林的继承人，而江泽民主席也不是现代版的希特勒。当然，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也不会是希特勒的传人。尽管此类观点在中国和美国的有识之士中被认为是令人恼怒和可悲的，但的确有一部分人认为“即将到来的中美战争”只是时间问题。^③

自 1500 年以来，在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冲突的 15 个案例中，有 11 个导致了最终的战争。^④ 因此，如何在 21 世纪避免这样的历史重现，同时又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两国该如何应对？

^① Br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 xiv.

^② 1940 年，欲称霸全球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一致认为美国应被排除在欧亚大陆之外。两人均认为美国在欧亚大陆注入其实力将会阻碍德国和苏联取得全球霸权。

^③ 妖魔化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将那些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转变为对华强硬派，并逐渐增强对华友好人士的负面态度。关于美国外交政策辩论中的强硬立场，参见 D. Steinbock, “The Quest To Demonize China,” *China-US Focus*, August 19, 2013.

^④ Graham T. Allison, “Obama and Xi Must Think Broadly to Avoid a Classic Trap,”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2013.

四、新型大国关系

2012 年底，美国的总统选举恰逢中国的十八大召开。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再次当选。中国的十八大期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当选为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中美两国均将中美关系看作 21 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奥巴马总统的两届任期内，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是其政府与中国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性战略、经济和其他议题展开双边对话的主要渠道。过去的五年里，这一双边关系的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得以极大拓展（图 1）。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取得快速发展之时，中美两国人士均越来越担心两国间迟早会爆发冲突。尤其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为了减少可能发生的摩擦，不断向外界解释自己的意图。刚刚进入 21 世纪的那几年，“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官方的一项政策，为的是向其他国家保证，中国的崛起不会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①这一概念包含在中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提出的新安全观之中。在后冷战时代，各国可以通过外交和经济上的互动来促进安全，因此以竞争和敌对性质的围堵为核心的冷战思维已被视作过时。

中国力图避免不必要的外部对抗。中国领导层换届以来，这种试图通过建设性与和平方式来处理双边关系的努力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积极促请美方致力于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守成大国美国和未来大国中国之间的战略对抗和冲突。^③

2013 年 6 月初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后，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了这一概念，“中国和美国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一条不同于以往大国之间必然走向对抗与冲突的道路。也就是说，双方必须

^① “中国的和平崛起”由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于 2003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首先提出。此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东盟峰会和访问美国等多个场合均有所提及。

^② 中国担心其他国家的对华认知，因而 2004 年后将“崛起”一词改为“发展”。

^③ 2012 年 2 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期间表示，已与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达成共识，中美两国要开拓一条大国和谐共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之路。2013 年 6 月习奥庄园会晤之前，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将此次峰会视作讨论如何在共同利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契机。中国媒体将这种新型关系定义为“新型大国关系”。

携手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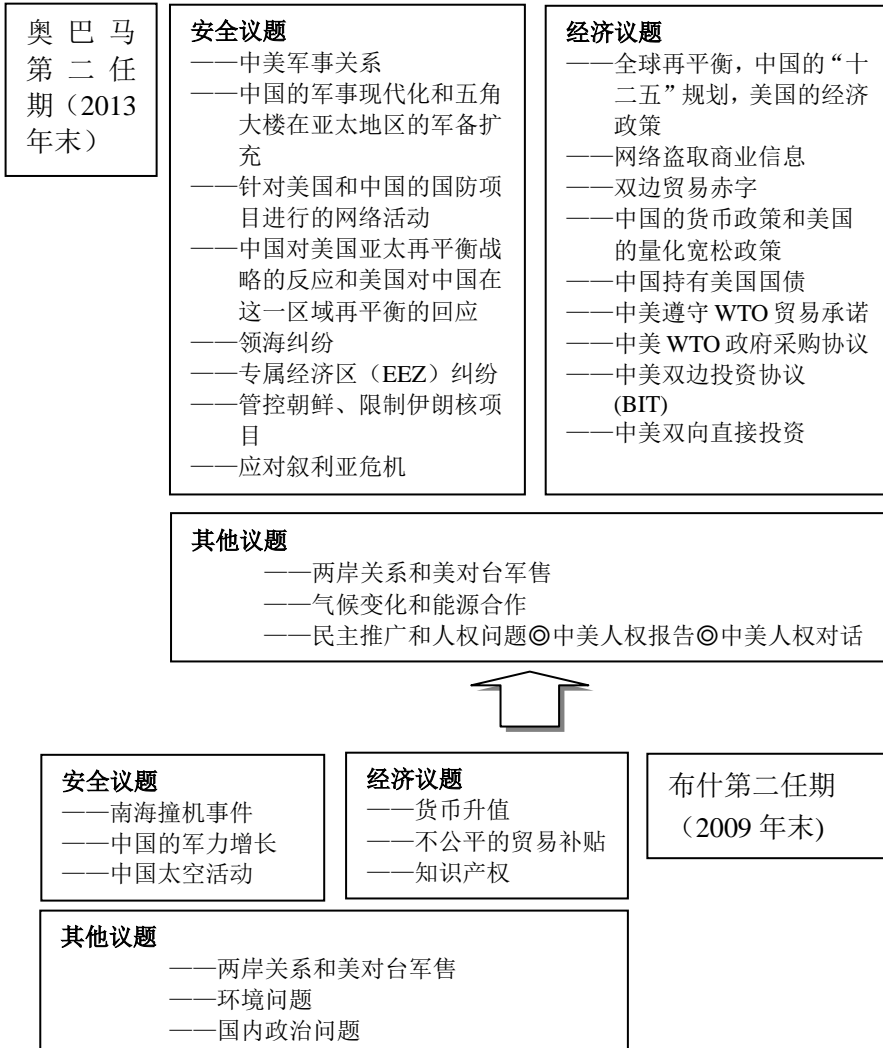


图 1：中美关系的深化发展

^①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Bilateral Meeting,” transcript, June 8, 2013. See also remarks by Vice Premier Wang Yang and State Councilor Yang Jiechi,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Joint Opening Session,” transcript, July 10, 2013.

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都存在内外两种动因。在中国，将这一承诺通过官方渠道表达出来，部分反映了国内考虑。大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如今已一去不复返。未来几年，中国必须遏制由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所引发的高额地方债务。尽管刺激政策使得中国避免了发达经济体所经历的经济停滞，但也使中国的经济流动性过大，市场存在过分强烈的投机性。另外，将新型大国关系制度化的努力也反映了中国担心全球经济增长的衰退和随之而来的国际关系恶化。在美国，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和平双边关系同样受内外两方面的动机驱使。一方面，美国需要着重应对国内中长期的挑战，包括债务危机、后危机时代的去杠杆化、结构性失业和退出货币刺激政策。另一方面，美国急于稳定国际关系，以便维持全球的经济增长。美国的政府官员也的确阐明了一些总体原则，作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指导。

在美国国内，人们并没有将建立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看作是两国就当前中美关系所达成的协议，而是当作中方对中美关系的一种认知。美国方面虽然不排斥这一认知，却始终充满了疑问。^①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此种过分的谨慎和故意的含糊其辞没有反映出正常的双边关系所需要的那种战略互信。而在美国的立场上，两国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协定应当在双方协商后确立，而非之前。因此，中美之间存在潜在的期待落差，且双方都将这种落差看作是彼此的战略猜疑。

对中国而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有很多特别的工作要做。^② 这让美国的谈判者们觉得默许中国提出的得到美方“尊重”的要求，就意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作出重大调整。中国要求得到美方的尊重，也必须适应美国历来所坚持和倡导的民主推广和普遍人权。中国已经解释了其“核心利益”，其中不仅包括维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包括捍卫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

^①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前，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我们理解中国方面有意实现一种新型中美关系。关键问题是两国应建立信任并且找到一条达成各自所期待的目标的合适道路。” 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ackground Briefing on the Upcoming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and U.S.-China Relations,” transcript, July 8, 2013.

^② 国务委员杨洁篪介绍说，2013年6月的庄园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中美新型关系总结为三句话，“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意味着两国应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求同存异寻求共同进步。

整、国家统一”，以及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①

中国希望中美两国能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虽然美方并未就其“核心利益”作出说明。在美国，“核心利益”这一概念引发了许多关于中国如何定义这一词汇的问题。最终，这一概念要求重新评估美国的大战略。

五、政策制定的两个维度

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庄园会晤前夕，西方观察家将两人的会面与 1972 年毛泽东与理查德·尼克松的会面相提并论。这是一个过时的比喻。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目的在于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 20%。如今，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 50%。就经济而言，这两个大国正变得越来越平等。

以往的各个时代中，新兴大国的崛起总是导致对抗与冲突。西方的一些观察家相信此类对抗与冲突在所难免。不过历史上的新兴大国——最显著的例子是 20 世纪初崛起的德国和日本——是指那些工业化成就被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缺乏有效全球治理机制的国际社会和低水平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所遮掩的国家。

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并不是由军队所推动的。而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也随着国际多边组织改革的深入而得以改善。在 2008 年之前的 30 年中，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突飞猛进。这一过程的结果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并非必然走向冲突与对抗。相反，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美两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转折点”的说法很有道理。

中国和亚洲经济经历 30 年的快速增长期后，其所占世界的比例也迅速上升。1980 年，亚洲经济仅占全球经济的 20%。如今，这一份额已提升至 30%，到 2050 年预计将超过 45%（图 2）。未来的中美关系应当以正在成形的多极世界为背景，而非历史上的单极秩序。

^① 中方的观点是，主权意味着中国对大陆、台湾、南海及东海海域争议岛屿的主权。美方认为，中方的观点挑战了美方在《与台湾关系法》、《美日安保条约》中的相关承诺以及美菲的盟友关系。中方在宣示主权时动用武力的可能性也挑战了“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航行自由、南海合法贸易不受阻碍”等美国的国家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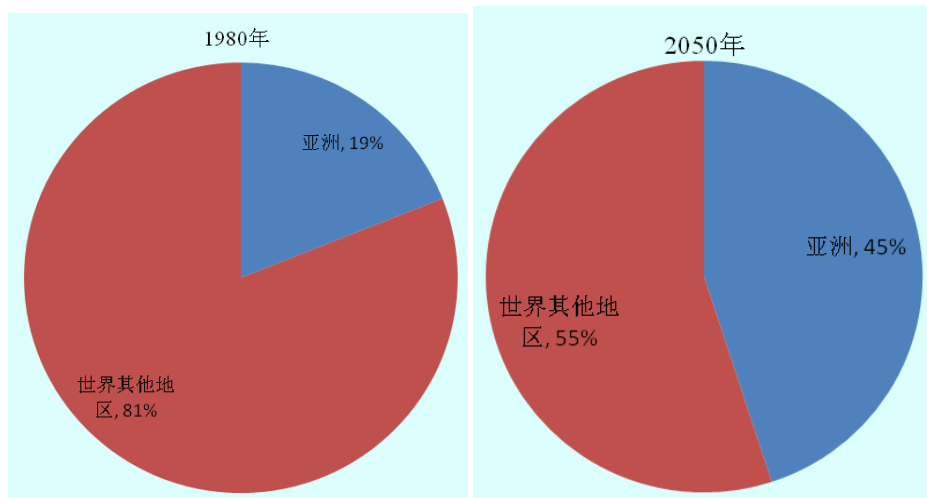


图 2：亚洲经济在 1980 年和 2050 年的权重占比（GDP）

数据来源：Goldman Sachs Data, Difference Group.

既然世界经济的格局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基于现有经济与战略实力对比的静态的政策制定过程就显得有些幼稚。政策制定应该是一个更为审慎和务实的动态过程，不仅考虑当前的力量对比，更注重今后的权势变迁。这就是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比如，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亚洲，其眼下的“核心利益”与 2050 年的“核心利益”很有可能是大不相同的。这就要求动态的政策制定过程必须做到：第一，注意以往的经济和战略现实，因为其仍然决定着当前的话语和思维形态；第二，尤其注意当前的现实，因为那是通向未来的桥梁；第三，留心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因为那会决定 2050 年的多极世界的形态。

最基本的挑战是，为了务实地发展两国关系，中美必须学会在某些领域携手合作，虽然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是竞争对手。最恰当的例子是两国在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上虽然有明显的分歧，但依然能在朝核问题上保持合作态势。此类合作还可以包括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甚至是反恐问题。^① 建立一

^① See Dan Steinbock, “Toward Multipolar Counter-Terrorism,” *China-US Focus*, April 25, 2013; “How Syria May Pave the Way for Global Governance,” Sept 27, 2013; Dan Steinbock, “Iran’s Sanction Tragedy,” *China-US Focus*, October 30, 2013.

种新型大国关系要求两国至少要建立种种“双边机制”，以便中美两国能妥善处理引发不稳定和竞争的各类因素，否则两国的关系可能会不断地升级对抗，甚至走向更坏的局面。

当前，美国的政策大致上是归纳式的，即从几条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出发，寻求让约束性的规则越少越好，其目的是要确保最大的战略操控空间。而中国的策略大体上是演绎式的，即从一整套约束性的规则推导出一系列实际的指导原则，目标是确保不出现太多的战略意外。从表面上看，两者的方法似乎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实际上两者在某些领域的确存在交集。关键是要聚焦最小公分母的政策领域，力求最大化地协调中美两国的政策立场。

就中美两国而言，任务艰巨，利益攸关，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收稿日期：2013-12-05]

[翻译：杨立]

[责任编辑：陈鸿斌]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 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

蔡 亮

【内容提要】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西方学者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的“大而必霸”逻辑设定来探讨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然而，这一理论假设更多是从系统层次即中国崛起的外部国际格局的分析所得出，缺乏对决定中国国际行为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和”为精髓的儒家文明及其有所扬弃和重塑的“和谐”理念一方面昭示了中国数千年崇尚“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权宜之计的逻辑起点。因此，中国在承认大国间存在战略竞争的同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与互惠互利。这实际上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更是中国崇尚“以和为贵”文化传统的现代重塑。同时，它还承载着契合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及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并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 权力转移理论 和平发展 “中国梦”

【作者简介】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55-13

2012年2月16日,习近平在访美时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①中国的这一倡议事实上是对如下思潮的一种正面回应,即: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国际社会总有些人质疑伴随着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wer)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ublic wealth)所引起的大国间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自习近平的倡议提出以来,两国领导人已就共同探索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②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大国和平发展新途径。从历史的纵向演进过程来看,“以和为贵”是中国数千年来崇尚的文化传统。以此为基础,中国在1953年便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胡锦涛于2005年提出“和谐世界”理念,新近则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③因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更是有内在文化逻辑支撑的。进一步地,从横向的现实维度而言,它还承载着暗含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和营造国际环境以实现并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一、权力转移理论的窠臼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国际社会总有些人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④的“大而必霸”逻辑设定去质疑伴随着中国崛起可能导

^① 《习近平: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中国网络电视台,2012年2月16日, <http://news.cntv.cn/china/20120216/106551.shtml>。

^② 《王毅访美:中美合力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新华网,2013年9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09/21/c_125418568.htm。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④ 所谓的权力转移指“由于世界政治中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国家在国际权力

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

权力转移理论设定的国际体系是分等级的，即主导性大国处于体系顶端，下面是几个实力相当的大国，接着是更多的中等国家和小国。主导性大国虽然控制了体系内大部分资源，但通常并不会用强制力量来严格控制其他国家，而会运用其所拥有的权力来制定一套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与行为规范来维护体系的稳固，同时促进自身安全。^①但仍有一两个大国对国际体系现状并不感到满意。它们逐渐认识到现存的国际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制度与规则会导致不公平的利益分配，且并未反映出其自身的权力与期望。这些国家更愿意改变现存国际体系并取代其领导者。然而，大多数不满现状的国家缺乏足够的资源威胁主导性大国与现存的国际体系，只有在其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真正的威胁。^②

由此可见，主导性大国与崛起中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中，一方竭力要维护既得利益，因而会千方百计遏制和阻挠任何不满现状的潜在大国，这时爆发“防御型战争”（defensive war）的可能性会增加；而后者为了打破现状完成权力转移则必须发起对主导性大国的挑战，即使后者希望推延这种转移，把实力对比优势继续留给领导国家，爆发“进攻型战争”（offensive war）的可能性仍是可能的。由此，权力转移理论得出的假设是“大而必霸”。由于中国是今天世界政治中最有潜力的崛起中大国，而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无可争议的主导性大国，两国关系进而因权力关系显得额外复杂，彼此的利益极度敏感。中美间政策与战略互动的结果对

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而崛起中大国（rising power）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dominant power）地位的权力变化过程”，而该过程是“从霸权稳定到不稳定再到重新稳定的转变，其间衰退的霸权国家，可能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或者以贸易保护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由此将诱发在世界体系中影响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冲突和持续性的战略竞争”。参见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Chapter 1; Robert Gilpin,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1988, pp. 591-614.

^①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 6.

^② John G.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影响力最大，中美关系也构成了权力转移中最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权力“对外关系”（dyadic powers）。^① 实际上，“考察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我们可以发现，权势转移理论已经成为美国考察中美权势相对变化的重要依据。”^②

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建立在如下变量设定的基础上的，即崛起中大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的不满、崛起中大国与主导性大国势均力敌及崛起中大国权力刚刚超越主导性大国三个变量。^③ 但其局限性诚如中国学者朱锋、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权力转移理论太过强调全球层次的单一国际体系，而事实上每一次的权力转移过程，大国追求利益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方式，并不只是系统层次（system level）的分析所决定的，同时要受特定的国家单位层次（unit level）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单纯地援引自身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的权力政治学说来假设因中国崛起导致的“大而必霸”，甚至是大国对抗冲突之本身就是研究设计上的“落伍”与“倒退”。^④

作为东方文明型国家的中国，面对权力转移理论中“大而必霸”的假设前提，惟有借助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与模式方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⑤

事实上，作为对“大而必霸”质疑的正面回应，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和 大国互动变化的关键时刻，已经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如前所述，自 2012 年 2 月习近平在访美时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以来，胡锦涛于同年 5 月 3 日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又指出，“当前，人类已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

^① 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序言”，第 2 页。

^② 张春：《管理中 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7 期。

^③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p. 28.

^④ 朱锋、[美]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第 4 页。

^⑤ 《习近平：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人民网，2013 年 3 月 24 日，<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324/c22219-20894217.html>。

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①，对新型大国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而美方无论是2012年3月7日和4月10日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先后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及海军学院的讲话，还是2013年3月11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的政策性宣示讲话，均表达了对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的积极呼应。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6月7—8日，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会晤。会晤中，习近平提出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和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强调双方在一些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等四点建议，奥巴马总统则积极回应指出，美方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愿在互利互尊基础上与中方构建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并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②这意味着，尽管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提出时间不长，但一方面已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重视国际关系理念和实践方面的塑造意识和能力建设的外交战略思维得到了充分体现^③，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已就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即要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真正落实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④

习近平在2013年6月访美之际，曾对奥巴马总统概括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层次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⑤对此，达巍解读指出，这三个内涵可以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低、中、高三个层次的三条路径起点。^⑥而杨洁勉进一步认为，这三个层次内涵实际上也是与相关大国对待新型大国关系所采取的消极防范和积极经营两种态度相契合

^① 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国政府网，2012年5月3日，http://www.gov.cn/ldhd/2012-05/03/content_2129121.htm。

^② 《杨洁勉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新华网，2013年6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09/c_116102752_2.htm。

^③ 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④ 《王毅访美：中美合力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新华网，2013年9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09/21/c_125418568.htm。

^⑤ 《习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华网，2013年6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

^⑥ 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

的，前者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避免大国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后者的重点则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因此，“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两国，它包括美、欧、日等传统大国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是中俄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增长点是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着力点是中欧关系、难点是中日关系”，可见“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内涵比较宽泛，且兼具道义规范和解决问题的双重意义”。^①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大国和平发展新途径。从历史的演变进程来看，它“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民胞物与、仁者爱人的大德精神，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的政治思想，兼爱非攻、亲仁善邻的和平志向，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待人之道。”^② 这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在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外交提供宝贵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向世人阐明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其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更是有内在文化逻辑支撑的。而从这个意义而言，从传统文化这一国家单位层次视角探讨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成体系地论述则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从制度上而言，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从文化上来看却是“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最富原创性的时期。儒道墨法等各派宗师辈出，他们的思想也成为华夏文明的本源，其后各阶段的思想演变实质上均是为他们做注脚。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这些思想也逐渐内化为国人自觉自愿的行为规范，成为中国与别国“不一样”的风格、品味及内在的文化逻辑起点。

当时的中国近乎于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面对大小诸侯征伐不已，礼崩乐坏的现状，先秦诸子均提出了一套旨在实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① 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②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的“内平外成”模式。以日后成为华夏文明独尊的儒家学说为例，“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① 此处的“道”指的是王道，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以仁为思想基础，重视礼乐，建设一个称为礼的社会秩序，它以伦理为法，个人修养为本，用德为施政的基础，将个人正心修身视为政治修明的最根本保证，最终实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 的政治境界。

这样的境界是如何实现的呢？儒家为此设计了一条由内而外的逻辑路径，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首先是“修身”。其准备步骤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这一切的根基是德。于私，德的核心实质是孝，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③ 于公，则是孝衍生出的忠。儒家如此重视孝，主要与中国早期的国家形式的特殊性息息相关。

与西方在早期国家形式中已出现强调地域认同的公民权，并成为最重要的内部认同不同，中国的早期国家形式建立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之上，其政治整合力量始终以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为核心。萨孟武指出，“原始社会都是血统团体，而以氏族为基础，到了血统团体进化为地域国家之时，血统关系尚未完全脱掉。这个时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统治别的氏族，而其族长则上升为国家的元首”，进一步地“这种思想虽然发生于血缘团体之内，但是血缘团体变成地域国家之后，中国人仍用这个观念来解释国家，即他们把国家视为家族的扩大，仍把政治看做宗法的扩大，君主为臣民的父母，臣民为君主的赤子，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无异于家长与子弟的关系，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君主亦须慈爱其臣民。”^④

接着是“齐家”与“治国”。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是以家庭伦理关系为核心的，这就意味着两者是一种延展型的发展关系，即中国人推家人之情以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

^② 《论语·为政篇第二》。

^③ 《论语·学而篇第一》。

^④ 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15 页。

及于社会一切关系，明着其互以对方为重之义，总使它对立不起来。^①因此，对国人而言，无论是“国”或“天下”从本质上而言，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家”，而父亲是一“家”之主，那么天子的权威恰也是“父权”的延伸，“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儒家提出，天子治理国家最需要的是“仁”，认为他应是天下最大的仁者。对于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如果天子能够做好表率则“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进一步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②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决定国家强盛与否的自变量为政治力量，那么如何实现强大的政治力量呢？儒家将之寄托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身上，而非单单依靠刑法，其基本逻辑为：国家执法者如果仅依靠政法来诱导民众，辅以刑罚的话，民众只是畏于刑罚而不敢犯科，但内心依旧没有廉耻之心。但如果国家执法者首先自己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再用礼的规范来管理国家，则民众不但有廉耻之心，且人心归服。由是观之，儒家认为上自天子下到闾阎，培养个人的修养——“仁”是政治力量强大之根本，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③也。再通过对“仁”进行制度性约束的“礼”来治理国家的话，则该国必定会成为拥有强大政治能量的国家，实现儒家所倡导的“治国”。

最后是实现“平天下”。“平天下”即“王天下”，也就是“外王”。从由内而外的逻辑路径来看，“外王”的基础必定是“内圣”。“内圣”指的是国内政治建设中的个人修养问题，“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④，荀子概括为“尽伦者也”^⑤。“外王”则是指国家政治方向，“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

^①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②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③ 《四书章句集注·大学》。

^④ 《庄子·天下篇第三十三》。

^⑤ 《荀子·解蔽》。

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蓄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①，荀子概括为“尽制者也”^②。韦政通认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真正理想所在，孔孟是这一理想的开辟者。荀子则首次对两者关系进行了阐释，提出“内圣”强调主观，“外王”注重客观，圣王则代表主客观的统一。^③由此可见，“内圣”与“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实现“外王”。同样，只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

直观地看，《大学》中的“修齐治平”尽管是以个人为对象，以修身养性为主题展开的，但实际上人同此理，国亦同此意，儒家的基本预设是将整个社会理解为一个同心圆的有机结构，从个人到家庭，家庭到国家，直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共同体，都是由内而外一层一层向四周扩散的同心圆结构。

基于此，费孝通曾将中国的政治整合力归纳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④由于这一政治整合是强调圆浑成一，而非二元对立，因此在天子看来没有外在于自己的土地和臣民，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四方蛮夷”的区别不是固定在地理上的，而主要体现在文化上。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强调的天下秩序是将反映家庭伦理的宗法制度（父子）纳入到政治体系（君臣）中，在“礼”的秩序范围内，其本质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政治实践。由于它以家庭伦理关系的建构为出发点，强调圆浑成一，因此认为整体的和谐，才是最光明的前景，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⑤也。

家庭伦理因有血缘纽带相连，遂强调圆浑成一，重视成员之间和睦相处，并认为这是家庭兴亡的决定因素，所谓“家和万事兴”。而从家庭伦理衍生至政治整合上，“和”也备受重视，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

^① 《庄子·天下篇第三十三》。

^② 《荀子·解蔽》。

^③ 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5页。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⑤ 《周易·乾卦·彖传》。

为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如今这已内化成国人的行为规范，并以此作为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要达到“内平外成”这一普遍和平境界的前提是天与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要实现和谐、协调。国人认为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定、个体和谐息息相关，从内向外，个人的修养是家庭和睦的基础，家庭和睦是国家安定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定才能天下太平。而反过来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各国民众亲睦和善。

众所周知，以“和”为精髓的中华文明，其外在的政治整合力是用“礼”为规范，由周边四邻主动地参与到以中华文明为圆心，根据对“礼”的认同度，由内及外建立的同心圆结构——天下主义的朝贡体系。毫无疑问，中国是这种国际体系的核心，但依凭的却非军事强权，而是依凭自身高度发达的文明，吸引周边四邻自愿纳入到这一体系中的。因此，这一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四周受皇帝的德治教化，进而形成一个阶梯。中华出自于中央，其影响逐渐向地方、异民族、异地域扩展，形成一个同心圆的关系。”^②不可否认，早有批判意见认为，朝贡体系是一种强调等级差异的国际秩序，与当代倡导国家不分大小主权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格格不入。然而，一方面如果不顾历史演进的纵向脉络，一味地对此责备求全的话，实质上是一种苛求古人的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横向比较历史上欧洲诸国之间的兵燹连绵，朝贡体系稳定且和谐的客观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此外，现阶段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内涵及意义时原本就是建立在对其批判、扬弃的基础上，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立场。而若单纯地因今日之非而非昔日之是，甚至对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不敢宣扬，进而全盘否定，不但是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缺乏话语自信的表现，更是一种太阿倒持的做法。

中华民族在探索和分析历史发展轨迹时，很早就从整个民族发展的周期这一视角来看待国家兴亡的，^③其倡导的“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在承认大国间存在战略竞争的同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这一方面昭示了以

^① 《论语·学而篇第一》；《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② [日]滨下武志：《东亚国际体系》，载[日]山本吉宣主编：《国际政治理论》，王志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9、50页。

^③ 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

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与互惠互利为特征的发展道路绝非是权宜之计的一时之选，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一贯立场体现。反过来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是对“以和为贵”文化传统有所扬弃的一种现代重塑。

三、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解读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新阶段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及社会信息化导致的世界扁平化和全球联动的新形势，中国提出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梦”。^①

“中国梦”的提法尽管新颖，但背后却有着深邃的历史厚重和重大的时代责任，不仅蕴藏着绵延已久的家国天下情怀、凝聚着振兴中华的百年探索与奋斗，更折射着暗含至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②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③中国曾在漫长的文明演进中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曾在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饱受欺凌和奴役，但中国并未就此屈服沉沦，而是始终持续奋斗，并孜孜以求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族团结振兴、人民富裕幸福的梦想。以新中国的成立为契机，开始了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经过60多年尤其是近30多年的持续奋斗，使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加接近“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梦”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政治理念和愿望诉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它）致力于促进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④但同时切实可行的路径依赖和内容丰富的内涵充实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对内而言，“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⑤对

^①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② 杨洁勉：《中国梦与中国外交》，载《文汇报》2013年6月25日。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④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⑤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2013年3月17

外来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①对此，俞正樑解读认为，“中国梦”的实现对内必须根植于历史传统的中国精神，对外必须强调“中国梦”与“世界梦”具有内在统一的和谐性，为“世界梦”注入正能量，给世界更多分享的战略机遇和巨大利益。^②

由此可见，“中国梦”的内外实现路径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内在文化逻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本文认为，“中国梦”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终极目标，而后者则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步骤，承载着对外解读“中国梦”，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三重时代重任。

首先，国际社会某些力量对中国崛起后必然争霸的疑虑一方面来自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设定，另一方面也担忧中国会用武力手段一雪近代的百年国耻。而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间首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消除这一“大而必霸”的疑虑，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如前所述，“中国梦”与“世界梦”具有内在统一的和谐性，这不但包括新兴大国，与“美国梦”、“欧洲梦”等也是相通的，因相通而共赢，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③显而易见，在中美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真正落实到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④在中俄一道决定把新型大国关系归入新型国际关系及原则的范畴当中之际，^⑤中国正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际行动对外解读“中国梦”，并将之视为在外交战略思维上的积极体现。

日，<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3npc/n/2013/0317/c357183-20816399.html>。

^① 《习近平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外交部网站，2013年5月31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46032.shtml。

^② 俞正樑：《中国梦的三重国际内涵》，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5期。

^③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新华网，2013年6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08/c_116092643.htm。

^④ 《习近平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华网，2013年6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10/c_116107914.htm。

^⑤ 《普京强调俄中关系具有全球意义》，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3日。

其次，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除了自身始终不渝奉行这一原则外，也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他大国的理解与配合，因为大国关系攸关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从这一意义而言，旨在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这一历史宿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构建，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进而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对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以实现“中国梦”是大有裨益的。

最后，“中国梦”理念的提出，使中国再度站在了世界的聚光灯下，“向中国投来的目光中，有欣赏，也有疑虑；有赞扬，也有批评；但更多的，应当是期待。期待中国在自身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①而“中国梦”理念的实现从消极层面而言是打破西方用“大而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质疑；从积极层面而言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古国向国际社会递交的一剂旨在解决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纷争难以消弭，构建持久和平及共同繁荣的国际新秩序的中国“良方”，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现实关怀，更是以一种“天下一家”的胸襟，孜孜以求“大而求王”的未来愿景。因此，其重大意义足以重塑现行历史规律，改写国际关系理论。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将“中国梦”的美好愿景落到实处的关键步骤之一，是中国通过自身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殷切期待的一种体现，而这一过程恰恰也承载了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收稿日期：2013-10-15]

[修回日期：2013-12-18]

[责任编辑：樊文光]

^①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

理论·策略·机制*

——对建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三重思考

张 芳

【内容提要】新型军事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题中之意，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必然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中美非对称相互依存军事关系的分析，认为以敏感性与重要性、脆弱性与适应性、合作与竞争并存为主要特点，多层面不断发展的，出于相互影响和需要而非可有可无的，双方均为此付出代价和努力的军事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然形成；提出循序消弭信任障碍、控制好外部环境的作用—反作用循环、尽快去军队形象认知模糊化、强大自身，谋求与大国匹配的军事地位认同等策略建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提出渐进式地建立“中美+X”三边或者是“中美+NX”的多边防长会晤机制、中美军事外交中的公共外交机制、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智库机制等。

【关键词】新型军事关系 中美军事外交 军事外交理论 军事外交策略 军事外交机制

【作者简介】张芳，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外军教研室教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68-17

* 本文系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军事学项目课题“军事外交视阈下的中美军事软实力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2GJ003-061）的中期成果；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组成部分。然而，在这样一个“变化多于传承”的转型的历史周期中^①，中美两军关系相对于中美其他领域的关系而言明显滞后，这对于构建两国新型军事关系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完整构建，中美军事关系作为最为敏感、政治性最强的要素，应当加快建构，以弥补这一短板，并使之成为推进两国关系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作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军事要素，因其敏感性、政治性、复杂性，又是最难以建构和深入推进的外交关系。这些都迫切要求学术界从理论、策略和机制等层面对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进行有益的探索。

一、中美非对称相互依存军事关系的理论分析

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指出的那样：“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②

“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这些影响并不必然是对等的），相互依赖便出现了。如果交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则它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这种区别对我们理解相互信赖的政治至关重要。”^③ 以此定义可以进一步分析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并非必然对等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是非对称相互依存军事关系。

中美军事领域的非对称性特点使其既有别于中国与其他大国间的军事关系，也有别于美国与其他大国间的军事关系，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

（一）利益强度非对称

列宁指出：“我国的内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④ 国家利益就是确保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那些条件。无论是关系到生存的国家安全利益，还是关系到发展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国家利益的界定推动着一国外

^① 王湘穗：《赶超与遏制——中美博弈的历史逻辑》，长江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1 页。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 页。

^③ 同上，第 10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339 页。

交政策和军事战略的确定，国家利益的取向决定着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而国家利益的强度则决定了实现国家利益是否运用军事力量，以及以何种方式、动用多大范畴的军事力量。国家利益强度往往以利益受到保护的收益、利益受损带来的损失、实现利益后的后果，以及运用何种方式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利益作为依据。

中国从主权、安全、发展三个维度对自身的国家核心利益进行了明确界定：“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①

相比之下，美国国家核心利益处于不断变化中，并根据利益需求不断对其核心利益清单进行修正，虽然美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宣介，但在其政治话语中较多采用“美国的持久利益”来进行表述。安全、繁荣、价值观和国际秩序是奥巴马政府界定的美国国家核心利益。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了美国必须运用战略手段来维护其四大持久国家利益，即安全、经济、“普世价值”和国家秩序。该报告将美国的核心利益界定为四个方面：第一，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盟国与伙伴的安全；第二，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其中美国经济强大、创新、不断增长；第三，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第四，在美国领导地位推动的国际秩序内，通过更强有力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及应对全球挑战。2010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再次指出，美国的利益与国际体系的完整性和坚固性紧密相关。其中主要利益是安全、繁荣、广泛尊重普世价值以及能够促进合作行动的国际秩序。2013年9月24日，奥巴马在联大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盟友免遭侵略、维护能源的自由流动、瓦解“威胁我国人民”的恐怖网络、组织研发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奥巴马也提到，核心利益不是美国唯一的利益，美国将继续推广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因为这些做法能带来和平与繁荣。

从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来看两国有其相似之处，两国都将安全和发展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

确认为核心国家利益，都是维持和平的外部环境，以确保在全球化经济中实现不断繁荣发展。但很明显地也存在不同：

一是二者对安全保障提供的着力点不同，中国以国内安定和繁荣以及地区和平与安全来确立国家利益；而美国则认为这种保障来自于世界实现普遍的民主、自由以及与美国相似的价值观念。因此，中国更着眼于维护当下的和平环境，是内向且防御性的战略；而美国则同等关注反恐与防止潜在挑战大国的崛起这两个重点，是外向且进攻性的战略。

二是两国国家核心利益受到的威胁有实质性区别。相对于中国当前在主权、安全、发展方面受到的现实威胁，美国并不存在这三个方面的现实问题，因此，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始终是其国家核心利益中的持久内容。

三是两国对国家利益维护的期望值有所不同。中国虽将自身定位为大国，但是是一种颇具分寸感的定位，强调其限制性条件的存在，譬如：发展中的、还未实现领土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等。中国仅希望在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也惠及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因此其大国定位更强调影响力而非全球利益。相比之下，美国不仅看重全球影响，更看重全球利益，其期望值更高更强烈。美国会不惜运用军事力量以实现全球领导者地位。也就是说，美国国家利益强度的适用范畴远远大于中国。

这种利益强度的差异性既表明双方利益需求的互补，也决定了双方在照顾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需要更多包容共进而非对立博弈，在寻求发展与扩大双方共同利益中需要以互信为基础加强“非对称性依赖”，而非试探性接触。

（二）军事力量建设非对称

信息化战争形态正在向更高阶段演进，美军领先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步伐一刻也不愿放缓。小布什政府阶段，美军基本完成了军队向联合作战方向的转型；在此基础上，奥巴马政府更强调联合部队建设的灵活性、机动性。2012年1月6日，美国国防部在防务战略指南中明确提出要在经济危机延续、国防开支缩减的战略背景下采取措施在网络化战争中建立一支全球、联网和全频谱联合部队，以塑造更精干、更灵敏、更易部署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空海一体战”的提出意味着要在海军和空军之间建立战略关系以实现两个军种在体制上的融合、海空军作战行动的一体化以及开发先进的武器装备。

这些都表明美军以作战理论的创新和作战样式的变革继续推动着军事变革的深化。与之相比,中国军队始终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起步较晚。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到2020年,中国军队的建设目标是基本实现机制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三) 国防资源投入非对称

美军军费投入居世界军费第一,而中国军队军费投入则是补偿性的。“暴力的本原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的这一权力手段。”^①国防费被称为一国国防政策的显示器。尽管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为缓解财政困境,美国国防部开始削减国防开支,但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的国防费仍高居世界榜首。2012年12月20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批准给国防部总计约6330亿美元的预算经费。此外,获批的还包括供能源部使用的约170亿美元核武器项目经费,以及约880亿美元的海外战争经费。^②与此相比,中国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根据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国防费规模。2013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7201.68亿元人民币(约1143亿美元)^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6%,而美国则超过了4%。中国国防费只占美国国防费的1/5左右,军人人均国防费还不到美国的1/8。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低投入,目前的中国国防费开支仍处于补偿性增长阶段。

(四) 军事技术优势非对称

美军是一支以雄厚技术优势为基础资源的军队,而中国军队是一支正在累积技术优势的军队。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重要科技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不仅有很好的科技创新机制,而且有着将科技成果迅速变为先进生产力的良好转化机制。这些技术优势是美国在军事领域拥有强大基础资源的重要支撑,武器出口是其优势的集中反映。目前,在世界武器出口大国年度排行榜上,美国仍高居榜首。根据一项研究,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7年),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

^② 《美国众议院通过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新华网,2012年12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21/c_114112580.htm。

^③ 《中国国防费增长10.7%从“补偿性”迈向“协调性”》,新华网,2013年3月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05/c_114893360.htm。

2012年美国武器出口总额为255.17亿美元,占全世界出口总数的36.54%。而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报告则显示,2004—2011年期间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常规武器总额为563亿美元,居于榜首,而中国仅为21亿美元。^①

相互联系和制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正是中美军事领域的这种非对称性才使得中美军事关系一直以来呈现出敏感性与重要性、脆弱性与适应性、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这种看似矛盾的特征恰恰体现了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各类差异的内在统一,使得中美两国、两军之间在非对称性中寻求共性、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发展的确定性,在摩擦的偶然性中引导其向合作的必然性发展。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经济和安全为其两大支柱相似,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以共域军事合作和以两军为主体的军事交流^②为其两大支柱,以利益共同点为支撑,以军事互信作为其提升合作强度的基本保障,在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中寻求良性发展。中美之间在一系列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已为此提供了充分的实践基础。

美国在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防务重点》的防务战略指南中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一条弧形地带的发展息息相关。”

“从长远看,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出现,将有潜力以多种方式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中美两国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责任,构建双边合作关系符合彼此利益。”^③这一论断从战略层面表明美国已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在实现亚太安全方面彼此的深度依赖关系。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中美两国在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中,虽然思路与方式不尽相同,但却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战略目标,因而能够协调配合,形成有效合力。譬如,在朝鲜半岛稳定和实现无核化目标上有着利益共同点。为此,双方自2003年朝核问题发生后,共同合作努力促成六方会谈并致力于在此框架下解决朝核问题。在维持南亚次大陆稳定和防止印巴战争方面,中美也进行了积极工作,有效缓和了印巴两

^① Richard F. Grimmer and Paul K. Kerr, “Analyst in Nonproliferation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Nations, 2004-2011,” *CRS Report*, R42678, August 24, 2012, pp. 7, 9.

^② 所谓“共域军事合作”是指以维护共同安全为目的的两军之间的军事合作,譬如反恐军事行动、联合打击海盗以及灾难救援等行动;所谓以两军为主体的军事交流,是指以增进两军之间的互信为目的所进行军队间军人的交往活动。

^③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2.

国的关系。在处理敏感问题时，双方能够照顾彼此关切，有效管控分歧和风险。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美方也认识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改善程度的试金石，同时又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①，中美两国在防止“台独”分裂势力改变台海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有共同利益。为维护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中美两军也已建立并实施了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基于双向互利的原则，中美建立了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美国应中方的要求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美国国务院恐怖组织名单；在联合搜救、军事网络安全等领域也已开展合作。多层次不断发展的，出于相互影响和需要而非可有可无的，双方均为此付出代价和努力的军事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然形成。

二、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策略

（一）循序消弭信任障碍

中美双方军事信任的不足是两军之间推进新型军事关系建立的重要障碍。美方的不信任来自于对中方军事透明度的质疑，但任何一国军事透明度均与其军事力量建设的实际息息相关。中方在军事领域那些被认为不透明处，并非中方不愿透明，而是不能太透明；不是因中方军事力量之强，而是因中美军事上非对称性力量差异的现实存在。若美方处于中方当前的情况，其选择不会有什么不同。换位思考应是中美在军事领域增进理解和信任的有效方式。当然，随着中方军事力量建设的进步，中国军队自信心明显增强，其透明度自然会不断加大。中国对2013年10月海军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机动—5号”远洋实兵对抗演习的全面报道正是对此的真实反映。

目前，横亘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构中的三大障碍，即对台军售、抵近侦察和12个领域的军事技术交流限制，是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从中国角度看，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需要以三大障碍的消弭作为其渐进式关系建构的效果检测标志，因为前两个障碍明显涉及中国所确立的国家核心利益，而后一

^① [美]A.卡特、W.佩里：《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个障碍明确地传递了不信任感，因此，美方撤销障碍的实际行动自然会成为两军信任程度的试金石。

关于第一个障碍，即对台军售问题，涉及台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不应在北京和台北之间直接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应给两岸留下充足的时间自己解决。美对台军售的法理依据是《与台湾关系法》，即“美国应帮助台湾拥有武力自卫的能力，免受北京的威胁”。对于北京具有什么程度的威胁和台湾应当拥有怎样的自卫能力做出判定的是美方，错误的判断可能部分地源于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不透明，但随着军事交往的增加，误判可能降低。产生误判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来自于美国对当前两岸关系的新变化视而不见。自 2008 年以来，两岸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无论两岸关系如何发展，“一个中国”原则决不能改变，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必须恪守的法理依据。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一方面对台军售，另一方面则限制中美军事技术方面的交流，这必然阻碍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当前，要培植中美军事互信，美方应采取渐进步骤先逐渐取消对台军售，然后废除《迪莱修正案》等限制中美军事技术交流法案，之后逐渐实质性地确立与北京更密切的军事合作与战略互信。

关于第二个障碍，即美军机和军舰抵近侦察问题，问题起源于美方如何看待自身的安全形势和国家利益强度。在 2012 年防务战略指南中，美方明确指出，“美国与亚洲盟友和重要伙伴之间的关系，对该地区未来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将加强现有联盟关系，这是亚太安全的重要基石。”^① 由于中美双边军事关系的建构本已不易，而亚太地区第三方关系的引入又使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复杂化。尽管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朋友和伙伴；尽管美国是一个盟友诸多的国家，但也并不意味着凡事都要对盟友的立场全力照应，更何况前提是破坏国际法。双方都需将战略视野置于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地区集体利益的基点上多做考虑。这样，中美两军才能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也管好各自的朋友。改变抵近侦察是美方表达诚意的重要机会性因素。

关于第三个障碍，即对 12 个领域里的军事技术交流限制。这一限制源自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p. 2.

美军对中国军队从事军事交流意图的片面判断，“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国防部门开展交流的目的恐怕是想改善它的作战能力，包括获取技术和装备。这种目的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希望掩饰自身的弱点，而两军间的交往有可能会暴露这些弱点。”^①限制的解除取决于美军在交流中对中方的信任程度。从目前的情况看，美方更在意与中国军队更先进的技术领域，譬如航天领域的合作，却对中方在意的技术合作限制置之不理。这只会适得其反，反映出美军缺乏交流诚意，无益于双方军事关系的拉近。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各自军事技术的提高与成熟，这一领域限制终会取消，但那时可能就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而不具有实际意义了。

（二）控制好外围环境的作用—反作用循环

军事外交作为一种国家的军事行为，在战略决策层面由政府主导，但在分歧或危机发生之时，往往为伙伴或同盟关系、大众传媒和即时通信工具所影响，加速对某一军事外交事件中的作用—反作用循环，这导致事态在因果未清、外围环境尚处于非理性状态下就会被迫做出不适当裁定，其结果可能会引发事态向不利方向发展，最终失控。因此，在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增强两军军事互信的同时，国家政府层面需要通过官方相关渠道及时对信息给予有效积极的发布或引导，在危机或失误、意外发生时保持直接对话与沟通，尽可能相互确保彼此意图清晰，不做无谓揣测，减少第三方因素、国际舆论因素、国内民意因素等外围环境影响。

控制好外围战略环境。当前，“亚太地区存在一种风险，即形成类似冷战时期欧洲‘集团阵营’，比方由日本、美国领导一个阵营以及中国影响下的另一个阵营，我觉得这种类似两极化的态势会产生很负面的影响。”^②确如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研究学者胡里奥所说，遏制住地区敌对阵营的出现对中国而言迫在眉睫，譬如在处理东海方向的中日钓鱼岛问题时，中国面对的是美日联盟。不仅如此，作为一直试图增强军事投入、“修宪”的日本往往以中国力量的和平发展为借口，甚至呼吁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复

^① [美]卡特、佩里：《预防性防御》，第108页。

^② [西班牙]胡里奥·里奥斯：《“中国梦”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载《参考消息》2013年11月11日，第11版。

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与中国抗衡。^①而在南海地区，中国同样也面临着美国与其联盟阵营问题。由于外围环境的改变具有系统性，因此关键因素的影响也会引发“裂变”，导致事态向反方向发展。譬如，在不恰当时期或沟通不畅条件下和与对方关系敏感的第三国签订军事条约、协议或举行军事演习。此前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这样的举动只能增加重量级的负面效果，无益于双方已经形成的信任局面。

第三方因素的存在使得中美之间存在间接冲突的可能。解决好这一问题，需要双方在密切交流的同时，加大对第三方的管理和对矛盾的妥善协调，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提供良好的外围战略环境。这一战略环境本身既是美国的战略需要也是中国的战略需要，因此中美有深化军事合作、彼此进入到对方阵营的必要，从而破解阵营难题。此前，中国与美国通过六方会谈的形式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朝核问题的解决，这已经说明中国对此持包容开放态度、致力于亚太安全与稳定的基本立场。与此相应，美方是否也愿意在一些敏感和热点问题上让中方参与，并形成密切合作态势？中国不仅作为当事人身份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亚太地区有着关键影响力的大国身份出现，是以中美携手解决一系列安全议题的角色出现。在这个问题上，美方应当为中方提供腾挪的足够空间。

控制好外围舆论和民意环境。一方面，中美两国本身要控制好舆论与民意环境，另一方面，美国也有必要敦促自己的盟友控制好舆论与民意环境。以中日钓鱼岛争端为例，日本一些政治家在处理日中矛盾时带有国内政治目的，对中国的态度愈是恶劣，在国内就会获得愈多的支持。与此同时，一些美国政客也会偶尔到访日本，对钓鱼岛问题发出不利于问题解决、引发事态恶化的声音。这无疑在助长日本国内的不良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应成为问题争论的旁观者，而应扮演好管理者的角色。

（三）加快对外传播，尽快去军队形象认知模糊化

无论是刻意为之还是无意间形成，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中美两军双方

^① 2013年1月12日，安倍就通过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文章，称“中国试图把它对争议岛屿周边水域的管辖变成既成事实”，南中国海“似乎要变成‘北京湖’”。《简氏防务周刊：安倍吁组“民主安全菱形”抗衡中国》，中国网，2013年1月12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1/12/content_27666947.htm。

对彼此的形象认知是模糊的，在有些部分甚至是缺损的。就两军间的相互了解来看，中国军队对美军的认知程度大于美军对中国军队的了解。

仅从2013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中就能得到确切的答案。美国对中国军事外交所从事的一系列实践活动都采用了带有偏见色彩的语言进行表述：对中国派出“和平方舟”号医疗船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该报告称之为“中国的‘安慰’级军事医院船”；对中国自2008年12月起就开始执行的亚丁湾反海盗部署任务，该报告称之为“除偶尔的巡航外，这也是解放军海军在西太地区外执行的唯一作战部署任务”；在其“反太空”一节的内容中依然坚持错误的信息解读，认为“中国试图在公开场合打消一切对其太空军事意图的怀疑，并称时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许其亮上将在2009年公开收回了其早期关于太空军事化是‘历史的必然’的诊断”。^① 尽管这不过是对许司令员讲话的断章取义，但其冷战思维凸现无遗。

这种形象认知的模糊产生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意识形态差异。中国方面始终强调求同存异，但美军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两军交往中，美军更关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观点、军事观点的影响，《预防性防御》一书的作者曾明确指出，“通过一项包含以上措施的美中防务交流方案，美国可以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时候对一批关键人物施加影响。时不待人，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美国和中国对两军之间的交流抱有不同的目的。美国从自身的长远安全利益出发，希望借此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政治、军事观点。”^② 二是美国传媒掌握更多国际舆论主动权。据统计，美国等西方媒体垄断了世界大部分地区近90%的新闻信息传播，世界上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大约有80%来自西方各大通讯社。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国际传播秩序的不合理决定了美国掌控的国际舆论更轻易地达到塑造自身军队形象的目的，也更容易达到“妖魔化”中国军队的目的。而中国塑造军队形象的声音则往往被这种强势声音所覆盖，反受其害。三是中国在军事外交中的形象塑造还有较大作为空间。

^①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3*,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3.

^② [美]卡特、佩里：《预防性防御》，第107页。

一直以来，中国军队形象的塑造有着很明确的目标：和平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但是，正如迈克·麦德沃所言，中国从不缺乏需要表达的素材，欠缺的或许是表达力量背后的方式和方法。今天的中国军事外交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局部的谋篇布局，而是以国际大局为整体的造势与战略布局，要求中国军事外交逐步打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思维定势，实现被动到主动、保守向开放的转变，尝试回答好“我是谁”和“我以何种方式与你交往”的问题。尤其在“我是谁”的问题上，对于与西方国家军队不同之处一直未能做出完整、立体、清晰的说明。譬如中国军人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根本作风等，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区别于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最为本质的部分，最能充分说明我是“这一个”，而非“那一个”。

中国军队的形象塑造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过程，不能指望一两个事例或者一个阶段的努力就会一蹴而就。因此，打造好中国军队形象塑造的舆论品牌、用美国人的叙述方式去说明中国军队、用耐心和长久的舆论战略步骤设计去完成传播运作只是其中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军事文化的传播、对此类传播人才的积累、与对美国国会和美军会产生影响的重要人物的联系和人脉网络建设，这些资源的长期建设和经营才最终会使中国军队的形象认知在美国民众和军队那里逐渐清晰。

（四）强大自身，谋求与大国匹配的军事地位认同

对中国军队而言，中美军事关系的重要性对美军而言是否可同日而语，具有同样程度的重要性？从目前情况来看，回答是否定的。

在美国 2012 年防务战略指南（仅 8 页）中，有 3 处明确提到中国，而印度、俄罗斯和朝鲜各被提到 1 次，美国旨在发展和加深与印度及俄罗斯的关系，防止朝鲜挑衅。显然，与俄罗斯、印度相比，美国重视中国，但同时不仅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潜在战略对手，而且将中国视为主要的现实战略对手，反映出美国对中国怀着防范和猜疑的心理。这种心理差异反映着一种地位认同的非对等性，即美军对譬如俄军的实力、能力、意图的认同程度要大于美军对中国军队的各方面尤其是战略意图的认同。

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并不是为了谋求军事崛起，而是为了能够实现自我保护。中国军事地位在美国视野下的非对等认识表明中国军队现代化程度还

需要加快，在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同时，更要成为一个强国，其目的不是伤害别人，而是要能够产生影响并避免被伤害。苦练内功，并不仅仅是中国当前各领域发展的战略必需，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根本。

三、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构的机制需求

截至 2012 年 12 月，中美之间已经确立了大量涉及军事与安全的对话机制（表 1），特别重要的包括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防务安全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等。

表 1：中美军事、安全类对话机制及其运作

1998 年 1 月 17-20 日	美国国防部长科恩一行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美两国国防部长正式签署《中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
2001 年 9 月 13 日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在关岛举行。
2001 年 12 月 4 日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在北京举行。
2002 年 4 月 10-12 日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2002 年度会晤在上海举行。
2002 年 8 月 6-8 日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海空军事安全工作小组会议在夏威夷举行。
2002 年 12 月 4-6 日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海空军事安全工作小组第 2 次会议在青岛举行。
2005 年 4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赴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进行第七次中美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
2005 年 7 月 8 日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2005 年年度会晤在青岛举行。会晤期间，双方就中美两国海上军事安全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
2006 年 6 月 8 日	中美防务安全磋商在北京举行。
2007 年 12 月 3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艾德曼在华盛顿举行第 9 次中美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

(续表 1)

2008年2月28-29日	中美两军举行了第4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就落实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关于加强两军关系的共识,加强两军高层互访、机制性交往、务实性交流与合作等进行了具体商议。会晤结束后,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国防部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国防部就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开展军事档案合作事有关安排备忘录》。
2008年4月10日	中美两国国防部直通电话正式开通,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和美国国防部长盖茨首次通过直通电话通话。
2009年2月27日	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谢伟森在北京共同主持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2009年6月23-24日	中方与美方在北京举行了第10次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邀请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陆军参谋长来华访问。
2010年10月14-15日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2010年年度会晤在美国夏威夷举行。
2010年12月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赴美,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卢努瓦共同主持中美国防部第11次防务磋商。
2012年5月2日	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框架下,第2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在北京举行。
2012年9月27-28日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2012年年度会晤在青岛举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类新闻报道自制。

上述机制的形成与不断运作使得中美之间在战略层面的磋商与交流始终处于持续稳定状态,增加了提升信任几率、减少信息真空而可能导致的战略误判的可能,为中美军事信任的累积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与中美两国间已经建立的90多种各类机制相比,军事领域的机制相对来说仅占极小的比例。作为军事领域机制建设的短板,其功能性缺失可见一斑。军事交流机制的建立是中美在军事领域通过沟通对话解决分歧、寻求合作、创造性化解矛盾从而

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重要条件。从既有机制分析，中美之间已经确立的机制更多停留在为避免冲突、化解危机的消极军事合作层面，而非增强合作、密切关系的积极军事合作。对此，中美两军间应循序渐进机制建立，从消除信任障碍开始，进一步获得更广泛更深刻交往合作的发展空间，更多着眼于双方都必须做的事，而非“着重于各自希望对方做的事”。^①

（一）渐进式推进机制建设

既有中美军事交流反映出一个基本的路径，那就是尽管美方一直敦促中方开放基层交流速度和力度，但中方坚持的步伐是先高层后中层再基层的基本思路，小步稳定前进，虽有曲折和回落，但总体方向保持向前。而实现这种路径的是渐进式的机制落实。稳扎稳打，不急不躁，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所特有的影响基因，这为两军近年来取得实质性交流成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做法值得继承和推广到中美军事外交的其他领域，包括网络空间安全议题的探讨。中方曾建议为该领域制定行为准则，为问题解决提供了对话基础。从目前中美军事关系中的机制建设来看，还有很多领域可以着手进行机制建设，从一轨到二轨，从联演联训到军事艺术，从现役军人到退役将军，接触点愈多愈会加深对自身长远利益与对方密切联系的认识，但也会增加引发争论、意外事件的几率。尽管如此，交流及保障交流的机制是必要的，它使中美双方实现了“相互确保抑制”^②，逐步让双方信任升级，在磨合中最终形成军事领域的更为充分的协作。

（二）建立“中美+X”三边或者是“中美+NX”的多边防长会晤机制

当前中美军事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往往受到“第三方”因素掣肘。这里的“第三方”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有的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有的与中国有深厚友好关系，有的是美国的盟国。因此，在深化各自伙伴关系基础上，应当推进“中美+X”三边或者是“中美+NX”的多边军事关系。基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双边军事联盟扩大化的现状，为更好地发挥中国地区性大国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可以在其双边军事同盟的军事

^① [美]戴维·兰普顿：《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建立持久的基础》，载《参考消息》2013年9月24日，第14版。

^② [美]阿米伊塔·埃齐奥尼：《相互确保抑制：一种美中关系模式》，载《参考消息》2013年9月24日，第14版。

行动中请中国加入。譬如，在其“2+2”会晤中应当加入中国外长与防长或至少加入涉及安全议题解决的中国防长的席位；而在多边军事关系的建构中，应当推进以“中美”为先导的多边军事外交，从而建立符合两国利益、代表亚太最广大国家需求的地区安全关系网络。

（三）建立中美军事外交中的公共外交机制

外围环境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文化的影响与渗透。国家或军队形象的认知是一国国家文化或军事文化对交往国民众和军人的表层影响，更为深层的影响始终是文化的影响与渗透。文化渗透而非停留于形象塑造，更能使交往国实现由自主认知到自觉认同的转变。因此，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外交战略在对外军事关系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实现军事理念与文化的跨国界交流。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外交，公共外交更突显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是一种塑造良好军队形象的战略途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离不开成功的公共外交，作为这一战略实施中的必然组成部分，在军事外交中推进公共外交机制的建立、积极有效地塑造中国人民军队的海外形象亦是题中之意。首先，军事外交中的公共外交机制统筹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公共外交机制当中，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其次，军事外交中的公共外交直接服务于军事外交的战略部署，密切配合军事外交行动，其任务分配应当包括议题设置、传播平台构建与搭配、信息反馈的收集与整合、传播方式与内容的再调整；再次，这一机制还应能就不利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构的国际舆论作出有层次、有计划的舆论应对，扭转国际舆论氛围；最后，这一机制应当嵌入式存在于更大的国家总体外交机制中，而非独立存在于军事机构中，接受国防部外事机构和国家总体公共外交事务部门的双向管理。

（四）确立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智库机制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智库机制的确立可以完成以下主要任务：一是承担起“生产”军事外交思想的任务。智库是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案的诞生地，通过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战略规划传播，促进中美两军、两军与对方民众间、两军与对方政党间、两军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二是承担起有利于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维护、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决策的咨询任务，促进中美两军间的信任与合作。智库为军队提供有关公共政策的决策咨询服

务，同时也在影响决策、影响舆论、影响公众。三是承担起推动中美两军双边和“中美+N”的多边军事沟通的任务。军事外交智库作为融汇了官方、军方和民间的研究机构，可以通过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军方、非军方的广泛接触和学术交流，架起中美两国军队与对方国家政府、军队和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交流的桥梁，以便增信释疑，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促进合作，维护国家和军事关系的稳定，促进国际战略的安全与稳定。四是承担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构的军事外交人才培养的任务。智库是知识密集和智力密集型组织，提供浓厚的学术氛围、开放的研究方式和国际化的交流平台，有利于培养出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善于沟通和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军事外交精英人才。这些人才将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是今后中美军事外交管理和决策部门的重要的人才储备，在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域担当重任。^①

另外，智库并不必然仅限于中美两国战略人才。事实上，那些关注中美军事关系、能够担任中美两国军事交流桥梁的人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他们对中美两军均有了解，同时也有着作为极为重要的“第三方”的视角和声音，这一群体对于客观全面的战略策略的提出、更具有可信度的舆论声音的传播，从而塑造有利于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的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收稿日期：2013-08-05]

[修回日期：2013-11-14]

[责任编辑：张 春]

^① 刘源：《新时代防务智库的使命和挑战》，载中国军事科学学会（2006）香山论坛论文集：《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地区安全》，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分会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8页。

从全球民调看“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的相对性*

翟石磊

【内容提要】“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是世纪之交出现的关于国际权势转移的两种相对应的论调。传统的评价标准是通过衡量中美硬实力和软实力指标，最终确定两国国际影响力和对世界格局的主导力。但这一评估体系始终难以获得一致认可。而通过考察全球民众的感知和反应无疑对理解这样的权势转移问题提供了一种更加直观判断的依据。根据近 10 年的全球民调数据，“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更多的是一种相对变化，也是一种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国际公众更加认可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其他事务中，美国依旧是主导地位。而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公共外交等多重手段提高国际公众的信任度，通过赢得国际舆论支持以减少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担忧。

【关键词】中国崛起 美国衰落 权势转移 相对性 全球民调

【作者简介】翟石磊，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85-18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科研项目“西方媒体中国专栏的中国观研究”（项目编号：2013W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崛起”就已经成为国外政界、学界和舆论界议论的热门话题。同时，国际社会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自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共出现了大约五次较有影响力的“美国霸权衰落”论。^① 那么，中国是否真的已经崛起？美国是否真的开始衰退？总体来看，美国衰落论主要来自美国内部，这与美国传统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紧密相关。而为中国崛起唱赞歌的主要声音同样来自美国。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论调。从学术界研究成果来看，中美权势转移已经成为一个关注热点。那么，国际权势是否开始由美国向中国转移？这样的转移能否通过和平方式实现？鉴于传统的研究视角大都锁定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因素上，而侧重软实力分析的约瑟夫·奈重点考察文化软实力和制度软实力等因素，对于全球公众舆论的考察相对较少。本研究选择分析全球民众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论调的认知，以期从新的视角为这一争论提供补充性的佐证。

之所以选择从公众舆论角度分析中美权势转移问题，是考虑到公众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也是学界的聚焦之一。^② 舆论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意见呈现，反映的是公众意见和言论，内容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其整体形态却又反映着一种客观的问题。^③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际主流民调机构：世界舆论调查项目（World Public Opinion），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及英国广播公司（BBC World Service）等。这些机构在国际民调领域享有盛誉和威望，其调查范围覆盖全球，其调查样本、问卷设计等也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市场的考验。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机构大都属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因此，

^① 王瑞平、庞中英：《否认“美国衰落”：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新发展》，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第128页。

^② 关于民调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两种主要观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前者认为公众缺乏对国际问题的认知，不能客观认识国际形势，同时其态度不断变化，缺乏理性。因此是不可靠的，不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而后者观点肯定公众的作用，认为公众能够对外交政策产生积极作用。

^③ 关于舆论或民意（Public Opinion）的定义非常多样化，人们都意识到舆论的重要性，但对于什么是舆论却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一种定义是：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在舆论的定义中，最关键要讨论的是，舆论的本体是“意见”还是“态度”。为了避免在定义上争论不休，学者开始转向舆论应该包含的若干要素，其中“议题”、“公众”和“共同意见”是学者们提出的众多要素的交集。

不可避免的要注意其国家意识形态偏好性以及可能隐含在调查中的思维定势和可能的偏见。这些成为本研究需要注意和反思的问题。但由于目前中国缺乏具有如此国际视野和业务能力的民调机构和智库，故而西方民调数据不仅作为本研究的信息来源，同时也最直接体现西方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影响力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本研究也有其具体的特定意义。

一、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

全球民调结果显示，2011年和2012年期间，中国的积极影响力在持续上升，而美国则略微下降，欧盟的积极影响力下降幅度最为明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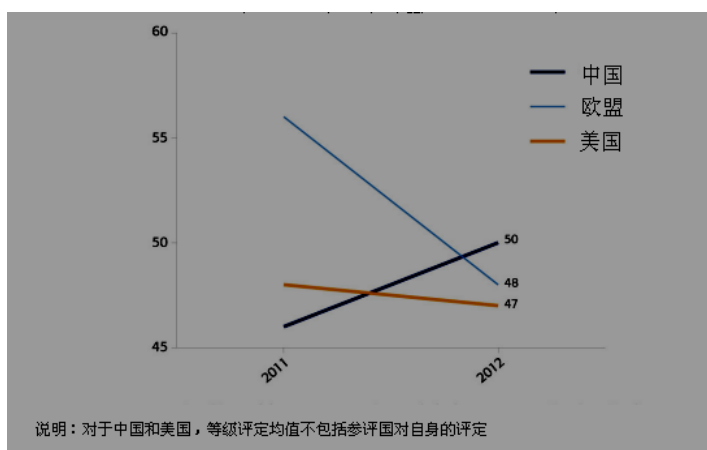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公众对中、美、欧积极性影响力认知变化趋势，2011—2012年
资料来源：“Views of Europe Slide Sharply in Global Poll, While Views of China Improve,” *BBC World Service Poll*, May 10, 2012, p. 3。

虽然国际公众并不确信中国是否已经或最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但是他们已经感受到中国经济对亚洲和美国的强大影响力。民调数据显示，仅有50%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最终和美国等同，另有38%认为该局面不可能出现。但是中国公众认为中国具有强大的区域影响力，而美国则具

有全球影响力。^①

那么,在全球公众看来,中国是否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呢?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全球18个国家展开调查。结果显示:40%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已经或最终将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有44%的受访者则认为这样的取代永远不会出现。该机构在2011年发布的民调数据则显示:有47%的民众认为中国已经或最终会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有36%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取代不会出现。^②

从皮尤全球民调来看,西方公众更认为中国已经或最终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领头羊,而发展中国家也有近一半的公众认为这一局面已经或最终会出现。^③从民调数据分析,中国崛起更多的是经济的崛起,是未来世界局势发展的大方向。讨论中国崛起更多的是讨论一种未来,而不是现状。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最有影响力国家排名中,美国获得9.1的综合评分,其次是英国(7.0),中国位列第三,综合得分为6.8。^④美国全球影响力依旧处于绝对的主导性地位。当然,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大国国际影响力也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发展一直不明朗。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持续至本世纪初,“9·11”事件后,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变革显著,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迅速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国际舆论中一直存在对中国崛起后的国际影响力的预测。相关民调数据显示,2008年和2010年美国国际影响力指数高于中国,但至2020年,中美国际影响力指数将相差无几(美国为8.0,中国为7.8)。而在未来50年内,有3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依旧为世界主导力量;而有40%的受访者认为另有大国将与美国实力相当,并驾齐驱;2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将会被另一个大国所超越。^⑤也就是说,中美国际影响力倾向于逐步接近,最终

^① World Public Opinion (WPO), *Country Highlights Report*, 2007, pp. 36-38.

^② Richard Wike, “From Hyperpower to Declining Power Changing Global Perceptions of the U.S. in the Post-Sept. 11 Era,”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September 7, 2011.

^③ “China Seen Overtaking U.S. As Global Superpower,” *Pew Global Project*, July 13, 2011.

^④ “Global Unease With Major World Powers Rising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47-Nation Survey,”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June.27, 2007.

^⑤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 Results of a 2010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World Views*, Chicago Councils on Global Affairs, 2010.

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国家。

另一份同样主题的多国民调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在美国，有 40%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未来 50 年依旧是全球领导力量，而有 39% 的受访者认为将出现和美国并驾齐驱的国家；另外的 16% 公众认为美国将被另一个国家超越；在韩国，有高达 51% 的受访者认为将有国家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国际力量；在印度持这一态度的比例为 30%；在中国有 33% 的受访者持此态度。而对于未来美国依旧是全球主导力量的调查显示，韩国有 31%，印度有 28%，中国有 23% 的受访者持此态度。而对于第三个可能性：美国在未来 50 年将被另一个国家超越，韩国有 17% 受访者认可此观点，印度 23% 和中国的 27% 的受访者认可此观点。^①

表 1.中美两国国际影响力变化的时空对比

	影响力现状		理论上影响力		10 年后影响力		变化幅度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美国公众	6.4	8.5	4.6	8.2	6.8	8.0	+0.4	-0.5
中国公众	7.8	8.6	8.9	7.1	8.3	8.3	+0.5	-0.3
印度公众	6.0	7.3	6.2	6.7	6.2	7.2	+0.2	-0.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综合民调数据可以看出（表 1），针对当下中美影响力指数调查方面，美国公众认为美国依旧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家（8.5），中国的影响力位列第三（6.4），调查认为美国的现实影响力指数略高于其应该具有的影响力指数（8.2），而中国的现实影响力指数则大大高于中国应该具有的影响力指数（4.6）。在调查未来 10 年中美国国际影响力方面，美国影响力指数下降至 8.0，而中国则上升至 6.8。但美国全球影响力依旧明显领先于中国。有相关民调报告也显示，在全球影响力方面，中国无一超越美国，只是在非洲和亚洲地区中美影响力差距偏小，但幅度也在 1-18% 之间。^②

^①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Results of a 2006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Chicago Councils on Global Affairs, 2006.

^② “Global Economic Gloom - China and India Notable Exceptions, Some Positive Signs for U.S. Image,” 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6, 2008.

皮尤全球态度（2006年）调查结果显示，印度、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受访者普遍认为未来10年到50年不会出现撼动美国独大地位的国家。^①然而2011年民调结果却显示：虽然当前甚至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会全面超越美国，但中国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会存在分化的倾向：中国越来越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大国，而美国则被视为全球军事大国（图2）。^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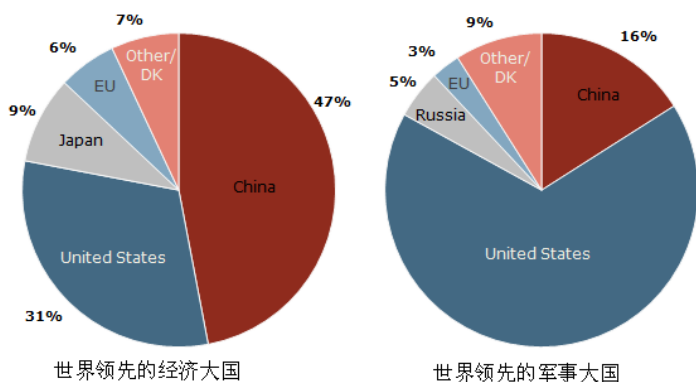


图2. 民意调查中的中美经济、军事全球地位

资料来源：Richard Wike, “From Hyperpower to Declining Power: Changing Global Perceptions of the U.S. in the Post-Sept. 11 Era”.

一份2009年民调报告显示，美国、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有过半的民众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事务的领导者；^③2010年数据也显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未来10年将接近美国，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则一直呈现下降趋势。^④

^① “China’s Neighbo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Publics of Asian Powers Hold Negative Views of One Another, a 6-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 Survey,”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September 21, 2006.

^② Richard Wike, “From Hyperpower to Declining Power Changing Global Perceptions of the U.S. in the Post-Sept. 11 Era”.

^③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New Results and Analysis*,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09.

^④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Results of a 2010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Global Views 2010,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0.

在 2013 年，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国际影响力的比例出现明显下滑，与 2010 年的数据出现极大反差。在受调查的 21 个国家中，41% 的人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影响力，而另有 39% 的人持相反态度。与 2012 年数据相比，持有积极和消极态度的比例有 8 个百分点的调整。经过多年的整合，今天国际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呈现出分裂状态。在包括欧盟在内的 17 个参评国家中，中国的积极影响力排名第 9，比 2012 年下降了 4 个名次。而认为中国国际影响力具有消极意义的公众主要来自发达国家。^①

二、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后果认知：亚太视角

根据一份 2007 年的民调报告，国际公众对中国成长为与美国平分秋色的经济体持有相对分裂的态度。在墨西哥、阿根廷、亚美尼亚、乌克兰、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有 1/3 的受访者持积极态度；而在美国、法国、以色列和菲律宾等国受访者认为不好也不坏。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坏事件的最高比例为 33%，分别出现在墨西哥和美国。^②

如果说中国崛起是一种历史趋势的话，那么中国崛起是不是一种威胁？一项在美国开展的跨度为 20 年（1990—2010 年）的国际民调显示：从 1994 年到 2002 年，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是个威胁，而 2004 年出现大幅度下滑，跌至 33%。到 2010 年，有 43% 的受访者依旧持“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图 3）。^③

尽管从地缘政治角度讲，讨论中国崛起或美国衰落的影响有其全球意义，但最直接也最为主要的影响仍是这两个国家所处的亚太地区。因此，分析亚太地区公众对中美两国权势转移的后果的认知具有很直接的现实意义。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2008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有 70%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军事威胁，日本和韩国持此观点的人均为 74%，而印尼持此态度的公众比例则为 47%。对于美国是否成为军事威胁的民调显示：

^①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Slide While UK’s Ratings Climb: Global Poll,” BBC World Service Poll, May 22, 2013.

^②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and the Worl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Report 2007.

^③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大多数中国（76%）和印尼（83%）受访者持有此类态度，而日本（43%）和韩国（49%）的民众比例均不超过一半。^① 2011年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发布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西欧国家如法国、葡萄牙、波兰、意大利等更倾向于将中国经济发展视为对本国的威胁，而德国、英国、瑞典、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荷兰等国则视中国经济发展为本国的机遇。当然，民调报告也显示美国人将中国经济崛起视为威胁（63%人持消极态度，31%的人持积极态度）。欧洲人与美国人针对中国是否作为一个军事威胁力量存在也有明显分歧。总体来看，有62%的欧洲人并不认为中国的军事发展是威胁，49%的美国人持有如此认知。但是，对比以往的调查数据，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的欧洲人比例略有上升。^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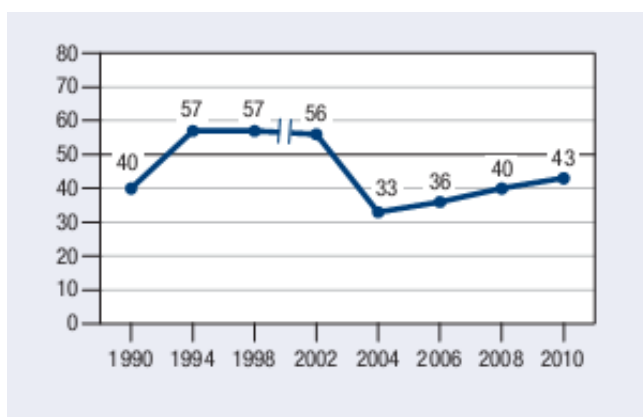


图 3. 国际公众对中国崛起具有威胁性认知变化趋势，1990—2010 年

资料来源：“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Adapting to New Realities”。

既然中国经济崛起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一种共识，那么中国是否会通过崛起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呢？总体上来判断，国际公众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但是无论当前还是未来 10 年、20 年、甚至 50 年，中国都不具备完全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实力。在地区

^①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08.

^② *Transatlantic Trends 2011, Key Findings*,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1.

和国家类型分布上，中国周边邻国普遍认为中国不会取代美国，而发达国家以及部分非洲、拉美国家则更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认为中国具有取代美国的实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自身大都不认为中国在未来半个世纪内会取代美国。具体来看，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在外资引进方面名列前茅。军事实力、软实力等方面，中国依旧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①

中国未来能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这一问题在不同的民调中均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皮尤全球态度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印度、美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受访者普遍认为未来 10 年到 50 年中国不会撼动美国独大的地位。^② 皮尤全球态度的另一份民调结果也显示，虽然当前甚至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会全面超越美国，但中国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存在分化的倾向：中国越来越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大国，而美国则被视为全球军事大国。^③

从当前的民调来看，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崛起成为国际舆论场中关于中国崛起的主要关注点。皮尤的民调显示：有 40% 的印度人、48% 的俄罗斯人、68% 的日本人和 95% 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件好事情（图 4），但却有高达 93% 的日本人、76% 的俄罗斯人和 63% 的印度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是件坏事情（图 5）。^④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公众对一个经济崛起的中国持有相对积极的欢迎态度，但是却不愿意看到中国成长为军事大国。这体现了亚洲地区大国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合作机制，也为美国插手亚太事务提供了机会。

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份民调数据可以看出，在中国有 7%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具有消极意义，而韩国持有此态度的比例为 41%，美国和印度分别有 46% 和 39% 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崛起具有消极意义。而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具有积极意义的态度调查中，有 91% 的中国人持有此态度，韩国、美国和印度分别有 59%、47% 和 46% 的人持有此态度。国际公众对中国经济崛起所持的消极态度要高于积极态度，但仍不失总体平衡。在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军事崛起”时，中国有 6% 的受访者认为这具有消极意义，而

^① “Global Economic Gloom”.

^② “China’s Neighbo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③ Richard Wike, “From Hyper power to Declining Power Changing Global Perceptions of the U.S. in the Post-Sept. 11 Era”.

^④ “China’s Neighbo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印度、韩国和美国则分别有 46%、68%和 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事崛起具有消极意义；对中国军事崛起持积极态度的受访者中，中国为 90%，印度为 40%，韩国为 31%，而美国仅有 19%。^① 这也证明“中国威胁论”存在一定的“民意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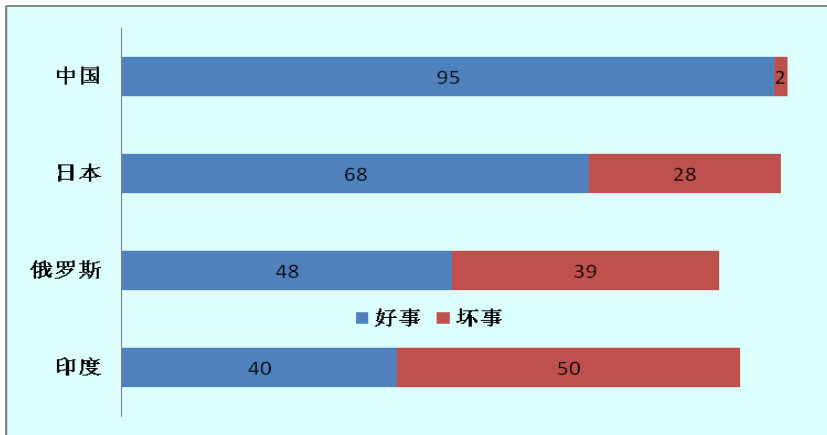


图 4. 亚洲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态度

资料来源：“China’s Neighbo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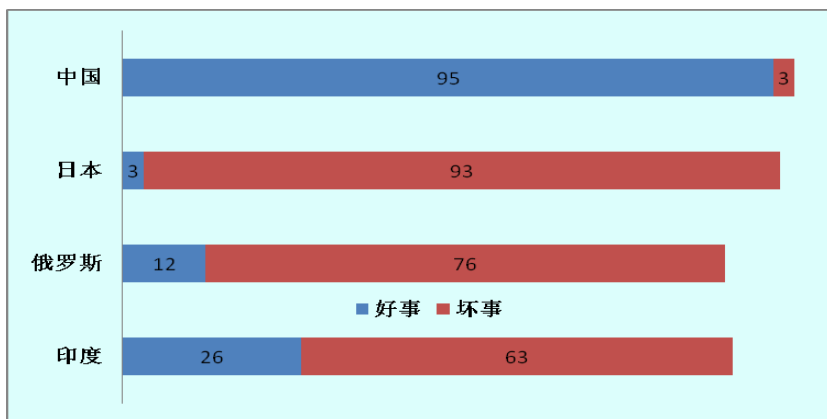


图 5. 亚洲对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态度

资料来源：“China’s Neighbo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①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但是，伴随中国崛起而来的是“美国衰落论”。调查发现，针对“如何看待美国经济变得衰落”这个问题，持消极态度受访者比例分别是：印度为42%，中国为54%；持积极看法的比例为：印度38%，中国34%。可见，美国经济对中印两国的影响力之大。而对于军事实力的衰落调查，38%的印度人和52%的中国人认为这具有消极意义，43%的印度受访者和3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具有积极意义。^①综合来看，美国的经济衰落不是中印两国公众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对于美国军事实力的衰落，中印公众则出现了分歧。

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数据，总体上看，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与美国相当，甚至在美国、日本也是中国的影响力指数高于美国。亚太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的领导者，也对于中国解决亚洲地区问题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是对于此局面普遍表示担忧，舒适度不高。^②尽管美国过去10年的战略中心是中东反恐，亚太地区似乎成为了“被遗忘的”区域，但是，美国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历史“空白”而明显降低，恰恰相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提升的受访者远高于持下降观点的人数。

在中美两国对亚太地区推行政策有效性认知方面，美国影响力超越中国。其中，日本、韩国、印尼以及越南受访民众对美国亚太政策效率的认知高于中国。而中美两国民众均认为自己国家具有更高的影响力。

在经济影响力方面，中国具有极大的国际影响力。多数调查均显示，中美两国的经济影响力相差无几。其中日本受访民众更是认为中国比美国在亚太地区更有经济影响力。而中美两国受访者均认为中国更具有经济影响力。这样的结果与前文所谈及的全球公众认知形成一致的判断：即中国已经成为在经济上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大国。

在“中国担当亚洲领导者”角色的问题方面，受访公众均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领导者，尤其是韩国和越南，但是，几乎所有受访者同时表示对这样的局面会感到“不舒适”（除越南有56%的受访者表示感到舒适以外）。

关于中美两国在解决亚洲地区关键问题的角色认知方面：认为中国具有积极作用的比例（80%的中国受访者，62%的印度受访者，53%的韩国受访者

^① Ibid.

^② “Soft Power in Asia”.

和44%的美国受访者)普遍低于美国(59%的中国受访者,66%的印度受访者,58%的韩国受访者和77%的美国受访者)。而最大的反差主要是中美两国公众对对方角色认知的不对称性:即相比美国公众对中国角色的认知,中国公众更加认可美国的角色(5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起积极作用,29%持消极态度;而美国受访者对中国在解决亚洲地区事务角色态度中,44%的受访者持积极态度,47%的受访者持消极态度。)①

美国2011年推出所谓“重返亚太”战略,是因为美国方面认为其在亚太已经“失去了十年”。那么,亚太地区的公众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过去的十年中削弱了? 民调数据显示,认为美国在亚太影响力削弱的比例(22%)远远低于认为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保持不变(50%)和增加(26%)的比例。② 换言之,在亚太地区民众看来,美国并不存在“重返”的必要,因为其影响力一直存在,并且不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更多是因为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持续增加(4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影响力增加)而使得美国主宰该地区事务的影响力遭遇挑战。

舆情研究表明,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存在“崛起困境”:凡是在经济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在政治上普遍倒向美国;比如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蒙古等。③ 这种困境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在美国国内舆论中,对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有这样几种论调:包围与遏制战略、接触战略及“两面下注”。④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相关民调显示,持有应对中国“施以友好对话合作”态度的比例(2006年65%,2008年64%,2010年68%)普遍高于“积极限制中国实力增长”的比例(2006年29%,2008年33%,2010年28%)。⑤

2012年一份民调报告显示:自1990年至2012年,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是极大威胁的比例从1990年的40%上升至57%(1994年和1998年),然后这一比例开始下降,到2004年左右为33%。但随后又开始逐步回升至43%

①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② “Soft Power in Asia”.

③ 翟石磊:《国际公众对中美软实力的认知与反应——基于近十年国际主流民调数据的分析》,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30页。

④ 钱洪良、杨光海:《中国和平崛起与周边国家的认知和反应》,第44-50页。

⑤ “Constrained Internationalism”.

(2010年), 2012年为40%。在2006年, 受访民众认为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是伙伴关系的比例为41%, 到2012年该数字上升到48%。可见, 国际公众开始接受中美作为世界大国这样的事实。^①

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受访者的反应更加倾向于务实, 并乐见中美两国合作。据2012年发布的民调报告, 有6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采取友好、合作、包容的方式对待中国崛起。仅有2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限制中国实力的发展。而对于如何界定中美关系性质, 该报告显示, 2006年有49%的受访者认为中美是敌对关系, 有41%的人认为是伙伴关系; 在2012年, 持上述态度的分别为48%和47%。^②

三、“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认知分歧的原因

以上分析说明了这样一个舆论环境现状: 中国与美国都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两国都对全球事务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中美两国并不完全处于同一个舆论体系层级(如果把国际舆论分布视作存在一个等级差异的体系的话), 美国处于核心的操控层级, 而中国正逐步从中间层级向核心层级过渡。从国际关系的“不对称性”角度看, 中美两国也存在很大的不对称: 比如两国的体制不对称, 意识形态不对称, 历史观不对称, 军事实力不对称, 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不对称等等。这样的不对称在国际舆论中必然会产生不对称的舆论分布。但这样的不对称性又不可能直接形成对峙或冲突, 因为从国际民调分析也可以看出, 中国与美国逐步开始分担处理全球和亚太地区事务不同的角色。美国也同样遭遇国际公众的不信任和怀疑, 需要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最终形成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复合性相互依赖”。^③这也符合国际公众对当代两大全球力量的

^① “Affairs, American Shifting Focus to Asia,”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September 10, 2012.

^②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Results of the 2012 Chicago Counci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2012.

^③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利与相互依赖》(第四版), 门洪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9-15页。

期待。

由于中国尚未确立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具体形象和角色（至少国际公众并不完全明确中国崛起究竟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公众对中国崛起持既支持又担心的怀疑态度。同时，按照基欧汉和奈的观点：传统而言，东亚多边制度化程度弱于欧洲甚至美洲。东亚地区没有类似于欧洲联盟、北约、里约热内卢条约或美洲国家组织的国际制度。相比欧洲和美洲而言，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更为突出，双边关系更为重要。因此，东亚地区图景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更为显著，有时使得接近于符合相互依赖的模式相形见绌。^①

以上民调数据分析清晰显示，公众对中美权势转移的认知相当多元。其原因是什么呢？有学者指出，“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西方大国在维护其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应对中国这样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中国崛起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仅因为中国正在实现民族复兴和历史性转变，更因为中国崛起的方式和方向问题：即中国以什么样的路径崛起（和平的还是扩张的？）和崛起后的中国向何处去（称霸全球还是与世界各国共享利益、和平相处？）。民众认识国际问题往往包含很大的主观好恶成分。比如皮尤发布的中美两国五家智库联合开展的“中美安全认知项目”（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Project）中关于“美国公众、专家对美国对华政策认知”的研究项目显示，美国公众在对中国经济崛起、军事崛起和中国发挥地区及全球影响力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总体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专家学者对美国对华政策显得更加理性，而民众则显得更加激进和感性。^② 这样的反应不仅仅是其自身知识结构和所处社会环境差异造成的，也与其获取相关信息渠道差异有关。美国民众关于中国的认知主要来自媒体，而美国媒体价值观取向则是强调负面消息的新闻价值。关于中国的报道更多的是问题和负面事件，这些事件往往又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相冲

^① 同上，第42页。

^② “US Public, Experts Differ on China Policies, Public Deeply Concern About China’s Economic Power,” 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Project, September 18, 2012. 该项目由皮尤中心全球态度项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共同开展。

突。因此，公众往往基于其从媒体中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来判断中国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此类影响力的认知不仅具有局限性，同时也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但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中美两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差异造成的，中国与美国公众存在不同的历史观和现实感知。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公众的信息源、国家利益观以及公众舆论自身的特点是主要原因。

首先是信息源问题。国际公众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得与中国崛起或美国衰落相关的信息：媒体（包括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和政治宣传。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的传媒集团掌控着全球信息流动，诸多关于中国和美国的新闻也是经过这些媒体的加工而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媒体机构或受众。从近十年的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问题的议题设定方面可以看出，经济议题一直是最凸显的内容。而关于中国经济新闻的报道大都遵循这样的路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经济实力迅猛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能源消费能力将超越任何一个国家。同时，关于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浪费问题、血汗工厂以及中国国有经济的垄断性和国家补贴等新闻同时跟进。这样最终形成了一个两副面孔的中国崛起形象：迅速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崛起所产生的全球威胁。

政治宣传也是国际公众获取中国和美国信息的重要渠道。特别在西方民主国家，出于竞选的需要，很多政治家往往会大打中国牌。抨击中国一般会获得国内舆论的支持，也能刺激公众神经，为他们赢得选票。这样，中国往往就被那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给“消费”了。

其次是国家利益观。所谓国家利益观，主要是指国民对于国家利益的构成以及维护和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看法。比如日本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态度明显偏离了事实。中日经济互为补充，紧密相连。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冲突，日本公众很难客观、冷静地看待中国崛起。比如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公众看到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民主国家的崛起，按照文明冲突论的逻辑，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是新兴大国对既有大国权势的挑战。因此，他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往往容易形成共同体。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印尼以及非洲和中东大部分国家，由于同属发展中国家阵

营，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他们对于中国崛起一般持有积极态度。

最后，公众舆论自身的特点也是形成如此差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国际公众对中美权势转移的速度和程度认知的差异方面。当我们提出中国崛起或美国衰落这样的命题时，我们的标准是什么？目前学界仍旧没有达成共识。传统的研究是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指标来衡量，约瑟夫·奈等人从软实力或巧实力方面进行衡量。但是，如何具体精确地衡量依旧难以判定。所以，如何认识中国崛起或美国衰落的评估标准就具有多样性，其中难免存在带有感情的主观判断。公众舆论的晴雨表功能一直遭受质疑。在外交事务研究领域，关于公众舆论在外交政策制定中作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democratic approach）和现实主义范式之间（realist approach）。关于二者的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Kant）和边沁（Bentham）。他们认为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至少是部分和平的，因为公众在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方面具有建设性作用。^①

汉斯·摩根索以及其他诸多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公众舆论缺乏理性和一致性，只能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障碍。现实主义传统认为公众最多可以对当地事务产生一定的影响；外交问题远离公众生活，极其复杂。公众根本不会对外交政策产生积极的作用。^② 因此，可以这样说，公众在看待国际问题时，往往带有一定的情感因素，也与其对国际事务思考的视角等方面有着紧密关系。

四、未来发展态势与中国应对

从近十多年以来关于中美权势转移的民调数据来看，公众舆论存在一定的阶段性波动特点，但总体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即中国在不断发展壮大，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在逐步淡化。而引发总体趋势中出现转折点的原因主要有中国、美国和全球重大事件的影响。比如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十年的战争可以说是美国失去国际民众信心的十年，而这又恰恰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①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to the Almond-Lippmann Consensus Mershon Series: Research Programs and Deb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4, Dec. 1992, pp. 439-466.

^②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 1978, p. 558.

的十年。但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由于在火炬传递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新闻，西方公众以及部分非西方公众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经济的较好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因此从 2009 年开始，中国崛起论和美国衰落论成为国际媒体舆论和公众舆论的主流。所以，从大趋势来判断，只要没有重大意外事件的出现，国际公众将继续对中国崛起持有积极心态。而那些不希望中国崛起的国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中国的崛起。

从中国方面来讲，中国崛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从民调来看，中国公众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崛起，并将最终取代美国。这与中国国内舆论环境和社会特点具有很大关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内也出现了诸多负面社会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但这些不会影响大局。鉴于当前国际公众舆论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认知的特点，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应对方案。

第一，中国需要加大对本国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引导和公关力度。中国国民对中国未来发展持有较为矛盾的心理。调查显示，很多民众认为中国崛起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中国自身。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受访者不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的原因。造成这一认知局面有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管理方面的原因，同时媒体所建构的“拟态”中国也是重要原因。媒体要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同时，要有社会担当，发挥正能量舆论引导功能，培养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此外，考虑到国际媒体，特别是西方强大媒体集团对国际舆论的主导地位，中国应更加主动积极地与之对接，避免在重大事件报道面前缺位、无语和作出不适当的反应。

第二，公共外交需要有更加清晰的发展战略，其中对国际公众外交是重要内容。中国应更加注重民众的中国观的引导，加大民间外交和舆论外交的力度。在信息化时代，重视民意和媒体对提升国家影响力、培养友善的国际公众、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外交不仅仅是传统政府外交的补充，更应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一环。

第三，中国需要明确提出自己的世界观，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担忧。这里的世界观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如何看待世界以及

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一种政治世界观。近年来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崛起以及胡锦涛所倡导的和谐世界主张都是对中国世界观很好的阐述。但是，这样的世界观阐述多大程度上对国际公众产生了影响，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因此，必须从战略高度和实践层面反思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国际舆论突围策略问题。从舆论产生、发展的特点角度来看，中国应更主动地对外介绍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路径，以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媒体和国际公众能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回应其相应的关切及疑虑。在外宣方面，要多讲不足，不能总讲成就，否则就会为中国威胁论或危机论提供借口。比如高消耗、高污染、廉价劳动力与血汗工厂、掠夺国际资源、依赖国际供给和国际市场输出等等都会成为中国崛起的负面标签。中国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分享自我发展成就，提供与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相称的国际公共产品，更多地与国际公众对话。同时对国际涉华舆论要分层、分类别、分性质对待，切忌简单地归类和站队。对于那些因为不理解中国、不信任中国所形成的涉华负面舆论，中国方面更应该从对话角度回应，而不是辩解和冷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引发美国衰落的观点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的零和思维，是抹杀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赖的各个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特点的错误认知。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谐与共生。中国外交追求一种和谐共赢的局面，希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发展的机会。从现实角度讲，中国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意愿，体现中国发展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普通公众的积极意义。这考验的是中国国际公关能力和国际传播力，同时也是重塑中国国际诚信和威望的最优路径。

[收稿日期: 2013-07-22]

[修回日期: 2013-09-29]

[责任编辑: 杨立]

美国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 与生成逻辑*

何晓跃

【内容提要】政治极化在当今美国政治中有持续增强趋势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选举政治、国会运作和公共政策制定，同时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亦存在颇多争议。美国的政治极化可分为政治精英和公众两个层面，两者的逻辑关联点是美国选举体制赖以存在的政治地理的区块划分，在总统大选中表现为以州为基本单位的选举人团体制，在国会选举中表现为以选区为基本单位的议席竞争体制。以此为基础，政党和公众作为双向施动者共同构建了美国政治极化的三个基础性生成机制和两个反向生成机制。虽然美国人口结构变化与限制政治献金的立法进展可能使美国政治生态在未来发生回调，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公共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可选择性、社会运动的冲击、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等因素使得美国政治极化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美国政治极化的持续，要求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应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特点，加强与美国民间的交流，并对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回归做好充分心理准备。

【关键词】政治极化 层次界定 生成逻辑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何晓跃，中共台州市黄岩区委党校助教

【中图分类号】D7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103-18

* 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政治极化^①在当今美国政治中有持续增强趋势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选举政治、国会运作和公共政策制定，这在政治学界已引起广泛关注。同时，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亦存在颇多争议，争议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关于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政治极化可分为政治精英和公众两个层次，目前美国政治精英的极化是获得普遍承认与论证的事实，但公众中是否存在极化则没有统一的结论。二是关于政治极化中政治精英与公众之间的关联逻辑。目前美国的绝大部分政治精英（立法、行政、司法体系中的民意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问题在于：如果公众的党派意识形态趋向极端（持自由派立场与保守派立场者居多数，中间派与温和派居少数），那么极化的选民基础通过选举体制产生极化的政治精英群体合乎逻辑；但如果公众整体并不存在极化，而事实上当前美国公众的党派意识形态也处于温和区间（下文中会对此进行论证），这就造成美国政治极化存在表征“矛盾”，即未极化的选民群体如何产生极化的政治精英群体，且极化的程度得以加强与延续？^② 本文拟在对美国政治极化进行层次界定的基础上，对其生成机制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并探讨美国政治极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启示。

一、美国政治极化的层次界定

层次界定的核心在于对美国政治精英与公众两个层次上是否存在政治极

^① 本文所指的“政治极化”以美国国内政治为概念界定范围，指的是美国政治精英（或普通选民）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党派意识形态来引导自身政治参与行为并形成相应政治现象与结果的一种持续性过程。在当今美国国内政治中，政治极化突出表现为：以立法和政策制定为主要内容的国会运作中，国会议员比以往更经常出现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以州和国会选区为基本地理空间单位的选举政治中，区域性选民较以往更具有倾向性的党派取向。

^② 根据“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y)，在两党体制的政治竞选中，候选人若要赢得选举，其须获得大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也就是其理念与政策须满足大部分中间选民的偏好。按照该理论的表述，未极化的选民基础不可能通过竞选体制产生在理念与政策方面持极化立场的民意代表。此理论最初由唐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在其论文“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making”中提出，后由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其专著*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中深化。参见 Duncan Black, “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6, No. 1, 1948, pp. 23-34;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al Action in a Democr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5, No. 2, 1957, pp. 135-150。

化现象作出判断。其中，政治精英的极化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证明，但公众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极化现象则存在很大争议。就目前看，美国公众整体并未出现极化，但区域范围内其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存在加强趋势。

（一）政治精英的党派意识形态趋向及其依据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美国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由原来互有交集开始走向分裂，共和党内持中间、温和派立场的政治精英持续趋向保守派立场，而民主党内持中间、温和派立场的政治精英持续趋向自由派立场，这种趋势导致两党在国会中纷争不断。

第一，两党意识形态趋向的量化评估。一是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裂日益扩大。美国政治学界主要用提名分（DW-NOMINATE Scores）^① 的绝对值差值作为衡量两党意识形态分裂间距的主要依据。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互有交集，中间及温和派议员在国会中视立法和政策本身进行投票，而非完全以党派划界。第 82 届国会（1951—1952 年）小于 0.05 的提名分差值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亦相符，但其后历届国会的提名分差值开始扩大特别是在 90 年代后的国会中被急速拉大，第 111 届国会（2009—2010 年）的提名分差值达到 0.26。二是两党内部意识形态的同质化逐步加强。衡量同质性的程度，美国政治学界主要用提名分的绝对值作为主要依据。2010 年时，美国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提名分绝对值分别为 0.91 和 0.92，民主党人分别为 0.97 和 0.93。^②

第二，两党意识形态极化的外在表现。意识形态的极化导致两党在国会运作中按党派划界，其主要表现是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两党在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税率、财政赤字、外交政策等方面本有因历史因素形成的分歧，在极化背景下，其在立法和政策制定方面比以往更经常出现一党多

^① 提名分是美国政治学界用来衡量国会两党党内议员意识形态同质化程度及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分裂程度的主要指标，分值在-1 到 1 之间，分值绝对值越高，表示党派意识形态同质化的程度越高，提名分量化评估方法由美国学者凯斯·普尔（Keith T.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德尔（Howard Rosenthal）首创，参见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A Spatial Model for Legislative Roll Call Analysis," *Working Paper*, No. 5-83-84, Vote View, http://voteview.com/Upside_Down-A_Spatial_Model_for_Legislative_Roll_Call_Analysis_1983.pdf.

^② Royce Carroll, Jeff Lewis, James Lo, Nolan McCarty, Keith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DW-NOMINATE Scores With Bootstrapped Standard Errors," updated February 17, 2013, <http://voteview.com/dwnomin.htm>.

数反对另一党多数，奥巴马政府推动医疗改革方案在国会通过时无一共和党议员支持是最佳例证。衡量国会中一党多数反对另一党多数的趋向和程度可用党派团结投票分（Party Unity Scores）作为依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两党的党派团结投票分都比较低，但之后该数值逐步上升，到90年代后达到峰值：1970年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为60%和56%，然而到1995、2001、2003三年均达到91%，其1970年在参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为56%，但到2003年时达到94%；1970年和1972年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均为58%，但到2007年和2008年均达到92%，其1968年在参议院的党派团结投票分为51%，但到1999年和2001年时均达到89%。^①国会中两党极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立法与政策制定的难度加大，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会共颁布立法828部，60年代为739部，70年代为618部，80年代为625部，90年代为472部，^②2000-2008年共颁布立法460部，^③立法数的减少从侧面反映出国会中两党极化现象的加强。

（二）公众党派意识形态趋向及其依据

就目前情况看，公众整体的党派意识形态处于温和区间但区域范围内的同质性在加强，总统大选中州党派倾向的红蓝分裂以及国会选举中竞争性选区数量的减少便是最好的佐证。

第一，公众整体的党派意识形态处于温和区间。根据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于1972—2010年期间关于公众党派意识形态自我界定的统计数据，自认为是温和派、轻微趋向自由主义者、轻微趋向保守主义者的选民比例变化微小，此三类选民比例之和一直占50%以上（表1）。同时，共和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自由派立场者占有较大比例，民主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保守派立场者占一半以上比例，而独立选民中持温和派立场者占主导地位。2000、2004、2008和2012年4个大选年中，共和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自由派立场者的比例之和分别为36%、34%、31%、31%，民主党选民阵营中持温和与保守派立场者的比例之和分别为65%、66%、62%、58%，而独

^①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December 15, 2008, pp. 3333-3334.

^② Norman Ornstein, *Vital Statistics on Congress: 2001-2002*, Washington: AEI Press, 2002, pp.146-149.

^③ "List of United States Federal Legislation, 2001-Present,"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nited_States_federal_legislation,_2001-present.

立选民阵营中持温和派立场者比例分别为 45%、46%、45% 和 43%。^① 此外，公众中自认为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比例略有下降，而独立选民比例显著上升。从 1990 年到 2012 年（101—112 届国会期间），选民中自认为是共和党人的比例从 31% 下降到 24%，民主党人比例从 33% 降到 32%，而独立选民从 29% 上升到 38%。

表 1：美国选民党派意识形态区间分布表

比 例	极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轻微自由主义	温和派立场	轻微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	极端保守主义
2010 年	3.9%	13.1%	11.8%	37.8%	13.4%	16%	4.1%
1972-2010 年平均值	2.7%	11.6%	13%	38.7%	16.1%	14.8%	3.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GSS website, <http://www3.norc.org/gss+website/>。

第二，公众区域性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在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州党派倾向的红蓝分裂在加剧。1992—2012 年的 6 次大选中，共和党胜率差值超过 20% 的州分别为 0、1、11、13、6 和 11 个，历次大选中最高胜率差值分别为 18.7%、21.1%、40.5%、45.5%、32%、48.1%；民主党胜率差值超过 20% 的州分别为 1、7、4、4、11 和 8 个，历次大选中最高胜率差值分别为 18.5%、33.4%、29.1%、25.1%、45.2%、42.7%；同时，历次大选中摇摆州数量呈减少趋势，分别为 9、8、7、7、5 和 4 个。^② 二是国会选区的同质化加强。在政治地理红蓝分裂程度加剧的情况下，单个州内的国会选区也因党派利益诉求基础上的重新划分，导致公众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化不断加强，安全议席不断增多，竞争性国会选区不断减少。在安全议席方面，共和党在职议员的安全议席平均比例由 1946—1964 年期间的 43.6% 上升到 1966

^① Andrew Kohut, "Trends in American Values:1987-2012,"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4, 2012, <http://www.people-press.org/files/legacy-pdf/06-04-12%20Values%20Release.pdf>.

^② 根据 1992-1996 年美国大选统计数据分析计算的结果，原始统计数据来源：“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elections.php>。

—2000年期间的71.3%。而在相应的时间段内，民主党在职议员的安全议席平均比例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在72.5%的基础上略升到73.2%；^①同时，公众区域性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化不仅表现在两党高比例的安全议席数，还表现在安全议席的持续性方面，如加州的第8国会选区自1949年以来一直为民主党控制，田纳西州的第2国会选区自1859年以来一直由共和党控制；在竞争性选区方面，2002—2008年期间的4次国会选举中，众议院435个议席中平均竞选胜率差值在20%以内的只有50个，平均竞选胜率差值在10%以内的只有9个。^②如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拥有54个众议院席位的加州只有第11选区发生党派互换，^③而且该选区是由原先的共和党控制转为民主党控制，这反过来进一步推进了加州公众的党派意识形态向民主党靠拢。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生成机制

公众党派意识形态变迁与政治精英极化意识形态产生的逻辑关联点是美国选举体制赖以存在的政治地理的区块划分，在总统大选中表现为以州为基本单位的选举人团体制，在国会选举中表现为以选区为基本单位的议席竞争体制。以此为基础，政党和公众作为双向施动者共同构建了美国政治极化的三个基础性生成机制和两个反向生成机制。

（一）美国政治极化的基础性生成机制

第一，持续性的选民联盟重组与党派选择。选民联盟重组是指以关键性选举为依托的两党选民基础构成的根本性改变，即两党选民基础的构成群体中，特定群体整体性地放弃支持原有政党而转向支持另外一个政党；党派选择是指选民基于利益诉求基础上的、根据自身长期形成的党派认知而作出的党派取向选择。选民联盟重组与党派选择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在

^① 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24页。

^② Morris P. Fiorina and Samuel J. Abram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2008, pp. 563-588.

^③ Robert S. Erikson, Gerald C. Wright and John P. McIver, “Public Opinion in the States: A Quarter Century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Jeffrey E. Cohen ed., *Public Opinion in State Politics*, 2006,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9-253.

于两者都指特定选民群体在特定阶段所持党派立场的整体性改变，不同点在于党派选择也指特定选民群体对某一政党在支持程度上的加强，而前者不包含此内容。^①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于选民联盟重组与党派选择机制上的两党选民基础结构的持续性变化，是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原始性动力。

1932年的关键性选举使非裔美国人的党派取向发生整体性的变化，由原先支持共和党转为支持民主党，此后民主党构成了以南方白人、知识分子、工会、天主教徒、犹太人、西部居民、非裔美国人为核心的新政选民联盟，美国南部自此成为民主党的稳固地盘，其在国会中的议席占比也由1928年的37.7%上升到1930年的49.6%再到1932年的71.9%。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不满民主党倡导的民权运动及相关政策，南方白人开始脱离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这标志着新政选民联盟开始解体，也导致两党的选民基础结构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自由派、中小企业、劳工、少数族裔、妇女和老幼等群体对民主党的支持程度不断加强^②，而保守派、大企业、大财团、宗教界、比较守旧的农村及持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白人等群体对共和党的支持程度不断加强。^③新政选民联盟解体对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生有着重大影响，此后共和党在选举政治中便牢牢控制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州及州下所辖的大部分国会选区，而民主党则牢牢控制美国东北部和西部沿海的所有州及州下所辖的大部分国会选区。

第二，人口选择性迁徙与选民党派意识形态重构。美国人口根据社会结构特征而进行的选择性迁徙，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选民党派意识形态重构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生成机制。选择性迁徙的直接结果是特定区域内人口在社会结构方面的趋同化，趋同化的人口社会结构更容易产生相似的党派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人口选择性迁徙与选民党派意识形态重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其一，以就业为导向的内陆到沿海迁徙与党派意识形态重构。该部分迁徙人群主要为受过良好教育并具备专业技能的年轻一代选民，迁徙方

^① 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S. Electorat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0, No. 3, 1998, pp. 634-652.

^② 何晓跃：《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在总统大选中的行为特征和影响力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页。

^③ Lyle L. Saunders and Alan I. Abramowitz,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and Active Partisan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2, No. 2, 2004, pp. 285-309.

向倾向从传统工业城市（主要集中在南部与中西部地区）到新兴都市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区域），该部分选民群体拥有良好的文化多样性包容力与对少数民族的容忍度，其在党派意识形态上趋近自由派立场，在党派选择中倾向民主党。其二，以族群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南北迁徙与党派意识形态重构。该部分迁徙人群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南部迁往东北部的非西裔白人，该部分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往往比南方其他白人选民更靠拢自由派立场，对少数族裔更具包容力；另一部分是从东北部迁往南部的非西裔白人，该部分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往往比北部其他选民更保守，持传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对少数族裔的包容度并不高。以族群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南北迁徙导致南部居民的保守倾向进一步增强，其对党派意识形态同质化的影响要高于东北部。其三，以社区同质化为导向的选择性迁徙与党派取向重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社区的同质化程度亦不断加重，这表现为居民愿意选择与在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和从事的职业等方面和自己相近的人居住在一起。社区关系在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孩童到成人，所接触到的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宗教组织对于政治行为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中高收入群体所在社区的政治生态系统能给其成员塑造一种观念，即政府对他所在群体的政治意愿给予关注并能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相反，在低收入群体所在的社区中，诸如犯罪、社区秩序和精神秩序的紊乱、健康医疗问题、高昂的房贷利率、失业、过早地辍学、家庭的破裂及居住地点的不稳定等各方面的负面因素，使得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及以后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容易形成消极的观念。^① 社区同质化的加强势必使同一社区内居民的党派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相互靠近。

第三，选民代际更换与区域性党派取向趋同。选民代际更换是指年轻选民群体代替年老选民群体的自然延续性过程，由于不同代际选民政治社会化的整体环境有着很大不同，那么其形成的党派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亦有很大差别。选民代际更换会加强政治极化的基础是新一代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

^① Robert J. Sampson, "How Do Communities Undergird or Undermine Human Development? Relevant Contexts and Social Mechanisms," in Alan Booth and Ann C. Crouter eds., *Does it Take a Village? Community Effects 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Families*,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2001, pp. 3-30.

极易形成整体性倾向，这在新政选民联盟形成时就有过明显体现。在新政选民联盟形成之前，1905年前出生的白人选民与1910年后出生的白人选民是当时的两个主要代际选民群体，后者由于不满共和党在大萧条中的作为表现，在1932年大选中整体脱离共和党转向支持民主党，这也是此后民主党能稳固南方各州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①

当前美国“千禧一代”（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是指出生于1978年到2000年期间的美国人）已成为选民的主力之一，2008年该群体中合法选民占全体合法选民的23%，预计到2020年该比例会上升到39%。^②由于美国当前极化的政治地理始于20世纪60年代，千禧一代政治社会化的环境大多处于有明显政治立场倾向的州和国会选区中，同时由于千禧一代选民并未经历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选民联盟发生重大重组的选举政治环境，其党派意识形态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生后的成长环境，这就造成一种显而易见的结果：在共和党所控制的州和国会选区内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选民往往支持共和党，其党派意识形态趋向保守派；而在民主党所控制的州和国会选区内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选民往往支持民主党，其党派意识形态趋向自由派。以加州为例，虽然自新政选民联盟解体之后，该州一直是最稳固的蓝色州之一，其选民党派意识形态趋向自由派立场。但在1977年，该州支持同性婚姻的选民比例不到30%，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2%，到2008年则上升到51%。该州支持同性婚姻的选民比例大幅度上升的原因之一是州内选民的代际更换，千禧一代选民较之于老年选民在党派意识形态上更加趋近自由派立场，2008年时州内18—29岁之间选民中赞成同性婚姻的占68%，反对的占25%，较之于年轻选民，65岁以上选民中赞成同性婚姻的比例为55%，反对的比例为35%。^③因而，在选民出现代际更换的情况下，特定州和国会选区内选民的党派取向必将进一步趋同。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反向生成机制

^① Saunders and Abramowitz,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and Active Partisan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pp. 285-309.

^② Ruy Teixeira, *Demographic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rties*, Washington: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0, p. 19.

^③ 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Is Polarization a My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0, No. 2, April 2008, pp. 542-555.

第一，政党竞选体制运作重点变化对选民传统党派意识形态的反加强。在现代美国竞选体制中，理性的竞选候选人有两个关注重点，一个是竞选资金的来源，另一个是竞选策略的运用。在竞选资金的来源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党的控制权从政党领导人手中慢慢转到政治活动委员会和利益集团手中，特别是能为竞选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的群体。同时，政党活动者常常联合与候选人立场不一致的议员给候选人施压，这导致候选人为了巩固该类群体的支持，在相关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政治立场以取悦此类群体选民。如2008年的政党提名竞争中，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共和党党内活动者及院外活动者的影响下，不得不放弃早期持有的与前总统里根立场一致的综合性移民改革方案，采取了对非法移民而言条件苛刻的改革方案。在这一竞选环境下，竞选候选人在政策宣传上难以对本党以往的政策重点进行较大改变与突破，由于新的政策不能惠及更广泛的选民群体，候选人除了继续赢得传统拥护本党的利益集团、特定选民群体的支持外，不可能使其他选民群体发生党派立场的改变，这就反过来加强了选民党派意识形态的稳固性。

在竞选策略方面，由于两党在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中都牢牢地控制着一些州和国会选区，两党都视在一些州争取选民的支持是浪费资源的行为，在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中通常放弃反对党牢牢控制的州和国会选区。2012 大选中，民主党放弃南部和中西部的多个州，共和党也放弃西部沿海和东北部沿海的多个州。由于缺乏党派竞争，相应州与国会选区的选民根本不可能改变党派立场，这也反过来造成了美国政治地理红蓝分裂的加剧。

第二，不公正重划选区对选民党派选择的干扰和压制。不公正重划选区是指特定州的在职国会议员为维持或加强自身所属党派的优势，人为地对新增选区的地理形状进行强制限定，以达到本党控制新增选区的效果。不公正重划选区一方面造成特定国会选区内选民党派意识形态同质化的增强，另一方面造成特定州客观真实的选民党派取向不能得到反映。以得克萨斯州为例，该州目前共有38个国会选区，其中共和党控制26个，民主党控制12个，民主党所控制国会选区数量比例为31.6%，但这与该州真实的选民党派取向并不相符。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后，得州非西裔白人占该州总人口的45.3%，西裔占37.6%，非裔占11.8%，亚裔占3.8%，其他族裔占1.5%，少数族裔人口

占该州总人口的 54.7%。^① 如果仅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分析, 得州因有过半少数民族裔人口的存在, 而少数民族裔目前是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基础之一, 其党派取向若得到真实反映的话, 那么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选区数量应多于目前实际拥有的数目。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 是因为得州共和党在职议员利用其在州内立法机构的党派优势, 绕过《选举权法》重新划分选区而巩固自身的选区优势。

三、美国政治极化的表征层次矛盾与逻辑关联

政治精英和公众作为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行为主体, 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表征矛盾, 即美国公众的整体党派意识形态并不存在极化, 两党的政治极化是如何产生并得以延续的? 根据“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y), 在两党体制的政治竞选中, 候选人若要赢得选举, 须获得大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 也就是其理念与政策须满足大部分中间选民的偏好。按照该理论的表述, 未极化的选民基础不可能通过竞选体制产生在理念与政策方面持极化立场的民意代表, 这与美国选举政治的实际并不相符, 这就要求厘清美国政治极化中政治精英与公众之间的逻辑关联。

(一) 美国政治极化中政治精英与公众的逻辑关联

目前关于美国政治精英与普通选民之间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出自美国政治学界, 相关研究认为: 美国两党极化政治生成的原始动力在于增强党派影响力, 政治极化得以延续与强化, 依赖于美国以州和国会选区为地理空间单位的选举体制, 这也是美国政治极化行为主体层次间的逻辑关联点。对于如何增强党派影响力, “有限制的政党政府”理论(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 Theory)认为, 政党影响力的强弱依赖于党内成员意识形态的同质化及在立法与政策制定方面的立场一致化程度。就美国政治精英来讲, 两党内部的政治极化现象一旦形成, 共和党与民主党各自内部的意识形态将分别更趋极端, 两党在选举、立法和政策制定各环节中以党派划线的程度将不断强化并得以持续。^② 对于政治极化得以延续与加强的内在机理,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① “Demographics of Texas,”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Texas.

^② Jason M. Roberts, “Minority Rights and Majority Power: Conditional Party Government and

第一，在两党能取得力量均衡且在两党都有可能胜出的竞选体制中，共和党或民主党赢得选举的关键在于满足党派意识形态较为极化的较少部分选民的政策偏好，以赢取该部分选民的高比例支持，而不在于满足党派意识形态较温和的大部分中间选民的政策偏好。^① 特别是对于共和党而言，维系和巩固福音派和基要派^② 等虔诚宗教信仰者以及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等选民群体的支持，是其候选人在总统选举和国会竞选中胜出的重要因素。该选民群体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这成为共和党议员党派意识形态日趋偏右的重要原因，也为两党政治极化的加剧提供了选民基础。

第二，选民通过长期的党派选择（Party Sorting）过程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立场和具有区域倾向性的党派意识形态，随着美国政治地理红蓝分裂的加剧与国会安全议席的增加，两党所控制选区内选民党派意识形态的同质化程度进一步增强。在此环境下，在相应的州与国会选区内，两党候选人取胜的关键在于赢得现有支持选民的继续支持而不必取悦温和派的立场选民。因此，持极端立场的候选人反而容易赢得压倒性优势胜出，而持中间与温和派立场的候选人反而被选民抛弃，这就从选举体制的具体运作方面指出了美国政治极化得以产生并能延续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③

第三，由于美国选举体制下竞选过程的持续时间冗长，这会极大增加选民的参与成本（时间、精力、金钱）等，参与成本的持续增加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较大部分中间选民在竞选的最后阶段放弃参与投票，这使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政治立场的选民比例大大增加；二是最后去参与投票的中间选民的政治立场发生分化，该群体中的一部分选民趋向自由派或保守派政治立场。^④ 这就从参与成本角度说明了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可能性。

the Motion to Recommit in the House,”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May 2005, pp. 219-233.

^① Samuel Hunting,, “A Revised Theory of American Party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4, 1950, pp. 669-677.

^② “基督新教”是由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会和基督徒形成的一系列新宗派的统称，简称新教。“福音派”和“基要派”是基督新教的两个派别分支，福音派与基要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基要派恪守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福音派也恪守传统教义，但比基要派更愿听取不同方面的观点。

^③ Thomas M. Carsey and Geoffrey C. Layman, “Changing Sides or Changing Mind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Policy Preference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pp. 464-477.

^④ Morris P. Fiorina and Samuel J. Abram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二）美国政治极化持续存在的潜在动摇因素

在美国政治极化的生成机制中，政党和公众都是施动者，两者共同维系了政治极化的发生与发展。政治极化能否长期持续决定于双向互动机制能否延续。就短期来看，政治精英是美国政治极化生成机制的主要驱动者，但从长期来看，选民是该机制的主要驱动者。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美国政治极化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两党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特别是国会运作中）能够取得循环性的力量均衡，其中最重要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席位由两党轮流控制，而这种力量均衡产生的基础是两党均能维系特定州和国会选区的选民忠诚。就目前来讲，以下因素的存在可能打破美国政治极化的持续存在：

一是美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其中最重要的趋势是少数族裔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这势必造成美国未来的选民结构将出现重大调整。特别是由于美国南部地区拥有大量少数族裔人口且该地区的人口增长主要由少数族裔拉动，那么未来南部相关的州和国会选区或许会转向支持民主党，如此两党在政治运作中取得循环性力量均衡的基础将被打破，美国政治极化得以存在的延续机制也将不复存在。就全国地域分布来说，少数族裔人口分布最集中的是美国南部，其次是美国西部。1990年西裔在西部和南部的分布比例分别为45.2%和30.3%，2000年分别为43.5%和32.8%；1990年亚裔在西部和南部的分布比例分别为55.7%和15.4%，2000年分别为48.8%和18.8%；^①1990年非裔在南部、东北部和中西部的比例依次为52.8%、18.7%和19.1%，2000年分别为54.8%、17.6%和18.8%。^②近年来西裔、非裔和亚裔在西部的分布比例都有所降低，而在南部都有所上升。由于一个州在众议院的议席数是由该州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决定，这个比例越高，该州拥有的众议院席位就越多，选举人票数也越多。西裔、非裔和亚裔的人口增长使得少数族裔较为集中的南部和西部各州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这就意味着南部和西部各州众议院席位和选举人票数的增加。^③由于少数族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2008, pp. 563-588.

^① U.S. Census Bureau, *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1*, No. 31, p. 31; *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1*, No. 22, p. 24.

^② *Ibid.*

^③ 何晓跃：《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在总统大选中的行为特征和影响力研究》，第25页。

裔是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基础之一，共和党在短期内能利用选区重划的方式对少数族裔的党派选择进行压制，但从长远看是不能持续的。

二是美国限制选举政治献金的相关立法进展。限制政治献金的最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利益集团对于选举政治的影响力，由于大公司、大财团、军工复合体是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放开选举献金限制有利于共和党，反之则有利于民主党。同时，由于利益集团是导致共和党政治精英党派意识形态日趋保守的重要原因，因而美国如果在限制选举政治献金的立法方面取得进展，将去除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美国政府关于限制政治献金的立法始于1907年，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推动国会通过了《提尔曼法》，该法案禁止公司出于政治目的提供竞选资金。此后，相关法案陆续出台以完善和规范选举筹款和开支的使用。2002年，国会通过《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该法案对“软钱”政治献金的使用作了严格限制。但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一项有关政治献金的法律裁定，废除了大公司、工会、政治团体和非营利团体在总统选举以及国会议员选举中对候选人所提供竞选经费的上限，此举为利益集团积极介入竞选活动重新打开了方便之门。相比于民主党，共和党更能享有此项法律裁定带来的裨益。美国能否通过立法手段对政治献金进行有效限制，是影响美国政治极化能否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

四、美国政治极化的发展方向分析

从政党和公众互动的实际情况看，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公共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可选择性、社会运动的冲击、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等因素，使得美国政治极化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一）经济不平等加剧

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生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关系密切，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收入和财富正聚集在有政治影响力的阶层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这在财富分配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占人口总数1%的最富有群体占国民收入的16.9%，占国民总财富的34.3%；与此相对应的是，占总人口90%的群体占国民收入的57.5%，只占国民财富的

28.7%。^① 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极化的关联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从公众层面讲，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在党派取向上本是泾渭分明，前者多属于共和党阵营，后者多属于民主党阵营。由于民主党主要代表自由派、中小企业、劳工、少数族裔、妇女和老幼等群体的选民利益，而共和党主要代表保守派、大企业、大财团、宗教界和比较守旧的农村等群体的选民利益，这使民主党政府比共和党政府更能响应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税收等方面的利益诉求。^② 在政治极化加深的背景下，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党派立场发生整体性改变的情况比以前变得更不可能。从政党层面讲，政策制定者和竞选人在政党立场与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对中高收入群体的意愿更加重视，对低收入群体意愿的关注度不断下降。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尽管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在扩大，但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这种经济不平等及保护低收入家庭免受经济衰退的侵蚀。议员在制定政策时表现出来的立场经常性地与议员所在选区的大众利益脱钩，而更倾向于遵从所在政党的立场并按照委托人的意愿来投票。政府在决策时更多地考虑高收入群体、商业利益集团和特定区域的利益，而对低收入群体的意愿却考虑得越来越少。共和党愈益转向右翼立场，是因为这种立场的受益者能够利用其经济权力为政治家提供竞选资金和某种安全网。显然，基于经济利益诉求基础上的选民党派选择和政党的政策选择，为政治极化的持续存在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公共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可选择性

公共媒介主体的增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信息的可选择性，是当代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电视、报纸数量很少，而且在相关规定的制约下，媒体对于事件的报道基本上符合客观事实，具有主观性意见的评论相对较少。随着电视、报纸数量的增加，新闻报道也慢慢变得具有主观性，以此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固了美国公众的党派偏好。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普及，为极端政治立

^① Lawrence Mishel, Jared Bernstein, and Sylvia Allegretto,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2006/2007*, Ithaca, NY: ILR Press, 2007, p.10.

^② 何晓跃：《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大选政治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5期，第71页。

场的蔓延和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用。一方面，像谷歌、脸谱等网站通过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过滤，根据用户的浏览偏好提供相应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给消费者提供了过滤信息的便利，网上信息的高度可选择余地，使得许多互联网用户只寻找自己所关心的信息，与政治偏好相近的人进行交流，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的加强使得极端政治立场容易形成并得到强化。^①

（三）全球化浪潮下社会运动的冲击

典型案例是 2009 年的茶党运动和 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运动反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医疗改革方案，主张政府要缩小规模、缩减开支、降低税收、弱化监管；“占领华尔街”的意图是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可归于民粹主义运动，两者是左翼和右翼的关系，其斗争反映了美国历史上“反对大公司还是反对大政府”的传统争论。“茶党”和历史上的其他右翼运动一样，主张反对“大政府”，强调政府权力的膨胀必然会降低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活力，而左翼则主张反对“大公司”，推动政府采取一些限制垄断、保障民权的措施，例如 20 世纪初的“反托拉斯法”、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等等，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化浪潮下的社会运动扩大了公众的党派分野。

（四）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为其继续右转提供了选举基础

美国国会选区在 2010 年人口普查后进行重新划分，由于选举人票数增加的州多为倾向支持共和党的州，而选举人票减少的州多为倾向支持民主党的州，且共和党可以单边决定的选区数量远超民主党单边可以决定的选区数量，因而共和党在此次选区重划中获得优势地位。同时，共和党为了扩大选区优势，采取了一些肆意妄为的措施。目前，绝大多数州都是由州议会来负责选区重划，为了维护选区划分的公正性和增加透明度，有些州成立了无党派倾向性的独立选区划分委员会，并把选区重划的任务从原来的州议会选区重划委员会转交给该委员会。然而亚利桑那州在该州州长推动下，共和党人成功

^① 杨悦：《美国众议院选区重划：2012 年奥巴马连任的拦路虎？》，载《当代世界》2012 年第 2 期，第 66 页。

地弹劾了该州独立选区划分委员会主席。由于美国选举体制以州和选区作为基本单位是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地理基础，共和党安全选区的增加无疑给政治极化的继续存在添加了砝码。^①

除以上四个因素外，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短时间内难以消除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选举政治的表面民主与实质专制之间的关系。即选民只在选举投票时有民主，在选举之后便无法规制官员的投票行为，使得极化无法得到有效遏制；议员只需要在备选阶段使选民相信其声称的理念，而无须在当选后实际兑现其承诺。

五、美国政治极化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美国政治极化对处理中美关系有三点重要启示：

启示一：处理中美关系应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特点。在政党政治的极化程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总统、两党、国会以及社会舆论基于利益多元化、权利争夺、党派偏见等因素，对于中美关系会表达出不同态度和声音，因而中国在思考美国如何制定对华政策以及中国在制定对美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特点，对于美国政府、国会议员或主流媒体基于国内政治利益需要而发出的反华或有悖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言论应理性看待。

启示二：应加强与美国民间的交流。就美国国内的角度而言，中美关系的维系与发展须处理好两大维度：一个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这条线；二是中国政府、民间与美国民间这条线，包括与美国公众、主流媒体及一些有影响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目前美国公众的党派意识形态在整体上不存在极化现象，大部分公众还是以客观态度评价中美关系的。根据盖洛普的调查数据，美国成年人和意见领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差别并不大，认为“紧密的中美关系”对美国有益的分别为 81%和 88%，认为“中美关系是友好的”分别为 63%和 69%，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美国有益”的分别为 45%和 61%。^②

^① 同上，第 65-66 页。

^② 数据来源于盖洛普（GALLUP）官方网站，参见“Americans, Opinion Leaders See U.S.-China Ties as Friendly,” Gallup, February 14, 2012, <http://www.gallup.com/poll/152618/Americans-Opinion-Leaders-China-Ties-Friendly.aspx>; “Americans See Benefits of Close U.S.-China Relations”, Gallup, April 17, 2012, <http://www.gallup.com/poll/153911/Americans->

在当前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下，增强两国民众的交流对改善美国对华的战略认知、增强中美互信是大有裨益的。

启示三：须对新保守主义势力^①重新逆转做好心理准备。美国政治极化的持续存在给新保守主义势力的逆转提供了可能。新保守主义势力对于国际合作、国际法、军备控制与裁军持消极态度，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倚重硬实力实现国家利益，尤为热衷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虽然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活动空间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得到一定的抑制，但新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国内仍具有深厚的基础。一方面，奥巴马团队内仍有不少与新保守主义势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担任要职，只是其表现方式比以前变得更加隐蔽；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公司和大财团、军工复合体、宗教保守势力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支持者，这三股势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一直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在国内经济不景气、政党极化程度加深、区域范围内选民党派意识的同质化程度加强的情况下，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活动空间获得巨大转圜，典型案例是小布什在2004年大选中放弃了争取中间选民的竞选策略，直接依靠宗教保守派赢得选举。同时，新保守主义势力在传统观念上主张“遏制”中国，加上其负面的国际安全理念，如果新保守主义势力实现逆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不利的。

[收稿日期：2013-07-23]

[修回日期：2013-12-25]

[责任编辑：张 春]

Benefits-Close-China-Relations.aspx。

^① 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典型代表是以里根总统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其对美国优越论和民主的力量以及选举、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等美国的价值观笃信不疑，主张使用硬（军事）实力来促进这些价值观，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作用持怀疑态度。

试析埃及科普特人战后 政治地位的演变原因*

潘蔚娟

【内容提要】作为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群体，埃及科普特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却鲜为人知。70 年代后，埃及国内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接连不断的冲突才使科普特人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从埃及总统对宗教和科普特人的态度、政府法律条规对科普特人的影响、科普特基督教和科普特人对埃及政府的态度等三方面，梳理了埃及科普特人在战后政治地位的演变过程，认为埃总统发挥宗教职能的不同方式、埃及人共同的国民政治认同尚未真正形成以及科普特人缺乏政治参与热情是其政治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展望未来，尽管形势仍扑朔迷离，但革命后的埃及的伊斯兰化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有强化趋势，而埃及宪法的世俗化又将直接影响到科普特人政治地位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因此，科普特人政治地位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问题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关键词】埃及 科普特人 政治地位 宗教矛盾 国民认同

【作者简介】潘蔚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B928.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121-15

* 感谢《国际展望》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作为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群体，埃及科普特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却鲜为人知。70 年代后，埃及国内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接连不断的冲突才使科普特人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占埃及人口极少数的科普特人为何成为埃及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攻击目标？身为少数群体，科普特人为何不甘示弱，以不同形式进行对抗？从科普特人问题中，又能看出埃及哪些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端？本文通过梳理埃及科普特人在战后政治地位的演变历程，试图找出科普特人政治地位变化的原因并展望其未来发展，以充实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埃及科普特人及其战前的政治地位

“科普特”（Copt）一词源于希腊语“Αιγυπτος”，意为“埃及的居民”。科普特人是在公元 1 世纪皈依基督教的古埃及人后裔，然而随着公元 641 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改奉伊斯兰教。现在的“科普特人”专指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目前，在埃及的科普特人是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群体，其人口占埃及 8000 多万人口的 9%—20%。^①从公元 7 世纪到 19 世纪初，科普特人长期受穆斯林统治，被称为“被保护民”。^②尽管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但科普特人仍成功避免了穆斯林统治者对其群体内部事务的过分干涉。

19 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将法国侵略者赶出埃及，夺取了国家政权。面对内忧外患，阿里及其继任者打破了原有的宗教界限，进行了一系列的世

^① 科普特人占埃及总人口的比例一向存有争议。埃及政府一般对外宣称为 6% 左右，科普特教会则认为至少为 18%。其他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估计为 9%—20%。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 2013 年《世界概览》估计为 9%，美国科普特人协会估计为 12%—15%，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估计为 10%—20%。Elizabeth Harrington, “Number of Coptic Christians in Egypt is Far Less than Media Estimates, Report Says,” *CBS News*, December 19, 2011, <http://cnsnews.com/news/article/number-coptic-christians-egypt-far-less-media-estimates-report-says>; *The World Factbook 2013-14*,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13,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g.html>; Khairi Abaza and Mark Nakhla, “The Copts and Their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Egypt,” *Policy Watch*, Oct. 25, 2005,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copts-and-their-political-implications-in-egypt>.

^② “被保护民”（Ahi al-dhimma 或 Dhimmis）是指受穆斯林统治的非穆斯林。这些非穆斯林一方面受到国家的保护，在宗教、司法和教育等领域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又被视为“二等臣民”，要受到伊斯兰教教法的约束，而且还在宗教和社会生活领域受到某些限制。

俗化改革。在社会各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科普特人开始从边缘步入中心。^① 1882年，英国军队占领埃及，科普特人积极投身奥拉比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试图融入埃及社会，谋求与穆斯林的同等地位。1919年反英大起义后，科普特人的民族主义热情更是空前高涨，许多人参加了“华夫脱”运动。随着运动的成功，科普特人逐渐处于“华夫脱”党^②的领导地位，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广泛地参与埃及的政治生活。然而，随着他们呼吁建立政府的要求日益高涨，穆斯林对他们的猜疑也逐步加深。此外，于1928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不断显现出其伊斯兰色彩，这也使科普特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科普特人发现，踊跃参与反英斗争并没有根本改善自身的政治处境，反而引起了穆斯林的怀疑、反感和歧视。于是，一些科普特人试图通过改革科普特教会改变自身现状。

二、埃及科普特人战后政治地位的演变

二战结束后，埃及面临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的局面，王室和贵族继续垄断国家的权利和财富，许多政党无视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一些下层政治组织纷纷兴起，特别是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穆兄会得到了空前壮大，严重威胁法鲁克王朝的统治地位。1948年，国王法鲁克取缔了穆兄会，并于次年派人刺杀了其创始人哈桑·班纳，使得长期受打压的“华夫脱”党得以在1950年重新执政。科普特人也于1952年趁势组建了史上首个政党“科普特民族党”，试图重新凝聚埃及科普特群体的力量，提升自身地位。然而，“七月革命”却使这个愿望过早破灭。

（一）纳赛尔时期（1952—1970年）：滑向边缘

1952年7月，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国王法鲁克宣

^① 特别是1856年颁布的《哈马尤尼法令》（The Hamayouni Decree）在原则上赋予了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同等的政治和权利。

^② 扎格卢勒1923年9月建立华夫脱党。该党要求埃及实行自治，成立立宪政府，给予公民权利，由埃及人管理苏丹和苏伊士运河。1924年大选后，华夫脱党于同年1月28日组织政府。此后，华夫脱党政府与国王长期发生冲突。1952年埃及废除君主制度，1954年埃及解散一切政党。1978年2月萨达特总统实行多党制度，重新建立华夫脱党。但在同年6月该党自行解散。

布退位。次年6月，埃及阿拉伯共和国成立，科普特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被边缘化。

1. 纳赛尔对宗教和科普特人的态度

纳赛尔是埃及近代史上世俗化倾向最强的统治者之一。然而，在发动“七月革命”之前，他所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就有意接近穆兄会，想借助这支宗教色彩浓重的力量夺取政权。在当政后，纳赛尔也曾表示过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因之一就是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而他始终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此外，他还声称，社会主义源于伊斯兰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于伊斯兰教初期。^① 尽管如此，纳赛尔并不允许伊斯兰教干预政治，并且还用国家政权控制伊斯兰教。^② 在穆兄会有明显政治化倾向时，他曾于1954年和1956年两次将其镇压。^③

虽然纳赛尔在1964年临时宪法中规定埃及的国教是伊斯兰教，同时声称自己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本人在主观上并不歧视科普特人。他还利用总统特权，在每届议会中任命7—10名科普特议员，在每届政府中指定1名科普特人担任部长。尽管如此，科普特人在议员中的比例还是微乎其微，在1964—1968年那届议会中，只有9名科普特议员，其中8名由总统任命；在1968—1971年那届议会中，也仅有9名科普特议员，其中7名由总统任命。^④

2. 纳赛尔政府的法律条规对科普特人的影响

1952年和1961年，纳赛尔政府先后颁布了农业改革和国有化相关法律，没收了私人土地，并将私人公司收为国有。在革命之前，科普特人中有许多地主和商人，他们拥有国家财富的一半还多，确保科普特人在政治领域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然而，在革命之后，科普特人相比穆斯林在经济实力方面遭受重创。他们丧失了大约75%的财产^⑤，从而也失去了相应的政治代表权。

此外，由于担心穆兄会成为潜在的政治对手，纳赛尔政府于1954年以涉

^① 杨灏成、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9、98页。

^② 纳赛尔在他执政时期没收了伊斯兰教的大批田产；监督伊斯兰教创办的学校及其制定的教学大纲；虽然发展爱资哈尔大学，但规定正副教长由政府任命；限定各清真寺在周五聚礼时讲演的内容等等。

^③ 哈全安：《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第28页。

^④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The Copts of Egypt*, January 1996, <http://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docid=469cbf8ed>.

^⑤ Ibid.

嫌暗杀为由，对其进行了镇压，并顺势取缔了一切政党和政治组织。“科普特民族党”和“华夫脱”党也被强行解散，科普特人由此失去了表达政治意愿的渠道。到1957年埃及进行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时，只有1名科普特人作为独立候选人进入议会。

3. 科普特基督教和科普特人对纳赛尔政府的态度

由于埃及科普特基督教牧首^①柯瑞洛斯六世（任期：1959—1971年）本人热衷于宗教事务，不关心政治，又与纳赛尔关系融洽，支持纳赛尔的内外政策，科普特人很难通过教会表达政治诉求。虽然科普特人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穆斯林，但在政府和国企部门的高层中，科普特人却屈指可数。

像其他埃及人一样，科普特人一开始也对“七月革命”持欢迎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自由军官组织”几乎成了穆斯林组织，因为在该组织中只有1名科普特人，而在其后来成立的“革命指导委员会”中更是没有科普特人。这就意味着科普特人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就被排斥在权力大门之外。在国内环境改善无望的情况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大批科普特中产阶级开始移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据统计，截至1977年，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的科普特人就多达8.5万人。^②大量人才的流失，更使得科普特人难以维护自身的政治权益。

由此可见，尽管埃及在纳赛尔时期奉行世俗主义，尽量维护科普特人在大多数领域的平等地位，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间很少有宗教纷争，但在革命后的国家政治权利和资源分配中，科普特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经济优势，再次降为“二等公民”，处于不利境地。

（二）萨达特时期（1970—1981年）：跌入低谷

1970年萨达特继任总统后，为了牵制纳赛尔主义分子和左派，树立个人威信，主动拉拢和利用伊斯兰势力，帮助复兴穆兄会，增加国家的伊斯兰色彩。在其执政时期，科普特人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限制和压力，还遭到穆斯林和极端分子的攻击，处境跌入低谷。

1. 萨达特对宗教和科普特人的态度

^① 埃及科普特基督教最高宗教首领在1964年修建圣马可教堂前被称为牧首（patriarch），之后改称“教皇”（pope），并沿用至今。

^②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萨达特在上台之初，就称自己是“信士总统”（The Believer President），提出要把埃及建设成有“科学和信仰”的国家，强调国家的宗教属性，并试图借助伊斯兰教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不仅称伊斯兰教是正统宗教，给予其种种特权，而且还让在纳赛尔时期流亡海外的穆兄会成员回国参与政治。1973年10月，萨达特发动“斋月战争”，埃及军队口诵《古兰经》，越过苏伊士运河，在阿拉伯的历史上第一次战胜了以色列。之后，萨达特的伊斯兰化色彩日益浓重，埃及国内的伊斯兰势力在政府的庇护下迅速扩张。1976年10月，穆兄会首次获得了参政议会的机会，开始扮演某种象征性的反对派角色。^①

此外，萨达特对破坏民族团结的错误言论和恶性事件漠不关心，甚至还对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纷争推波助澜。执政期间，他在政治中玩弄宗教的做法使埃及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宗教矛盾日益恶化，科普特人成了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直接攻击目标。例如，1981年6月，埃及就发生了最为严重的宗教冲突事件，造成至少18名科普特人死亡，112人受伤。虽然萨达特本人在执政后期有所醒悟，曾提出“从事伊斯兰教的人应该进清真寺，想从事政治的人应该进合适的机构”^②，但埃及政治弊端已积重难返。

2. 萨达特政府的法律条规对科普特人的影响

为了全面利用宗教势力，萨达特政府于1971年操控埃及国民议会在永久宪法中规定，“伊斯兰教法是立法的渊源之一”。这无疑与科普特人所尊崇的世俗政权和信仰平等相违背，引发了他们的强烈抗议。迫于埃及社会分化和宗教对立的压力，萨达特政府又于同年8月敦促议会通过了旨在保护信仰自由的《民族团结法》。

1977年7月，埃及伊斯兰教宗教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请求萨达特政府处决叛教者，在全国执行伊斯兰刑法。之后他们又声称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个请求，这无疑加剧了科普特人的恐慌，使他们成为直接的攻击目标。为此，教皇谢努达三世（任期：1971—2012）带领教徒进行了为期5天的绝食抗议活动。1980年3月21日，萨达特又建议就规定伊斯兰教法是立法基础等问题

^① 李佳、田宗会：《浅析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与当局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8页。

^② Mohammed Ayoob, *The Politics of Islamic Reasser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9, pp. 38-39.

进行全民公决。为了表示强烈抗议，谢努达三世于3月26日宣布不举行复活节庆祝活动，也不接受官员的例行祝贺。

3. 科普特基督教和科普特人对萨达特政府的态度

与前任教皇不同，谢努达三世主张科普特人应该积极行动，保卫自己的权益。他曾说：“倘若科普特人对政治持消极态度，教会应启发他们彻底摒弃消极立场。”^① 由于宗教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萨达特不仅在对议会的讲话中称自己是伊斯兰国家的总统，还斥责谢努达三世想成为科普特人的政治领袖。他披露，早在20世纪60年代，柯瑞洛斯六世就想在西方的支持下在上埃及建立一个科普特人的国家。^② 埃及史上首次出现教皇与总统进行公开对峙的局面，这无疑激化了本就紧张的宗教矛盾。

1980年8月萨达特访美期间，当地的科普特人不仅在主流媒体发表谴责性文章，还在他与里根会面时在白宫前游行示威，表达对埃及科普特人境遇的不满。次年9月，萨达特不但莫名其妙地下令逮捕了1536名“危险分子”，其中包括22名科普特人牧师和主教，而且还废黜了谢努达三世。此后，他又宣布要举行全民公投，解散所有宗教组织，禁止其发行报纸和期刊，并对修建教堂或清真寺进行审查。然而1个月后，他就遇刺身亡。

（三）穆巴拉克时期（1981—2011年）：大局未变

1981年10月，埃及军队高级将领穆巴拉克就任总统。在科普特问题上，他吸取了萨达特的教训，避免在穆斯林中挑起反科普特人的情绪，还采取了一些减少宗教矛盾和改善科普特人处境的措施，使科普特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有所上升，但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猖獗发展仍使科普特人深受其害。

1. 穆巴拉克对宗教和科普特人的态度

上台伊始，穆巴拉克就以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自居，在各种场合宣扬科普特人是埃及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友好关系。此外，他还坚决打击和镇压极端的伊斯兰组织，在科普特人聚集区加强警力。在穆巴拉克第一任期内，科普特人遇袭次数确实明显减少，但宗教冲突的根

^① 《埃及阿拉伯穆斯林和科普特人政治纷争》，中穆网，2011年1月2日，<http://www.2muslim.com/forum.php?extra=page%3D58&mod=viewthread&tid>。

^②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源远未消除。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穆兄会在埃及议会势力的逐渐壮大,其主流派别开始公开指责穆巴拉克政府压制民主、执政党一党独大和操纵选举。在政府和以穆兄会为首的反对派就敏感问题进行对话失败后,埃及国内的宗教矛盾迅速激化。此后,科普特人遇袭事件更是频频发生,其中最广为人所知的是:2000年发生在开罗柯什村的屠杀事件^①和2011年新年之夜的教堂爆炸事件^②。尽管政府对这些事件都进行了调查并将其归因于国内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报复行为,但是科普特人却认为,发生这些惨案的原因是政府的保护不力,埃及警方和军方对极端分子过于包庇和仁慈。

然而从总体上来讲,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科普特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例如,在1995年议会选举中科普特人未能当选,穆巴拉克随即任命了6名科普特人议员。此外,在穆巴拉克每一任期,一般都有2名科普特人担任部长,虽然不是重要部门,但这明显高于纳赛尔和萨达特时期。

2. 穆巴拉克政府的法律条规对科普特人的影响

在就任总统后,穆巴拉克出台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很多反对派政党相继重返政坛,穆兄会更是利用这一契机迅速壮大,埃及的政治多元格局日益凸显。在1984年举行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就有4名科普特人当选为议员,与萨达特时期相比已是很大的进步。此外,为纠正萨达特时期的政治压迫政策,埃及最高行政法院还于同年1月裁决同意组建“新华夫脱”党,这使得科普特人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然而,这种热情却是短暂的,“新华夫脱”党在成立不久后即宣布要与宿敌穆兄会和解,甚至还允许穆兄会成员入党,以便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更多席位。这使得很多笃信世俗主义的科普特人纷纷退党。

3. 科普特基督教和科普特人对穆巴拉克政府的态度

教皇谢努达三世在穆巴拉克刚上任时并没有要求复位,而是一直观望。

^① 2000年1月2日,在开罗附近的柯什村,1名科普特商贩和1名穆斯林顾客发生争执,最后导致埃及奉行原教旨主义的萨拉菲派对当地科普特人进行屠杀,造成21名科普特人死亡,41人受重伤,260间科普特人房屋和商铺被烧毁。

^② 2011年新年之夜,科普特信众们在亚历山大圣徒教堂刚结束庆贺新年的宗教仪式准备离开时,教堂外发生剧烈爆炸,造成23人死亡,97人受伤。

在被监禁的4年中，谢努达三世发现穆巴拉克致力于国家的民主化和世俗化，寻求缓和宗教关系，强调与西方加强交流。特别是在穆巴拉克以总统身份第一次访美之后，谢努达三世告诉自己的教徒，要用热爱和谦卑之心欢迎这位新上任的总统，并为他祈福。^① 最终，穆巴拉克在1985年签署了总统令，允许谢努达三世复位。在其后半生中，谢努达三世也一直与穆巴拉克保持良好的私人友谊，否认埃及存在宗派冲突，还在圣诞弥撒中为穆巴拉克政权祈福。

教皇复位后，科普特基督教在宗教事务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普特人每年修建的教堂数目逐步增加。^② 1996年，埃及政府归还了教会50年代被没收的500亩土地。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政府的这些举措满足了科普特人的部分要求，但他们仍认为自己在教育、就业和经济等领域没有获得和穆斯林同等的待遇。

在穆巴拉克时期，包括教皇在内的科普特人为了寻求保护，选择支持奉行世俗化的穆巴拉克政权。然而，随着埃及国内伊斯兰主义的兴起，穆巴拉克政府并未向他们提供有效的保护。科普特人成了埃及政治斗争和宗教矛盾的牺牲品，他们既没能得到作为埃及公民的平等权利，其生命和财产安全也时刻受到威胁。

（四）后穆巴拉克时期（2011年至今）：扑朔迷离

2010年底，从突尼斯开始的“茉莉花革命”迅速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这一以“民主”和“经济”为主题的“阿拉伯之春”在短期内先后让多位国家总统下台，埃及也未能幸免。2011年1月25日，埃及以开罗和亚历山大为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科普特人也尝试积极参加革命，借机改变自身的政治地位。

1. 埃及革命时期

革命伊始，科普特人对此次运动持观望态度，科普特教会还警告教徒不要参加游行活动，因为如果此次运动失败了，科普特人将是最大的受害者。运动开始的第三天，科普特人发现游行很成功，穆巴拉克政权不堪冲击，再加上他们也希望革命能够带来一个更加民主和世俗化的埃及，所以包括牧师

^①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② 特别是在1998年，当年获准建造的教堂数量达到237个。之后，再没有出现科普特人申请修建教堂被拒的情况。

和主教在内的科普特人就积极参与了运动。^① 教皇谢努达三世还在 2 月发表了声明,称赞在此次革命中作出牺牲的民众和军队。^② 然而,在穆巴拉克倒台两周以后,科普特人的恐惧和愤怒就替代了原有的热情和希望。多座教堂遭到袭击和焚烧,革命中的民族团结很快被愈演愈烈的宗教冲突消解。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之后,科普特人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党,如埃及电信巨头那古布·萨维里斯建立的“自由埃及人党”和美国科普特人协会主席迈克尔·穆尼尔建立的“哈雅党”。但由于建党仓促,之前没有积累政治资本,这些党派虽然参加了议会选举,却根本无力与其他大党抗衡。科普特人很快发现具有宗教背景的政党逐步控制了埃及政局,^③ 而教皇谢努达三世则在 5 月穆兄会成员、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和穆巴拉克任命的前总理沙菲克竞选总统之际去世。此时正值埃及政局最扑朔迷离的时候,本就失落的科普特人又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

2. 穆尔西时期

2012 年 6 月,穆尔西以 51.73% 的支持率击败沙菲克,成为埃及史上首位代表伊斯兰势力、没有军方背景的总统。就任总统后,穆尔西宣布将成为所有国民、所有政治派系、穆斯林及基督徒的仆人,把埃及建设成为一个“世俗、民主、宪治”的现代化国家。为了打消科普特人对其穆兄会成员身份的疑虑,穆尔西还任命了科普特作家萨米尔·马尔克斯作为总统民主过渡助手。10 月,他专程前往西奈半岛安抚和看望因受到生命威胁而逃离拉法市的科普特家庭,并承诺他们不会再成为被攻击的目标。^④

仅仅 1 个月后,塔瓦德罗斯二世(任期:2012 年至今)被选为科普特人基督教教皇。尽管受到了邀请,穆尔西却并未出席教皇的加冕仪式,政府也未就此事作出任何官方声明。同年底,穆尔西颁布的新宪法声明和最终通过

^① Mina Fouad, “The Copts an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My Speech at Saint Egidio Meeting Munich 2011,” *Free Orthodox Mind*, September 12, 2011, <http://www.freeorthodoxmind.org/2011/09/copts-and-egyptian-revolution-my-speech.html>.

^② “Press Release from H.H. Pope Shenouda III Regarding January 25th Revolution,” *Coptic Orthodox Church*, February 15, 2012, http://www.wiscopts.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56.

^③ 2012 年 1 月,穆兄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其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的光明党分别赢得 498 席中的 235 席和 121 席,而奉行世俗主义的新华夫脱党仅获得 41 席。

^④ “Copt Home Attacked After Mursi’s Promises,” *AFP*, October 8, 2012, <http://www.coptic-solidarity.org/media-news-events/news/879>.

的新宪法草案，由于内含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主要依据等规定，受到了科普特教派代表的公开抵制。尽管最终草案公投过关，但科普特人仍然没有放弃与埃及国内的反对派联合举行抗议游行。

虽然穆尔西执政后在不同场合强调埃及的民族团结，承诺保护科普特人的权益不受侵犯，但是科普特人遇袭事件仍时有发生，政府也往往将这些案件视为个例，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并予以彻底解决。此外，穆尔西执政后的埃及局势一直不明朗，总统、军方和司法三方的利益纠葛日渐明显，穆兄会对穆尔西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为外界所诟病。

3. “二次革命”时期

2013年6月，埃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反对穆尔西的大规模示威游行。7月3日，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部长塞西宣布罢黜穆尔西，埃及“二次革命”的序幕由此拉开。在塞西宣布成立过渡政府时，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不仅就在现场，而且公开赞成由军方提出的“埃及未来路线图”。而在过渡政府的33名部长中，也有3名科普特教徒。

临时总统曼苏尔在上台后，曾多次呼吁各党派和政治力量参与和解，但却没有得到伊斯兰党派的响应，穆兄会则明确表示拒绝。2013年10月，埃及政府在多次要求未果的情况下，正式解散了穆兄会注册的非政府组织。

三、埃及科普特人政治地位变化的原因

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经过1500多年的生活，除了宗教信仰不同，如今在外貌、体型和语言上已经没有任何差别。然而，1000多年来，科普特人在埃及的境遇跌宕起伏，有时科普特人会身居高位，受到穆斯林的高度尊重，和穆斯林像兄弟般团结一致；有时却会完全丧失政治代表权，受到穆斯林的憎恨和歧视，双方会因为一点小事大打出手。从上文可以发现，埃及科普特人政治地位问题的症结与埃及总统、政府和科普特人自身有极大关系。

（一）埃及总统发挥宗教政治职能的方式不同

埃及是个宗教氛围深厚的国家，历届总统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压力，将宗教视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然而，具体到每任总统个人，他们发挥宗教

政治作用的方式不尽相同，这就导致科普特人政治地位的起伏不定。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纳赛尔执政的18年里，虽然他有意地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斗争，但也注重将政治和宗教分离开来。因此在其执政时期，尽管科普特人没有政治代表权，但和穆斯林还是生活在较为和谐的氛围里。萨达特则与纳赛尔截然不同，为了把纳赛尔分子和共产党从政权中驱除出去，他在上台之初便企图全面利用宗教势力，后来又基于宗教制造一些极端言论和行为，最终使得埃及政治弊端积重难返，科普特人的政治地位亦跌入了低谷，成了穆斯林和极端分子攻击的目标。

此外，埃及总统将宗教与政治对接，容易使政治矛盾转化成宗教矛盾，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上文中科普特人在穆巴拉克执政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境遇就是最好的证明。据统计，穆巴拉克第一任期内（1981—1986年），埃及共发生21起宗教暴力冲突和3起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事件；而在1987至1993年间，这两项数据则分别为335起和78起。^①

尽管总统倚重宗教的政治职能在埃及这个伊斯兰色彩浓重的国家难以避免，但由于伊斯兰教的价值取向某种程度上是怀旧性的，因此它非但不能解决埃及在世俗化和现代化浪潮中所面临的问题，其宗教视野和宗教政治取向还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冲突。^② 科普特人的政治地位也只能随着总统对宗教利用方式的不同而跌宕起伏。

（二）埃及政府尚未确立国民共同的政治认同

所谓“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③ 这种归属感迫使人们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组织起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从而按照共同身份制定规则，规范自身行为。从总体上看，虽然埃及国民的政治认同主要来源于三种属性，即阿拉伯属性、伊斯兰属性和埃及属性，但埃及政府并未就以何种属性建立政治认同达成共识。不同政府在不同时期所强调的属性各不相同，这直接影响到科普特人在埃及的政治地位。

埃及属性以埃及人民共同生活的国家为基础，蕴藏于埃及4000多年历史

^①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② 钱乘旦：《宗教对抗国家——埃及现代化的难题》，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3期，第11页。

^③ 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的深厚积淀，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每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时，埃及属性总能使穆斯林和科普特人团结起来，结束宗教纷争和民族对立，同仇敌忾。例如上文提及的 1879 年祖国党领导埃及人民进行的反殖反封建斗争^①和 1919 年“华夫脱”党领导的反英运动^②。每当埃及政府强调埃及属性时，科普特人就能取得与穆斯林同等的地位。特别是在华夫脱运动时期，科普特人甚至还成为领导力量，其中马克拉姆·艾贝德还一度成为“华夫脱”党的领袖。

阿拉伯属性是埃及人民政治认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绝大多数埃及人是阿拉伯人。而埃及政府也非常强调这一方面，特别是纳赛尔执政时期。纳赛尔政府上台不久就在 1956 年的临时宪法中称“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由于这种政治认同，纳赛尔政府把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业紧密联合在一起，使埃及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发动了两次中东战争。然而，科普特人从一开始就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不热心，因为科普特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③所以，科普特人在埃及政治中也逐步边缘化。

自 7 世纪以来，埃及一直处在穆斯林的长期统治之下，伊斯兰属性始终是埃及的一个重要属性。由于这一属性以遵从“一神论”的伊斯兰教为基础，所以它势必具有排他性。伊斯兰属性绝非强调国家的宗教认同那么简单，它关乎国家的利益分配问题。萨达特执政时期，埃及的伊斯兰化色彩日益严重，宗教纷争和对立也就愈演愈烈，这就是最好的证明。科普特人也在国家伊斯兰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埃及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

可以认为，埃及国民的政治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内在感受，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职能。埃及政府以哪种属性建立政治认同，会决定这届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和内外政策的出发点，从而影响到科普特人政治地位的高低。

^① 在 1879 年，为了反抗英国的半殖民统治和国内土耳其、契尔卡斯族的封建势力，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奥拉比创立了祖国党，并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这一口号。这一口号是埃及民族意识复苏的反映，对消除宗教隔阂和动员埃及人民进行反殖反封建斗争起了巨大作用。

^② 在 1919 年反英起义爆发后，为了迫使英国从埃及撤军，实现埃及独立，在“华夫脱”党的领导下，埃及国内的穆斯林和科普特人空前团结，举行了一系列罢课、罢工和罢市活动。后来，和平示威转变为自发性的武装起义。英国最终于 1922 年 2 月被迫有条件地承认埃及独立。

^③ 李福泉：《埃及科普特人问题探析》，载《世界民族》2007 年第 5 期，第 26 页。

（三）埃及科普特人缺乏参与政治的热情

作为古埃及人的后裔，科普特人虽然在经济和受教育水平上普遍高于穆斯林，但却无法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这虽然有外界的原因，但其自身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面对自身政治地位的降低，埃及科普特人经常采取消极的方式，少数人改信伊斯兰教或移居海外，多数人保持沉默，不参加选举和竞选。^①此外，大多数科普特人自绝于伊斯兰主流社会之外，很多社会精英都持有外国护照，一旦埃及国内发生不测，他们就会移居海外。久而久之，科普特人的人口减少，人才流失，群体活力下降，这无疑加重了科普特人本就强烈的弱势群体心态，科普特人在埃及各领域也就更加被边缘化。

科普特教会一直发挥着一定的政治职能，科普特人会根据教会特别是教皇的指示参与政治。然而，虽然科普特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科普特人的权益，但宗教参与政治无疑与其自身倡导的埃及政治世俗化相违背。教皇在科普特人心目中的绝对权威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科普特人通过政党和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诉求。此外，这也不利于科普特人日后成立独立的政党，因为埃及新宪法明确规定，“任何政党不能建立在宗教之上”。^②

面对国内科普特人的困境，海外的科普特人通过游行和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方式，力图使科普特问题国际化，以要求国际社会向埃及政府施压，解决科普特人问题，但有时也会出现极端夸大的举动和言论。比如，2012年底在网络上疯传的一部诋毁和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就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部电影就是由美籍科普特基督教徒导演纳库拉·巴塞利制作的。由此可见，这不仅无助于改善埃及国内科普特人的处境，反而会使国内的穆斯林对周围的科普特人产生敌视情绪。

结 束 语

冷战后，埃及国内一直刻意回避科普特人问题，一般将宗教对立事件归

^① “The Copts and Their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Egypt”.

^② *Egypt's Constitution, 2012, Complete in English*, <http://niviensaleh.info/2013/02/09/egypt-constitution-english-2>.

因于境外势力的挑唆、国内极端组织的报复行为和西方媒体的夸大报道。虽然事后也会出台一些保护和关心科普特人的措施，但这些举措治标不治本，科普特人遇袭事件仍时有发生，他们的政治地位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虽然埃及在革命后成立了第一个民选政府，但其新宪法并未弱化伊斯兰色彩。迫于国内伊斯兰势力的压力，新宪法并未对“伊斯兰教是国教”、“伊斯兰法是埃及法律的来源”等条款做任何修改。不仅如此，新宪法还在原有“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成员”的表述上增加“埃及是伊斯兰世界成员”这一陈述。^①这一点在新宪法草案修订过程中就为埃及世俗派所诟病。埃及宪法的世俗化将直接影响到科普特人政治地位问题的根本解决。

此外，科普特人的少数族裔地位并未得到埃及政府承认。^②科普特人未来还要被迫参加伊斯兰教的节日和活动，学习伊斯兰教的条规和历史，有时还会卷入由此带来的宗教纷争。由于科普特人在埃及人数少且居住分散，新宪法又取消了埃及总统可以在议会中任命议员的权力^③，科普特人很难通过选举或任命进入议会，更没有机会提交维护自己权益的法案。由此可见，科普特人政治地位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这一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收稿日期: 2013-09-05]

[修回日期: 2013-11-18]

[责任编辑: 樊文光]

^① “Comparison of Egypt’s Suspended and Draft Constitutions,” *BBC News*, November 30, 201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20555478>.

^② 1994年5月，埃及社会学家萨德丁·易卜拉欣任主席的“伊本·赫勒东发展中心”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专门讨论包括科普特人在内的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会后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拒绝承认科普特人是一个独立民族，并反对公开讨论这一问题。这次会议第一次使科普特人的处境和他们对穆斯林的关系受到了国际的广泛关注。

^③ “Egyptian President Granted ‘Half’ his Powers in New Constitution,” *Egypt Independent*, October 7, 2012, <http://www.egyptindependent.com/news/egyptian-president-granted-half-his-powers-new-constitution>.

“未来十年的中拉关系”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黄放放 张明德

2013年10月18日，“未来十年的中拉关系”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研讨会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湖北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拉合作”、“拉美与亚太地区的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与会专家学者都认同，在过去的10年里，中拉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中国同巴西、墨西哥、秘鲁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同所有拉美与中国的建交国建立了外交部之间政治磋商机制，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拉经贸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贸易额成倍增长，2012年达到2,614亿美元，中国成为拉美国家第三大贸易伙伴，是巴西、智利等国的首要贸易伙伴。中国同智利、哥斯达黎加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拉双向投资不断扩大，成为中拉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又一个新亮点，中国成为拉美第三大投资来源国。中拉人文交流也取得新的进展，双方政府提供的互派留学生名额逐年增加，几十所孔子学院、

黄放放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张明德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孔子学堂在拉美开办，每年众多文化、教育、体育、文艺团组互访，有力地促进了中拉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也有学者认为，追求发展是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共同目标，中拉经贸合作是中拉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一个亮点，并且大有发展空间。中拉经贸合作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贸易往来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多，特别是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进口拉美的能源和资源性原材料。中国对拉美国家的投资更多地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关乎民生的一些建设领域，如公路、铁路、电力设施等。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拉经贸合作目标是要达到双赢，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而非权宜之计。经贸合作与竞争是同时存在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合乎逻辑的现象。为此必须避免出现有损中拉经贸合作的事件，中拉双方应共同采取措施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防止不必要的“反倾销调查”。充分认识合作和竞争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解决经贸合作中出现的分歧，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分歧，朝着共赢的结果努力。为相互投资合作创造更为良好的环境，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与会的专家学者更为关注中拉关系的未来发展。有学者指出，中拉关系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经贸关系如何取得可持续发展是我们更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大问题。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了《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该文件表示，中国从战略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对中拉关系的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意义。但拉美国家对此回应是不够的，至今没有共同的回应，或者说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智利在2009年提交了针对《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的回复文件，巴西、墨西哥随后也提交了一份政策文件）。其次，拉美各国相互之间情况不尽相同，他们根据自身国家利益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各自在国际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政策和策略，这可能是拉美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的原因。未来需要重点研究如下问题，如：拉美如何与世界相互影响？中国和拉美又应当如何相互影响？中国与拉美国家都应明确相互之间各自应扮演什么角色。

拉美学者特别强调，今后10年要特别关注改变基于商品贸易的经济关系的可能性，中拉经济关系不仅仅是农产品、能源、矿产品等物品的交流。拉美国家对中拉经贸关系除了喜悦以外也有焦虑感。要承认互补和竞争同时存

在，承认中国商品涌入对拉美工业的冲击，要思考能为缓解这种焦虑做些什么。中方学者认为中拉应当重新审视现有的贸易模式，可以重新思考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因为先前的规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可以研究签署类似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那样符合中拉合作特色的贸易协定。国际经济体系和贸易体系在深入变革中，中拉要有全新的理念来应对。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可以与拉美共享，拉美国家也有类似追求。中拉合作的空间还很大，要辩证地看待挑战和机遇。

人才缺乏是中拉关系面临的一大难题，要着力培养一大批适应中拉关系发展所需的人才，他们应该是多领域、多学科、综合型人才。他们应是既懂语言，又了解对方国家法律法规、风土人情、信仰和习惯等方面知识的人才。这将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依靠现有的政府奖学金制度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建议让所有与中拉之间合作交流有关的社会团体、企业、大专院校、民间组织都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大工程，以适应未来中拉关系发展的需要。

二、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拉合作

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和个别发达国家单方面调整货币政策等，对中国和拉美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出口大幅下滑，热钱流动频繁导致汇率波动加大，金融市场不稳。2013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普遍下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拉美国家而言，任何国家经济的发展都不可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的形势毫不相干。需要研究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拉关系产生什么影响？中拉在哪些方面可以合作应对？同时，全球治理的内涵已经不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它涉及到全球气候、环境、社会、安全等诸多领域。需要研究中国和拉美国家如何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去，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相互的磋商和合作？又如何维护好自身的权益？共同应对好这一挑战，使之更具有建设性、有效性和互利性。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东盟等对话和磋商合作机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革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这类集团和机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拉应争取使二十国集

团中的新兴国家和金砖国家等新兴集团发挥好作用，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对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拉美学者强调金砖国家峰会机制有潜力在 21 世纪成为重要的组织，目前它是世界重要新兴大国定期会晤的平台。有专家指出，二十国集团作为现有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新兴国家需要从中发现合作的机会；特别是中国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都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拉美新兴大国应通过磋商协调立场，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力争为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话语权，目标是要推动国际关系更加公正和合理。

巴西学者强调，巴西的全球战略是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在国际体系中有更多话语权，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主张全球治理体系的多极化，贸易伙伴多元化，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巴西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有很多共同点，希望与中国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场合采取联合行动。同时也应当承认，在应对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拉美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拉美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的一些国际和地区政策。

三、拉美和亚太地区的合作和可持续发展

有学者认为，从全球层面来看，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趋势还在继续。拉美一体化始于 1960 年，是世界上推动经济一体化最早的地区；次地区组织相对成熟，2012 年 12 月，涵盖所有拉美国家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宣告成立，标志着拉美一体化取得重要成果。东亚和东盟经济一体化起步较晚，但一体化逻辑相似且发展迅速。地区一体化进程为推动区域内经济贸易的合作交流以及推动与其他地区跨区域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巴西学者特别强调地区大国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拉美学者同时指出，由于拉美国家本身政治制度、国力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地缘政治取向不同，又受到内政的制约，在跨区域合作问题上政策不尽相同。加之美国推动 TPP 和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进程，有可能导致亚太和拉美部分国家面临选择困境。东亚—拉美论坛（Forum for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几乎停止运作便是例证。

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主要围绕中拉之间在能源合作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展开热烈讨论，认为未来能源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能源的占有量和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能源问题引发的国际及国内问题屡见不鲜。中国和拉美在能源上的合作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性，既有互补性又体现了现代能源供求关系，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中国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开发新能源，特别是在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方面取得成果，可以与拉美国家合作共享发展成果。

拉美学者认为，妥善应对城市化带来的负面现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出现贫富差距扩大，部分人群被边缘化，社会不公现象凸显，拉美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可以与中国城市化出现的类似问题交流看法。出路是采取包容性的、体现社会凝聚力的政策。此外，暴力犯罪问题是对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全球暴力犯罪（包括凶杀、绑架、贩毒集团武力反抗等）最严重的10大城市中拉美国家城市占了多数。暴力犯罪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心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公众对政府和司法机构治理暴力、维护稳定的能力丧失信心，也严重损害了拉美国家的国际形象。中国倡导的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的和谐理念值得拉美借鉴。

总之，与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未来10年的中拉关系既拥有机遇也面临挑战。中国和拉美国家求合作、谋发展的意愿强烈，无论是在国际层面、地区层面，还是在双边关系层面，都已具有比较完整的合作交流机制。今后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探索新的思想、新的理念，采取新的措施，使中拉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新全球合作机制的动力？”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范翊君 祝 鸣

2013年11月28—29日，“新全球合作机制的动力？——金砖国家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角色”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联合举办。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联合国协会、印度尼赫鲁大学、俄罗斯后工业研究中心、巴西国家科学与技术发展委员会、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社会观察”、“第三世界网络”等中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也派员参加了会议。专家们围绕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的评估、如何建构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金砖国家在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的角色、寻求在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共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评估

随着时间的流逝，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到期。学者们首先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已经取得的成就及出现的新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学者阐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削减贫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援引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指出，这是自世行开始监测贫困趋势以来首次发现所有发展中地区的

范翊君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祝鸣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极端贫困人数和贫困率都已下降，包括贫困率最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各发展中地区，人均收入低于1.25美元/天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47%降至2008年的24%。2008年生活环境极端贫困的人数比2005年减少1.1亿人。发展中地区极端贫困人数从1990年超过20亿人减至2008年不足14亿人。

与会学者同时指出，尽管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帮助大量人口脱离贫困，但在中等收入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贫富差距和社会机会的不平等在这些国家中大量存在，这可以作为下一个阶段发展议程努力的方向。不仅如此，尽管中国和印度在减少贫困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贫困问题依然较为严重。世界上仍然有10亿人口属于国际定义的“极端贫困人口”（收入低于1.25美元/天）。

更有甚者，全球发展的成绩正面临着新的威胁。有与会学者指出，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退，而另一些威胁比如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给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另有与会学者从发展援助、贸易保护主义、基本药物这三个角度阐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面临的巨大挑战。发展援助实际到位资金和承诺援助资金之间的缺口有1670亿美元。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瑞典、挪威、荷兰、卢森堡和丹麦兑现了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国际援助的承诺。贸易保护主义也导致全球贸易谈判停滞，严重影响了全球发展合作。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家庭急需基本药物，因此需要有稳定的援助资金来源。

二、如何建构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

如何建构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是当前发展领域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众说纷纭。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学者阐述了建构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三个关键词：发展、多样性和平等。“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分蛋糕”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思想。因为全球依旧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国际上也应该把发展继续作为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主线。根据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发展领域并不存在普世模式，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去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应

该被视作同等的合作伙伴。

来自中国外交部的官员认为,目前全球依旧有 12 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因此减少贫困应该继续放在发展议程的核心位置。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状况和历史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国际社会在发展领域的重要共识,也是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基础。发达国家需要做出官方援助的进一步承诺,南北合作也应该是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的核心,南南合作不应该被视作是南北合作的替代品。中国虽然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依旧是发展中国家。

来自清华大学的学者指出,目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着五大鸿沟,包括知识鸿沟、规范鸿沟、政策鸿沟、机构鸿沟和监管鸿沟。为了解决全球治理中出现的问题,除了改革国际组织、创造新的国际机制之外,该学者还提到了行动网络作为新的动力。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融合了科学家、工程师、商业和公民社会组织代表来推动跨专业、地区和行业的对话。

来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司海洋和气候变化局的官员则认为,应该把可持续发展作为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他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建立在 1992 年联合国于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所通过的 21 世纪议程基础之上,同时尊重里约原则。此外发达国家需要信守之前做出的承诺。根据联合国对其成员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最受关注的是粮食安全,而且减少贫困也排在气候变化之前。他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需要注意三点,首先是提高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认知度,其次是加强执行能力,此外还需要对可持续发展前景的想象力。

三、金砖国家在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的角色

金砖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越来越受到关注。金砖国家在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自然也成为讨论的热点。有学者认为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全世界发展议题上提高发言权。目前,在全世界发展议题的设置上,发达国家还是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公民社会仍相对弱小,在专业性、国内外资源动员等方面和西方相

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学术界和公民社会等需要提高自身能力，逐步扩大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国际发展议程的能力，以推动全球发展进程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利益。

来自巴西国家科学与技术发展委员会的学者比较了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在国际发展项目上的地理重心和合作偏好，期望金砖国家能够加大围绕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合作力度。印度尼赫鲁大学的学者阐述了印度在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上的立场，印度认为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应该继续把减少饥饿和贫穷作为核心，同时兼顾能源需求和粮食安全。来自中国外交部的官员指出，金砖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承诺进一步减少贫困同时帮助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而来自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的学者阐述了南非在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上的立场，认为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应遵循平等、公正、包容和普遍的原则，继续重视减少饥饿和贫困议题。

公民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也发表了其声音。来自孟加拉国政策对话中心的学者指出目前发达国家与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解决问题的相关谈判上，有时因为利益和理念等分歧太大，而经常出现各执一词，导致出现“聋子对话”。来自中国联合国协会的学者则指出虽然中国公民社会组织还很弱小，但是随着中国政府放宽公民社会组织的注册，中国民间组织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谈判。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可以依托其与中国社会各界良好的网络联系，更好地充当国际社会与中国的桥梁。

四、寻求在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共识

来自德国发展研究所的学者将国家分成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这三类，并逐一分析他们对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看法。他指出，高收入国家在削减官方发展援助，更多地注重国际合作；中等收入国家则普遍希望在国际体系中找到一个新的位置，在议程上偏重经济增长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低收入国家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影响下更加脆弱，但是他们最关注的还是减少贫困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首先是要

实现官方发展援助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 0.7% 的目标；其次这些国家在讨论发展全球公共物品新的资助机制；最后是实现低碳经济转型。德国不应被归类为发达国家，它应被列入高收入国家。

来自经合组织的学者阐述了该组织的立场。经合组织将关注各成员国提出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具体目标，同时也关注各成员国在巴黎、阿卡拉和釜山会议中做出的承诺。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经合组织成员国预算普遍缩水，由此将不可避免地更关注其自身的增长。她批评中等收入国家并不清楚他们在 2015 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要什么，过分强调主权和平等。

来自马来西亚的学者从第三世界的角度，介绍了目前主要由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全球新兴机制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的影响。她指出，虽然金砖国家发展成绩显著，但是国内的贫困人口还相当巨大，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来自艾伯特基金会的学者指出目前的国际秩序还是由传统的强国控制，但正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日益严峻的挑战。由此产生了各方利益分歧并导致国际相关议题解决出现僵局，因此各方如何寻求共同立场以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则至关重要。不可否认的是，在解决全球性发展问题上，高收入国家需要更为积极地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学者则以目前高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为例，说明目前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已经产生了数字鸿沟问题，使得各国的实力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不少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信息化的浪潮中掉队了。在涉及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时候，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固然很重要，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也需要新兴国家与私营公司作出相应的贡献。

尽管存在争论，会议仍达成相当共识，如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国家应该在未来的发展议程中多作贡献，尤其是在绿色经济转型中履行更多责任，而金砖国家则应该在南南合作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Abstracts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China's Diplomacy at a New Starting Point

YANG Jiemian

For more than one year after taking office, China's new leadership has largely inherited and continued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of its predecessor. On the other hand, given China's grow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and change of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it has adjusted and enriched the substance of the strategy in a distinctive way. For example, the new leadership has specified strategic self-identification, updated strategic thinking, kept strategic composure, strengthened strategic initiative and planning, and developed strategic theories.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requires further adjustment for the next decade to enha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execution, China's diplomacy will be conducted in a more active, pragmatic, and effective way and will thrive in meeting challenges and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China's strategic diplomacy needs to reflect the vision and logic of a rising global power, strengthen strategic construction based on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by further adjusting strategic objectives, build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networks, and deepening strategic theoretic studies.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requires perspectives that are all-dimensional, diversified, and transcends space and time. It need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hanging and interact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to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deepen domestic support. Finally, academic circles of IR and diplomatic studies should be driven by an acute and urgent sense of calling to construct and develop China's strategies within the diplomatic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enrich the variety of public goods provided by China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Historic Mission of the Contemporary Major Powers to Avoid Splitting and Confrontation of Global Alliances

—With Discussion 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JIN Yingzhong

Traditional major-power relations feature alliance, splitting, and confrontation that compete for world hegemony with each other. Not only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are splitting, but also economic relations are confrontational, both without an

overarching arrangement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With the historic inertia left thereof, the post-war bipolar configuration formed between the two superpowers, the U.S. and the USSR, remains the same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feature. The Cold War was the name of the day between the two superpowers though a general hot war avoided. Today the global system, symbiotic by nature, has added a modern sense to “either win-win games or lose-lose games”, the feature of now the fate-commonwealth of humankind, which has lessened the *raison d'être* of the basic nature of the traditional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and weakened the historic inertia of the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hence leaving a historic requirement and opportunity to build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China’s timely call for building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is not only due to its adherence to the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but also a hope to offer a direction to the common effort of the world to get rid of the historic inertia of the traditional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which not only contain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rounds, but also scientifically masters historic trends of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 Common Grounds upon Reserving Differences?

—Studying and Pond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ino-U.S.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U Changhe

Although the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is a concept put forward by the new leadership of Chin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exploring for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tends to approac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U.S. with a view more on seeking common ground than on comparing differences, i.e., exploring common factors and convergences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o expand the potential and space for cooperation, a helpful approach per se. On the other hand thoug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Some differences are even fundamental. Highlighting differences is not to ignore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but rather to deepen the cooperation through facing up and carefully defining the differences.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only seek common ground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ut als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Seeking common ground is to search for the foundation of cooperation while comparing differences is to perceive both sides more prudently. In fact, it is exactly this approach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on the basis of comparing differences

where the wisdom of having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signed 40 years ago dwells. Comparing differences appropriately can help to identify the upsides and downsides of the two countries, hence lay down the foundation for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drawing up experiences with each other, and respecting each other.

Toward the Once-in-a-century Transition ——New Policy Approaches in the Sino-U.S. Relations

Dan Steinbock

As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re moving toward the once-in-a-century transition of economic power, each is also engaged in rebalancing in Asia, as evidenced by changing alliances and the scramble for the trade blocs in the region. Due to historical legacies, different growth trajectories and strategic objectives, the way these two great nations are pivoting in Asia is very different, as evidenced by U.S. cooperation with Japan and Australia, and China's reforms and rebalancing in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However, concerns over new "Eurasian challengers" are dated. While both are scrambling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blocs in Asia, there are vit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centives toward the building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Currently, the U.S. policy approach is largely inductive; in contrast, the Chinese approach seeks to be deductive. At the surface, the two approaches seem mutually exclusive; in practice, the two do converge in certain areas.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 most fundamental challenge will be the ability to work well in some areas, despite competition or even strong differences in other areas. New models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s" require new, pragmatic and dynamic policy approaches in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Cultural Logic of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Chinese Dream

CAI Liang

With its development, China is becoming a global power, but scholars from the West get used to use the theory of power transition to explain the power redistribution among major powers. China's new leadership proposed constructing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cooperation and win-win result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China put forward "No confrontation and no conflict, mutual respect and cooperation and win-win relationship as the rule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is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Tactics, and Mechanism

—Triple-Reflections on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ship

ZHANG Fang

New military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new relationships of major powers,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part of the Sino-U.S. relations. Upon the analysis of the asymmetric-interdependent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s, the author assumes that the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s feature coexistence and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sensitivity and importance, between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and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author raises the thinking, such as, gradually eliminating obstacles, controlling the action-reaction cycle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eliminating ambiguity of military images, seeking identities of major power military status to matc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s. The author also proposes to incrementally establish a "Sino-U.S.+X or NX" tr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defense ministerial meeting mechanisms, public diplomatic mechanisms of the Sino-U.S. military diplomacy, and new mechanisms for the think-tanks of the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s.

The Relativity of China's Rise and U.S. Decline in Global Public Opinion

ZHAI Shilei

"China's rise" and "U.S. decline" are two relative judgments about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the U.S. to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traditional criterion, assessing global power by comparing comprehensive items relating to the hard and soft power, has hardly been widely accepted. The global opinions about "China's rise" and "U.S. decline" are considered to be another feasible approach for evaluating that tendency. Public opinions in the past ten years show that "China's rise" and "U.S. decline" are rather a relative change, and a kind of forecast. The global public still sees the U.S. as a dominant power in global affairs, except for the economic sphere. And China is expected to promote its global reputation and prestige by taking public diplomacy and finally wins global support.

The Stratification and Generation Approaches on U.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HE Xiaoyu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s continuously enhanced in today's American politics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merican electoral politics, congress functioning and public policy making. 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re also

exists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U.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the political elite and the ordinary voters, the logic linkage of the two levels is the division of political geography that American electoral system rests 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ate as the basic unit of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constituency as the basic unit of seats competitive system in the congressional election. On this basis,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voters as bi-doer together construct the three basic generation mechanisms and two reverse generation mechanisms. Although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legislative limitation of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might make the U.S. political ecology return to normal in the future,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selective public media information taken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Republican safe constituency make it difficult to eliminate the U.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a short time. The lasting exist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gives hints to China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U.S. domestic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handling U.S.-China relations,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with U.S. private sectors, and be prepared for the return of neo-conservative forces.

A Tentative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Copts' Political Status in Postwar Egypt

PAN Weijuan

Copts in Egypt, the largest Christian community in the Middle East, did not seiz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until conflicts between Muslims and Christians became incessant in the 1970s.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Egyptian p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 religion and Copts, the influenc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enacted by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on Copts, and the attitudes of Coptic Christianity and Copts toward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the article starts with combing the evolution of Copts' political status in postwar Egypt. As to why Copts' political status has changed,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Egyptian presidents handled religion's functions,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having yet established a common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opts lacking enthusiasm for politics are main reasons. Looking to the future, when the situation remains complicated, post-revolutionary Egyp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Islamized while the secularization of Egypt's constitution will have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problem of Copts' political status. Consequently, the article predicts that it is unlikely for Copts' political status to be improved in the near future.